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9 字数 24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35,000

统一书号: 11094·123 定价: (平)1.5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首道 (1)

编写党史人物传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何长工 (6)

孙炳文.....卞杏英 尤 亮 (10)

李立三.....唐纯良 (27)

毕 磊.....卢 权 (94)

张宝泉.....李振民 张守宪 (119)

寻淮洲.....卢应权 唐伯藩 (129)
曾长秋 杨权荣

杨 林 (毕士悌)李政文 (162)

郭纲琳.....应尔玉 陈哲生 (177)
张 逸 毛健人

董天知.....刘洪岳 李成耀 (201)

何功伟.....王毓英 杨存厚 黄蔼芙 (209)

邓振询.....陈志勇 李佩良 (237)

罗世文.....郭久麟 (260)

王观澜.....朱 杰 高 军 (292)



孙 炳 文



李 立 三



毕磊



张宝泉



寻 淮 洲



杨 林（毕士悌）



郭 纲 琳



董 天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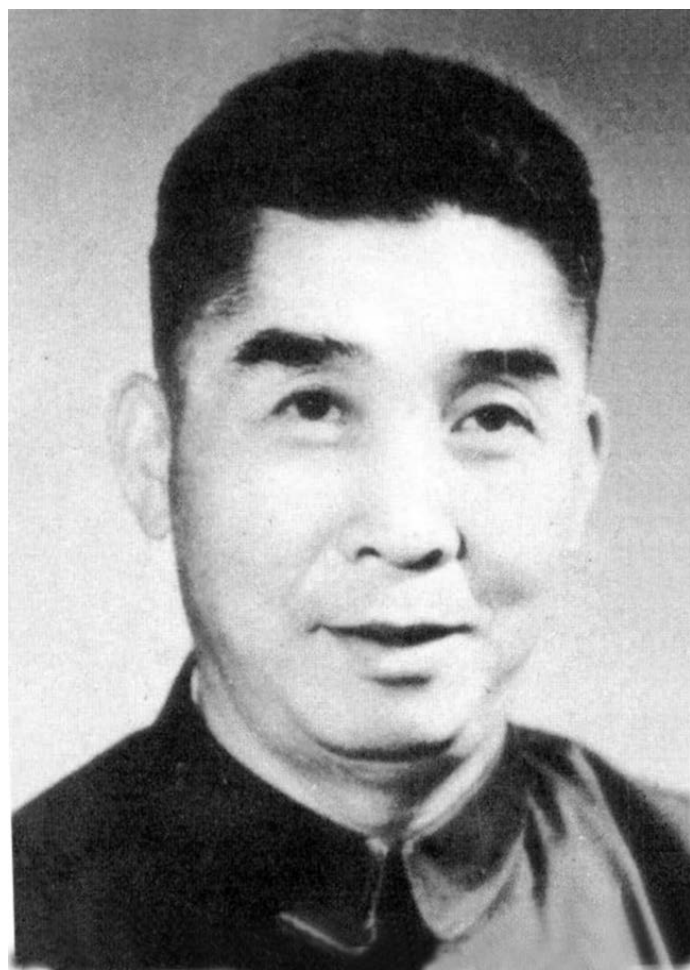
何 功 伟



邓 振 询



罗世文



王观澜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 首 道

党史人物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历史价值。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例如：孔子、孟子、岳飞、文天祥、郑成功以及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处的时势造成的，在秦始皇时代决不会产生民主主义革命者。所以，不同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时代历史人物产生的育床。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研究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反过来，通过研究历史人物又可进一步弄清历史事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和广大群众的活动造成的。所以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以研究其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事件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为中心。把一个个事件研究明白了，你才能给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看他对历史进步的贡献大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也是一定历史阶段和条件的产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中国产

业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李大钊等就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我们研究者的笔下，需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超时代的历史人物。“四人帮”时期那种盲目夸大、别有用心的捧场，说抬谁，一下子就上了天，是超人，是神人；说贬谁，一下子就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无是处，无地自容。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地、辩证地、有分析地写历史人物，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党史人物研究者的美德。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

党的历史是由许多人物和事件构成的。要写一部真实的全面的党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否则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骂我们。我们负责党史人物研究的同志责任是重大的，只有对党史人物作真实的研究，才能为党史提供真实的情节。我们的责任是记载下真实的历史人物，让后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象写《三国演义》那样把《三国志》夸张地加以故事化、形象化。

我们要重视党史人物的历史价值，这个价值要靠我们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生花之笔去写出来。所以我们研究工作者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能不能说我们的笔下是一字千金？我看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要求。因为再过几十年，你提供的人物传是唯一真实、准确、鲜明、生动的材料，你的人

物传就是权威的了，它的价值就很大了。就象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权威得很，我看是一字千金。

通过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预言和判断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特别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往往是一项重要政治决策的基础。我们知道，历史的经验是历史人物和广大群众智慧的结晶，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对后人都是很好的借鉴。毛泽东同志是很善于也十分重视总结前人的经验的，他在很多著作中都有较详尽的论述。在《实践论》中他强调了前人的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从陈独秀、王明那里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从蒋介石那里也总结了反面教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卓越才干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他聪明、敏锐的天才一面，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结合中国实践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成功的秘诀，也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伟大成就，也是因为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总结了六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教训，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所以，研究党史人物，要注意研究其在历史事件中的经验，要注意研究这个人物的优良思想作风，而不要为写人物而

写人物。如果我们忽视和丢掉了历史人物的历史经验和他的良好思想作风，或者说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贡献，起码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人物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党史人物研究要为教育人民和教育下一代服务。所谓教育人民，其中也包括我在座的各位，不光教育别人和下一代，首先要使我们自己受到教育。讲这个问题必然要联系到党史人物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党的传统和作风，革命者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教育人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持久的任务。有一个时期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党史、军史讲得少，对革命先辈和革命志士的革命精神、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他们的道德情操宣传得少，致使一些青少年不关心这些方面的学习，让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一些腐朽没落的污七八糟的东西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这不能只怪有些青少年们不争气，而应怪我们没有注意抓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好象一提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了，要集中精力搞建设了，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就可以不抓了。有的面对严重的精神污染而不去采取措施，甚至为它提供方便。我们应该看到，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精神污染，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是严重的。

为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事党史人物研究的同志肩负着一项光荣的任务，要把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宣传给群众，让人们重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让人们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让人们明白社会主义新中国定将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无限光明的前途，让人们知道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光荣责任，从而激发和

调动人们的爱国热忱和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们要重视榜样的力量。中国革命史中的英雄模范要大力宣传。五十年代，人们学习刘胡兰，学习董存瑞，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蔚然成风，人们充满了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奋斗热情。那时不仅仅生产搞得好，社会的公共道德也好。大家常常留恋当时的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我们不能再恢复到那个水平？我看是完全可能的。今天我们有了比那时更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比那时高得多的生产技术条件，我们的城乡建设也比那时进步得多，只差一个精神条件，也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要我们全党重视全党动手，就一定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我们的党史人物研究者也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家要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精神。有了我们党史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小说家、剧作家等等就有了艺术创作的基础，就可以通过小说、电影、电视、戏剧等各种形式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总之，我们的工作光荣的、是很有意义的，也是艰巨的。其所以是艰巨的任务，是因为这需要大家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

（原载1983年12月9日《人民日报》第5版）

编写党史人物传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何 长 工

正当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我的心情是很兴奋的。

湖南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领导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地方，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省份，湖南文家市是我党大革命时期战略转移的起点，湖南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培育了我们一整代人。我们编写党史人物传，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通过党史人物的传记，用活生生的斗争事迹，体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的威力。

现在，我们都在热烈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新贡献。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整党的重大决定。我们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员的党性和原则性，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普遍提高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我们编写的党史人物传，应当在整党工作中，起到良好的辅助教材的作用，就是用著名的烈士和杰出的党史人物的精神和品德作为楷模，来教育党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积极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能够把党整顿好。

我们要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当前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我们要通过党史人物传的编写，让青年学习正面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用榜样的力量，帮助青年形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一九七九年冬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以来，已经四年了。这四年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我们编成了十五卷《中共党史人物传》，包括一百七十一位著名的党史人物的传记，共计三百七十五万字。在研究会成立之初，我痛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我曾经说，这个研究会成立已经晚了，要动员和组织全国广大同志来从事这一工作。四年来，我们总算编出了这一百七十一位党史人物的传记，抢救下来许多珍贵的资料，给党史研究也提供了不少新材料。社会上的反映是良好的。党中央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关心和支持的。

同志们想一想，无数革命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江山，许多先烈没有给我们留下姓名，但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悼念他们。对于部分杰出、著名的党史人物，我们这些幸存者、后来者，要给他们立传，也有责任给他们立传，把他们的功绩永远载入我党的史册，以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发扬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榜样，开创新的事业。我在有生之年，一定义不容辞地尽我的一份力量。

作好这一工作，要依靠我们广大同志的努力。我们对于党史人物传的写作态度，必须是严肃的、认真的、准确的。党史人物传记所写的事实，必须花工夫反复考订核实，使每篇传记都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史。切不可随意虚构。对每一个党史人物的评价，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人民创造历史，党史人物是人民的一员，党的一员，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可把个人作用任意夸大，写得神乎其神。但党史人物又是人民中优秀的儿女，杰出的代表，我们也要写出他们的革命的精神面貌和英雄气概来。对前人的功过是非，要作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他们是革命的开创者，创业维艰，开创一个事业，历尽艰险，是很不容易的。开创者在黑暗中摸索，寻求真理，探索规律，积累经验，往往走过许多崎岖坎坷的道路，有时走了弯路，发生迷误；开创者有他的弱点，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要苛责前人，苛求于前人，不能因为一位前人生前有过错误，就一笔抹煞，认为一无是处；也不要文过饰非，把一位党史人物写成没有发展过程的没有曲折的天生的完人；更不要把错误写成正确。我们要给每个立传的党史人物以正确的估价，在科学地评价人物中，给人们以启示和教

益。

我希望各地同志能很好地交流调查访问、核实材料、如实地写出传记的经验，交流研究党史人物的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和心得，提高传记作品的写作质量，加快编书进度。我们要克服困难，深入走访，奋力抢救资料，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能完成五十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好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孙炳文

卞杏英 尤 亮

孙炳文，字濬明，一八八五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中正街。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二二年与朱德留学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应党的召唤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兼黄埔军校主任教官^①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

(一)

孙炳文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孙步蟾以种菜为生。一八九三年孙炳文八岁时，见同伴纷纷上学，很为羡慕，央求父母让他读书，但因交不起四吊钱的学费未能如愿，后由亲戚资助，方得上学。小学毕业后，他依靠在外经商的八哥炳章的供给，离开南溪去邻县叙府（今宜宾县）读中学。在叙府，他目睹劳动人民的辛酸生活和富人仗势欺人的情景，常在作文中流露出对旧社会的愤慨与不满，被头脑顽固的国文教员认为大逆不道，竟至以退学相威胁。

一九〇八年，孙炳文中学毕业，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文科预科班。因四川去的学生多数较贫穷，他得以免

^① 《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节。

交伙食住宿费。孙炳文学习非常刻苦，寒暑假也不返乡，经常出入于图书馆，博览群书，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地理、历史、国文考卷常常被陈列在阅览室供同学们观摩；加之，他处事谦虚谨慎，又乐于助人，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

孙炳文时刻关心国家的政治形势。当时中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各种思潮比较活跃。他经常阅读同盟会办的《民报》，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一次，上伦理课，孙炳文针对封建伦理的虚伪性，当众向教师发问，问得教师无语答复，这下触犯了校规，被记了大过处分。孙炳文不服气，在年终考试的作文中又抨击校方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①。学校当局十分恐怒，就把他开除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长由严复担任。在校的四川学生和福建学生，向校长陈述了孙炳文和福建另一学生林某被无理开除的情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严复立即调卷审阅，对孙、林两学生大为赞扬，同意恢复他们的学籍。于是，孙炳文复返北大求学，直至毕业。

在此之前，孙炳文曾参加过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的、主张暗杀活动的“铁血团”，并经同学甄尔仁的介绍，认识了汪精卫。汪精卫、罗世勋、黄复生因在北京银锭桥谋刺清醇亲王载沣案被捕，孙炳文常于星期天约友前去探监。汪等三人保释出狱后，孙炳文仍赞同恐怖主张，与任锐^②等人不顾个人安

①访问黄志煊谈话记录。

②任锐又名任纬绅，河南新蔡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参加过“铁血团”，后加入同盟会。1913年与孙炳文结婚，孙炳文牺牲后，她坚持革命，1936年参加共产党，在延安时人们称她为“妈妈同志”。1949年4月病逝于天津。

危，多次出入北京车站参与运送武器等活动。

嗣后，“铁血团”、共和会加入同盟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天津支部，简称天津同盟会，总部设天津。孙炳文也随之加入同盟会，被大家推举为天津同盟会文牍部长^①（似秘书长）。在同盟会里，孙炳文积极工作，出席各种大小会议，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当时天津同盟会在天津办了两个报纸，一个是《民意报》，由赵铁桥主编；另一个是《民国日报》，由孙炳文任总编辑^②。《民国日报》的发刊词，就是出于孙炳文之手，写得深刻犀利，有鼓动力，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还辟半页为妇女版，由任锐等三位女同志负责组稿，宣传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二年，《民国日报》由天津搬到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孙炳文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污蔑的愤怒，“有一次，孙炳文一人跑去将该社捣毁，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③表现了他与“进步党”势不两立的立场。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联合其它政党改为国民党，设党部于北京。同盟会所办报纸也易人，孙炳文、任锐等遂纷纷退出。

一九一三年春，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成革命伴侣。不久，“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件败露，孙炳文是被捉拿对象之一。经同学好友刘云门的资助，他偕任锐乘火车离北京回四川老

①任锐：《孙炳文同志的简史》，转引自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②访问张申府、梁漱溟记录，梁为该报通讯员，张与郭人林关系密切，亦为该报写文章。

③任锐：《孙炳文同志的简史》。

家。回川后以教书为业，先后担任成都省垣叙属联合中学教员、遂宁师范学校教员^①。

(二)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经八哥炳章的好友李贞白介绍，认识了朱德。初次见面，他即感朱德是“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②。同样，朱德对孙炳文德才双全很为敬佩。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后来，孙炳文到朱德旅部任咨谋（即参谋），成为朱德个人顾问。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传入中国。朱德特地在泸州住家布置一间精致的书房。孙炳文是书房的常客。他们如饥似渴地从书报杂志中学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苏俄主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很赞同，对人人有劳动权利很佩服，并为俄国红军推翻沙皇统治和驱逐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入侵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也为中国护法战争再次失败、军队越战越少而担忧。革命不成功，壮士苦彷徨。孙炳文在《行路难》长诗中写道：

“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嗟夫，此境之不可以终留兮，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媿作烟丝何处。”

“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箏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③反映了他当时矛盾的心情，也表明了他

①赵子祥：《对孙炳文烈士的片断回忆》。

②《朱母潘老太夫人荣哀录》，《革命文物》1979年第1期。

③《心声》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

报国的决心。他与朱德反复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如何寻求革命真理的问题，最后决定去德国考察。他曾对联襟黄志煊透露：

“去德国主要学哲学，去找共产党，是为了救中国，把所有穷人都搞起来，大家有饭吃。”^①后来，他对刘鼎也谈过：“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去德国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德国社会，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②

一九二一年，孙炳文偕妻儿离开四川去北京。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他与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启修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此时的北京大学政治空气浓厚，早期共产党组织亦有相当发展，不少学生利用暑假走出校门去工厂办学，宣传革命道理。孙炳文了解《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又是党的总书记，认为在国内就可以参加新的革命政党。于是他立即写信给在四川的朱德，催他速来北京。

一九二二年夏，朱德来到北京，住在孙炳文家。逗留期间，他们参观了鸡鸣山煤矿和大同云岗的石窟。这次旅游给他们的印象是深刻的：祖国虽然地域辽阔，却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革命的重任在肩，无可推卸。

孙炳文和朱德在北京没有找到陈独秀，准备再到上海去寻找。到上海后，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留下他们重整旗鼓讨伐陈炯明的要求。由于船票已订购，出洋日近，孙炳文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朱德在暂留上海

①1981年访问黄志煊记录。

②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载《红旗飘飘》第25集。

期间会见了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申请，但却遭到了冷遇。

一九二二年九月，孙炳文和朱德从上海乘法国万吨客轮安吉尔斯号启程赴德。十月，客轮到达法国的马赛，孙炳文与朱德转乘火车先去巴黎。到巴黎后，他们得知是年六月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八月，党中央决定由德、比、法等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①，负责人有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等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筹建党团组织。于是，他们高兴地急切离开巴黎，赶往柏林。

孙炳文和朱德一到柏林，就直奔康德大街周恩来寓所，各自向周恩来叙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寻求加入共产党的迫切要求，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组织的考验。比他们小十岁的周恩来细心倾听，反复思考，认为这两位中年人，毅然放弃优越生活地位，满腔热忱，为寻找革命真理远离祖国和亲人，党应当欢迎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共柏林党组织，并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点。

初到德国，孙炳文首先遇到的是语言关。他虽有英、法文的基础，但对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来说，从头学习德文确实是困难的。然而，为了革命，他顽强地、刻苦地学习。他选用德文本布哈林《共产主义 ABC》当政治教科书又当德文课本，边读边译，“终日抱着辞典背读”^②。他读书很多，所读之书

^①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 1977 年版。

^② 房师亮：《回忆孙炳文烈士》。

写满了蝇头小字的眉批、注释和心得。如德文版《比较心理学手册》一书，他在扉页上即写着：“行年四十，尚复有几春光；自今日起（一月二十八号）每日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炳文！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识之。”他决心“尝胆卧薪”，认为“不懋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树社会，何以型后世！”^①。正由于他分秒必争地学习，半年便过了语言关。

一九二三年，孙炳文、朱德等人先后到哥庭根一所大学旁听，重点学习哲学、心理学，还自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②。经过学习，觉悟程度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孙炳文等感到：读了这些书，“如梦初觉”，得到了“大雄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③。虽然这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孙炳文在德国积极参加了社会政治斗争。他对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德报侮辱我国尊严之事义愤填膺，联络留德同学，一面通电国内，唤起民众；一面提出抗议，并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外交后援会；到中国使馆进行交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

①孙炳文读过的《比较心理学手册》，现存孙新世处。

②房师亮：《回忆孙炳文烈士》。

③1923年5月26日孙炳文等人给《向导》周报的信，载《向导》第25期。

公使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一九二三年底，孙炳文与张申府、刘清扬一道，以回国“探亲”为名，“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①。他们从德国出发，乘火车路过莫斯科，往东方大学，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此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刚结束，会议研究了中国的問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维经斯基与他们谈了上述情况，使得孙炳文受到极大启发。加上亲临伟大的十月革命故乡，目睹久已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现实，孙炳文心中甚为兴奋，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离开苏联回国已是旧历年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孙炳文在北京停留不久，便去上海、杭州等地活动，了解情况，学习国共合作的有关文件，明确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春，孙炳文偕刘鼎^②由东北出境，得苏联使馆秘书护送，避过边境的检查，到了莫斯科。当时，李大钊正在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孙炳文到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汇报了工作，并与东方大学学生一块聆听斯大林作的《列宁主义基础》报告^③。不久，孙炳文与刘鼎到达德国柏林。

到柏林后，孙炳文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接着，中共

①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

②刘鼎原名阙尊民，与孙炳文同乡、亲戚，当时为共青团员。

③访问刘鼎谈话记录。

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对已经涣散的国民党旅德支部进行改组。在改组会上，国民党右派大放厥词，企图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孙炳文等人即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身分站出来，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辞严地对其痛加驳斥，从而鼓舞了左派，孤立了右派，争取和团结了中间派，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柏林已达五六百人，成立了留德学生会，设在康德大街的一栋楼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以及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经常在这里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青年党”学生，也常在这里进出。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争取团结更多的留德学生，孙炳文等人在学生中广泛宣传新三民主义，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使左派学生争得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孙炳文还特地邀请视察莫斯科的陈启修教授来柏林演讲，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二五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入德国，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中国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德共也开展了“中国的运动月”的宣传活动^①，提出“中国还给中国人”的口号。正在哥庭根的孙炳文，与留德中国学生谢唯进、房师亮等人和德国学生联合会成员一起散发传单，参加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支部组织的群众集会，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骨干力量。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工作，孙炳文等立即响应。离开柏林前，国民党旅德支部召开会议，孙炳文、朱德、邓演达（刚从苏联转入德国学习）、夏秀峰、李季、章伯钧、廖焕星、房师亮等人

^①房师亮：《回忆孙炳文烈士》。

出席。会议对大批同志回国后，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今后工作作了安排，并决定由邓演达负责支部工作（邓不久亦奉召回国）。

八月末，孙炳文与房师亮乘火车离德，经立陶宛抵莫斯科；朱德与李大章取海路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武兆镐、邢西屏（徐冰）、刘鼎随后也陆续到达。他们在莫斯科郊区的莫洛霍夫卡村住下，学习政治，总结工作，以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选留三十人参加军事训练，其余同志安排回国^①。九月，孙炳文由房师亮陪同离开住地，登上奔向祖国的列车。从此，他结束了在欧洲的学习和战斗生活，走向国内革命的前线。

（三）

孙炳文回北京不久，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他去广州工作。一九二五年底，孙炳文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学生段雪笙、张斗南等十余人南下，经上海去广州。

孙炳文到广州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②、黄埔军校与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③。当时广州情况复杂，政治部机构未定，各项准备也未就绪。孙炳文到任后，“参与确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确定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④使政治部的全部机构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

①房师亮：《回忆孙炳文烈士》。

②李民治《悼潘明同志》，1927年4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副刊。

③访问徐彬如记录。徐当时为广东大学党总支书记。

④《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来了。在广东大学，孙炳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还经常在黄埔军校讲政治课，与教员、学生打成一片。他十分爱护青年，关心青年进步，曾对干部说：“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办学校，又有各种工作机关，无非是培养人才，将来建设新中国。把军阀政府打倒就靠他们”^①。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阴谋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制造了“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孙炳文等四十余人遭拘捕，关押在造币厂（广州卫戍司令部）内。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当日，赶到造币厂，当面责问蒋介石。中共广东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一道，经过斗争，迫使蒋介石全部释放了被捕者。同月，北京人民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举行请愿，抗议日舰炮击大沽，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任锐在请愿中遭军警殴打，孙炳文闻讯即去北京接妻女来广州。在北京他了解了这次惨案真相，认为“这是显示了中国民族运动又一次高潮”^②。抵广州后，孙炳文一家住在万福路一九〇号楼上。这里是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地，近邻还住有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他们彼此交往非常密切。

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邓演达从东江调回广州任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调任秘书长^③。孙、邓早在德国留学时交谊颇深，这次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当时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缺额，蒋介石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又无

①罗碧渔的回忆。罗与孙同在黄埔军校工作。

②孙炳文：《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黄埔潮》1927年1月版。

③郭沫若：《纪念邓泽生先生》（1948年11月24日）。

人才，以后由孙炳文推荐郭沫若（当时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担任。但考虑颇有名望的郭沫若仅任科长之职是否会有大材小用的想法，于是，他便主动找郭沫若交谈。郭沫若赤诚相见，当场表示：“职务高低无所谓，我要工作，不要当官”^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政治部分为前后方两部分。邓演达出师前线，后方留守主任由孙炳文担任。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炳文代表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在会上作了演讲，简述北伐意义、作用，预祝北伐成功，表示了留守处为巩固后方，支援前方打胜仗的决心。

北伐军出师前夕，孙炳文以后方留守处的名义为北伐将领和名人设宴饯行。被邀赴宴者有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朱代杰、欧阳继修（即阳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周逸群、房师亮等。大家欢聚一堂分外亲热。孙炳文以主人的身分发表演讲，对北伐的胜利充满信心。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作为北伐军的后盾，工作十分繁杂、艰巨。孙炳文率领留守处的工作人员，日夜忙于筹集经费、器械、医药、训练骨干和补充人员上前线等，同时还要负责整顿地方秩序，调整各方面关系，巩固后方。

北伐军出师后，滇桂军阀企图抢占广州，地主豪绅、大商人乘机破坏社会秩序，出现了“淡水商团军串通土匪扰乱，并且杀纠察队员”的事件^②。在政府发行公债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借机操纵金融，破坏筹款。面对以上复杂情况，孙炳文

①郭沫若秘书王建芳在《郭沫若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及访问记录。

又见郭沫若《天地玄黄》第476页。

②见《工人之路》特辑，1926年7月9日。

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拟订“剿清土匪的计划”和“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分子。同时通令政治工作人员恪守职责，对于“海陆丰农民横遭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久为厂主虐待”，“一再设法解救”^①。这时，“总政治部收受诉案，日必数起”^②。孙炳文从容处置，入情入理，有条不紊。

北伐军出师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颤心惊，企图破坏。英帝国主义在九月四日派兵舰三艘，驶入广州珠江河面西堤附近，驱逐轮船，占领码头，袭击罢工工人。九月五日，英国兵舰炮轰四川万县，制造击毙民众数千的“万县惨案”。在党的指引和部署下，孙炳文领导的政治部留守处于九月十二日在广州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随后召开各界大会，声讨英帝罪行。

孙炳文特别注意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青年军人和干部。他亲自为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授《政治工作课程》^③。恽代英主任教官赴前方后，由孙炳文代职，因而黄埔军校有关教授内容、讲授方法、军纪校纪等，均由他负责研究和安排，并给学员上政治教育课。由于他处事公正，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任劳任怨，因而深得政治部内外人员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在夜以继日的战斗中，孙炳文仍坚持写作。他的《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就是这时写成的^④。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①②刘敏功：《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转摘罗歌《朱德同志挚友——孙炳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5期。

③《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

④《黄埔潮》1927年1月版。

一九二六年的民族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划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市场的剥削因已大大的减少，资本主义的经济益向崩溃衰败的死路上去”，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文章除了热情地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外，还指出革命军胜利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同时告诫人们，应当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障碍甚多，“帝国主义始终要扑灭中国民族运动”；“大地主、土匪、土豪劣绅”势力存在，还有“浪迹在政府机关的贪官污吏尚未铲尽，为反动派可乘之机”。因此，中国革命任务还是艰巨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发展，国内阶级斗争更为尖锐，蒋介石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此时正与蒋介石合作的李济深，见孙炳文才干出众，曾专门宴请孙炳文夫妇，企图拉拢。孙炳文洞察其奸，当面揭露其阴谋。此后李济深益加强对孙炳文进行监视，曾布置广州电报局：凡前方邓演达打给孙炳文电报均先送他审阅。孙炳文因病住院二周期间，李济深即派侍从闯入病房，进行监视。尽管当时社会谣言四起，孙炳文处之泰然，出院后照常紧张工作。有人劝他：时局紧张，应当离开广州。他总是回答说：“不要紧的，广大工人纠察队是有力量的”^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召开特别党员会议，响应与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会通过七个决议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决定电慰北伐将士和配合北伐军取得上海的上海工人。孙炳文被邀出席大会，代表总政治部演讲。他从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入门，提出“要纪

^①黄志焯：〈回忆孙炳文烈士〉访问记录。

念党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此次北伐战争死伤三万五千同志及历来为革命争斗而牺牲者，是他们底鲜血涤净我们遍体底污痕”。向大家指明当时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界限，具体指出反革命派是帝国主义、腐化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革命党人的道德与任务就是要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要求“大家高举左手纪念党魂”，要求党员“遵守纪律”“打倒一切腐化分子”^①。他的演讲鼓舞了广大群众，激励革命者与反革命派斗争到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向新右派斗争的动员会，孙炳文的演讲不指名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与独裁统治，使反动派大为震惊。尔后，蒋介石在反革命政变时，以孙炳文“宣传共产主义最为猖獗”为由，派宪兵对他进行搜捕^②。

北伐战争正在胜利前进，革命派准备以武汉为根据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于四月六日再次发电“催孙炳文赴鄂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③。孙炳文将总政治部事移交给刘康侯、黄日常，并由刘、黄等五人组成总政治部委员会。四月十日，孙炳文偕任锐和子女、秘书等离粤。他原想从粤汉路北行，因中途有二段路常梗阻，便改由香港乘船经上海顺长江去武汉。后听说汪精卫已回上海（当时汪以左派面目出现），打算到上海就便向汪汇报广州情况，并准备再做些蒋介石手下人的工作。然而他哪里知道，早在四月二日蒋介石已指使反动分子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会上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中就指出：要“将各地首要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

① 《黄埔日刊》1927年4月6日。

② 《新闻报》1927年4月24日。

③ 《申报》1927年4月9日。

动”^①，而包括孙炳文在内的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则是“应先看管者”^②。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全然不知。十三日他由香港搭法兰西邮船启碇，“行时虽然机密，但十二日的香港《大光报》已披露”^③。为避免反动派的耳目，孙炳文和家属坐二等舱，同行的秘书及政治工作人员张斗南、刘敏功、段雪笙等人坐三等舱。不料，有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与反革命分子褚民谊（后为汉奸）相遇。褚当即即在邮船上发电向蒋介石告密。

四月十六日，孙炳文所乘轮船刚抵上海汇山码头，一批法国巡捕立即蜂涌至孙炳文客舱，褚民谊当时对孙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④孙炳文理直气壮地说：“走就走！”他的秘书张斗南、长子孙宁世（即孙泱）也一并被捕。逮捕后，他们即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这时，此处已关押革命者二百余人。翌日，任锐查悉了孙炳文的下落，即带着子女冒着大雨前去探望。他们“站在铁栅子门前，听到镣铐由远而近的叮当声，只见带着手铐，衣衫撕破”^⑤的孙炳文站到门口，孩子们不禁大声哭喊着“爸爸！爸爸！”任锐悲痛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儿女切勿悲伤，嘱任锐电告国民政府营救。

在审讯室，敌人奉主子之命，千方百计劝孙炳文投降，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孙炳文义正词严，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卑鄙伎俩。他刚强无畏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

①②《革命文献》第17辑。

③④刘敏功：《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

⑤访问孙济世谈话记录。

杀。”^①敌人企图从孙炳文口中得到张斗南的“罪证”，孙炳文为保护同志，坚不吐实，他说：张斗南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释放他。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对他下毒手。四月十九日深夜，一群刽子手将他拉出军法处。孙炳文昂首挺胸步行至刑场。二十日凌晨，在龙华密荫深处，孙炳文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壮烈地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时年四十二岁。

孙炳文的牺牲，使革命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的朱德，惊闻噩耗，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失声痛哭，郭沫若作了《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朱德撰文纪念孙炳文烈士：“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②。孙炳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业绩将不断地激励后人前进。

^①任锐：《孙炳文同志简史》。

^②摘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朱德同志生平展览。

李立三

唐纯良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有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月十六）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含冤逝世。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李立三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王震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①

淞水之滨的“忧国子”

李立三的家庭是一个每年能收二十担左右租谷的小土地出租者。他的父亲李昌珪（字镜蓉）是晚清秀才，一生以教私塾为业。李立三六岁时被送进“名臣祠”蒙童馆里读书。他记忆力很强，先生指定的书，他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背诵下来，余下的时间就读《三国演义》、《水浒》、《精忠传》之类的“杂

^①中共中央《李立三同志的悼词》。

书”。后来，“名臣祠”蒙馆改成了涑江初级小学，李立三成为这所新式学堂的学生。但他父亲还让他背唐诗，对联句，写诗填词，读完四书五经，又教他读《御批通鉴辑览》。这使他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古汉语基础。

一九〇六年，李立三七岁时，同盟会的刘道一、蔡绍南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领导了萍、浏、醴起义。起义很快遭到失败，许多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所捕杀。幸存的同盟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立三读书的学馆中，就有一个名叫孙小山^①的“坐间学生”^②。他时常利用课余散步的机会给李立三等几个蒙童讲革命故事，李立三就是从他的口里第一次听到了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事迹。李立三后来回忆说，孙小山慷慨激昂的讲述，“极大地震动了我刚刚八、九岁的童心。”^③孙小山还向他们着重讲解过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和含义。这些讲述，使李立三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

一九一二年左右，李立三从涑江初级小学毕业后，越级升入了醴陵涑江中学。

醴陵是湖南省的一个富县，又地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军阀混战必争之地。内战就象拉锯一般，今天“北军”打来，明天“南军”打去，使人民倒悬于水火。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李立三在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①孙小山，原名孙筱山，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提到的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牺牲。

②私塾里在单独房间里读书的年龄大的学生叫“坐间学生”。

③李立三：《读〈访秋瑾故居〉以后》。

他在一次兵乱逃难中，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诗：

连天烟雾掩峰岗，
羁旅怀归百断肠。
乳燕呢喃惊客梦，
栖鸟群集趁斜阳。
袁山到处篁丛绿，
庄埠连阡麦正黄。
漫道桃源多逸趣，
应知故国有流亡^①。

国家战火连年，百姓流离失所，使生性活泼的李立三产生了忧伤情绪。因此，中学时代的李立三给自己起了个“忧国子”的笔名。他时常以忧国的心情写出救国主张的文章，贴在涑江中学的墙壁上，博得同学们的赞赏。他还经常把观察研究国家大事的心得体会讲给同学们听，政治敏感的同学都愿意和他交往，因而无形中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一次在校长叶沛棠身上爆发了出来。叶沛棠辛亥革命后虽然剪了辫子，当了新式学校的校长，但是他拥护袁世凯，维护封建思想，每天坐轿子上班，象对待犯人一样苛待学生。李立三带领同学搞罢课，终于把他赶出了学校。

一九一五年，长沙成立了长郡联立中学，涑江学校也并入该校，李立三开始来到长沙读书。他这时结交的一个要好朋

^①李立三一家当时逃亡在萍乡的温泉。袁山即萍乡；庄埠即醴陵。

友，就是浏阳来的罗璈阶（罗章龙）。这一年，罗璈阶第一个响应“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结为好友，并介绍李立三会见了毛泽东。

后来，李立三从长郡联立中学转到广益中学，于一九一七年初毕业，回乡当了几个月小学教师。这期间，由于他无情地揭露了仍任县教育局会长的叶沛棠徇私舞弊的恶行，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李立三一气之下跑到衡山，投了当时被湖南人称为“最革命”的程潜^①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他在离家时，写了这样一首五言诗：

浩气横牛斗，
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
投笔效班侯^②。

不久，李立三升为连部差遣使（相当于文书）。一个偶然的
机会，程潜发现他们之间不仅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父
亲还是自己的“同年”^③。从此，他就对李立三另眼相看了。
过了一段时间，程潜送给李立三一些钞票，要他去北京读书。
李立三一九一九年夏天到北京以后，因钞票贬值，不够交学

①程潜，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又领导一支护国军在湖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被湖南人看作最革命的人物。

②转引自李人纪等：《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1980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③前清科举同场考中秀才的人互称同年，互相间以师兄弟一样看待。

费，进不了大学。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发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门路，于是就去报名，进了法专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预备班设在北京西郊的酒醋局，只管教课，不管食宿。李立三寄宿在碧云寺里，每天往返步行四十里去听课，余下时间就在山寺中念法文，法语很快取得了优异成绩，准备出国了。

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的翻砂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李昌珪卖掉祖传土地十六亩，为儿子筹得银洋二百元作路费。李立三在上海登上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

“今朝呕尽心头血，添得海涛千丈深。”^①

李立三和赴法的其他同学坐四等舱，航行了四十多天，饱尝了海上颠簸和晕船的痛苦，终于到了法国的马赛港。随后又经巴黎转蒙达尼，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在蒙达尼，李立三一面作工读书，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据《时事新报》记载，一九二〇年四月下旬，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法国的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同学大会。会上，刚从国内来法几个月的李立三，继许德珩、徐特立之后发表演说，主张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发表中国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②。他思想活跃，善长讲话，对旧世界充满憎恨。每当与同学讨论国内

①李立三赴法途中所写家信中附诗的一句。

②见1920年5月20日《时事新报》。

政局，提及军阀政客时，他总是愤懑地大声喊叫：“推翻！打倒！杀掉！”^①

到法国初期，李立三曾经倾向无政府主义，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陈毅等过从甚密。但是，他很快就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他的法语水平较好，能直接阅读法共的《人道报》，攻读法文版的《资本论》，不长时间，就埋头读完了好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李立三在蒙达尼公学补习了一个时期法文，从家里带来的钱花光了，他就离开了学校，到三侠孟一家纱厂去做工。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由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发起了一个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的示威运动，史称“二二八”斗争或“求学运动”。在这次斗争准备期间，李立三和蔡和森发生了意见分歧。蔡和森认为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而通过勤工俭学坚持学习是办不到的，应当用群众斗争的方法迫使中国政府给学生发津贴，解决学生入学问题。受蔡和森影响的工学世界社的同学，都持有这种观点。而李立三则认为，通过勤工俭学坚持学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学生在法找工作，虽然由于战后经济萧条比较困难，但是只要肯于吃苦，不挑拣工种，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来达到读书的目的，是办不到的；在法国能够比较方便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这里有十万华工，中国学生应当在他们中进行工作，为将来中国革命准备干部。因此，不仅已经在法国的同学要坚持勤工俭学，还要动员更多的学生来法勤工俭学。

最初，蔡和森等人的看法，在勤工俭学生中是无人反对

^①唐铎：《回忆李立三》（未刊稿）。

的，而李立三的不同观点则比较孤立。但是他顽强地坚持这一看法，并在《旅欧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署名“佐夫”的文章，公开宣传了他的主张^①。不久，徐特立写文章表示赞成李立三的观点^②。几天后，李立三收到了赵世炎的一封信，信中不仅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还约定时间从三得建到三侠孟前来会见。两人第一次见面，谈得很投机，观点完全一致。接着，在工厂做工的刘伯坚、刘伯庄、吴明（陈公培）、罗汉、周钦若、鲁易、袁庆云、熊自难等，也参加到坚持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来，从而初步形成了一支力量。李立三和赵世炎两人这时还酝酿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打算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学中倡议，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作为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核心，但是由于有人对此有所保留，因而未能实现。稍后，他们改换名称组织了一个劳动学会。这个团体一成立就明确提出其目的是要革命，而革命的第一步是要把在法的华工组织起来。

劳动学会和它影响下的勤工俭学生没有参加“二二八”示威运动。但是，当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勾结法国警察、残暴镇压示威学生的事件发生后，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勤工俭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他们提议并且着手建立勤工俭学学会，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很快参加进来，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多数人报名参加了这个组织。赵世炎、李立三是勤工俭学学会的主要领导者，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学会的核心。

^①佐夫：《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旅欧周刊》第67号，1921年2月19日出版。

^②徐特立：《驳蒙达尼同学公启》，《旅欧周刊》第68号、69号，1921年2月26日、3月5日出版。

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后，它的领导成员马上带头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先来到工厂，赵世炎在安排了巴黎方面的工作之后也来到工厂。这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作厂里的杂工，搬运钢铁，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造车间做工。这些工种劳动强度大，工伤事故多，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十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李立三被分配去当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面对着白热的铁水，经常搬动百多斤重的铸件和工具，“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他的法国工人师傅是法共党员，对他不畏艰苦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关系越来越亲密。李立三后来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①又说：“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②为了探求解决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李立三等决定到华工当中去活动。

在克鲁梭有华工二千多人，李立三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了华工俱乐部，创办了《华工周报》，赵世炎亲自刻版，李立三印刷，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学会规定，它的会员每周要用一天的时间到华工中间去为华工服务，交工人朋

^①李立三 1952 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

^②李立三：《对赵世炎的回忆》。

友。赵世炎和李立三还为解除一些华工的包身合同进行了有效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了自由。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同工人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和赵世炎研究了和蔡和森以及工学世界社的同学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同志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决定由赵世炎写信给蔡和森，并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去蒙达尼同蔡和森会谈了三天。双方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会谈以后，赵世炎和李立三写信给蔡和森建议开始建党工作，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以统一领导勤工俭学运动和华工运动。蔡和森回信建议成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表示不计较名称。从此，双方统一了建党的意向。一九二一年六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会，李立三应邀作为劳动学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蔡和森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讲话表示同意。这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完全克服了以往的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以后，共同参加和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特别是后一斗争，在李立三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募捐筹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一九二一年夏天成立了。但是成立后，他们专门从国内招收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入学，而不准勤工俭学生入学。为了争回里大的入学权，李立三、赵世炎等克鲁梭工厂勤工俭学生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

行了动员。然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先遣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九月二十一日进驻里昂大学。这个行动遭到了法国当局的镇压。法国警察将一百多名学生拘留到一个军营里。李立三和赵世炎、蔡和森散发传单，向法国人民揭露了法国当局的无理干涉，并作了大量的团结内部坚持斗争的工作。这一年的“双十节”，被拘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绝食斗争表示抗议。此事吓得陈策和吴稚晖慌了手脚，吴稚晖出面向被押学生讲话，“说服”勤工俭学生放弃入学要求。李立三和赵世炎发言痛驳了吴稚晖的滥调。吴稚晖狼狈离去。接着，法国当局和中国大使馆商定，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李立三和赵世炎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认为留法学生回到国内，可以找党，参加革命斗争。但是，法国的留学生和华工需要有人留下加以领导。李立三建议作为勤工俭学学会主要领导人的赵世炎应该留下来。两人商定后，赵世炎就在法国当局采取行动的前夕，混出扣押学生的兵营，留在了法国；而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一百零四人，被法国警察强迫押上轮船遣送回国。李立三将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就此结束了。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组织者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旬，遣送一百零四名中国留学生的法国邮船到了香港。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等同学提前在香港下船，去广州找党。他们在广州和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得知陈独秀已经去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又马上动身去上海。十二月中旬，李立三、蔡和森由陈公培介绍，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向

陈独秀汇报了在法斗争情况和各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李、蔡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①。陈独秀留蔡和森在党中央作党的宣传工作，派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派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工作。

李立三到长沙，立即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去见湘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并向他介绍情况说，湘区党正在按照“一大”的决议，集中主要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安源地处湘赣边界，有株萍铁路连接，和湖南省关系密切。那里有矿工一万三千多人，还有株萍铁路工人一千多人，他们受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富于革命传统，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党的“一大”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湖南党组织已经和那里的工人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那里迫切需要党去领导，他希望李立三去那里开辟工作。李立三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去安源的任务。毛泽东还告诉他，我们首先需要利用合法的方式，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接近，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而最好的合法形式就是去搞平民教育。长沙有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那里工作，你去他那里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事情就好办了。李立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好了去萍乡的手续后，毛泽东又亲自偕同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等三人一起去安源。当火车经过醴陵的时候，李立三只从车窗上望了一眼离别已经三年的祖屋^②，就直奔渴望已久的战斗岗

^①李立三1950年3月4日所填写的《干部简历表》上说：“1921年冬季从法国回来，直接在上海入党，没有介绍人，没有候补期。”

^②李立三家住阳三石，就在醴陵火车站附近的铁路边上。

位。

到安源，毛泽东、李立三等以湖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身分，“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接触，并向他们“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①。

李立三到安源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官府通行的四六体文体写了一个给萍乡知县的呈文，说为了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要在安源开办一所平民学校。县知事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会的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觉得这个办学宗旨“有利地方，符合要求”。他很欣赏呈文的文字，又听说李隆郅是归国的留法学生，三天后就找李立三谈话，批准了办学的要求，并应李立三的请求，把那个四六体的呈文添头加尾作为布告贴在街头，以示县衙门的保护和支^②持。

李立三得到了这个合法的身分，在工人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在安源五福巷租到一所房子，挂上平民小学牌子，招收了三四十名八、九岁的工人子弟，就正式开学上课。他白天给小学生教“人、手、刀、尺”，晚上去访问家长，整天在工人区里转来转去，热心劝工人学文化。工人们最初称他为“游学的李先生”。在李立三的动员下，平民小学的人数很快猛增到五六十人。特别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活动，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组成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积极分子。李立三向他们提出，并且通过他们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这所学校由工人凑了些长短高低不齐的桌凳，只有二十几个学员就开学了。这时，

①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②《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党的湘区委员会又派蔡增准来安源帮助李立三办学，李立三就可以集中力量注意对工人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了。他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的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会学员认识这两个字之后，就把工人两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工人两字连起来就是‘天’字”。这不仅教会工人认识了第三个字，还借题发挥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批判那种瞧不起工人阶级的反动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再比如工人称他李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字，然后在牛字下边划一横，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风趣地说：“先生”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并不高明。以后你们就不要称我先生，就叫我隆郅吧。从此，工人都亲切地称他老李或能至^①。

李立三为了学习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曾写信给在北京从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老同学罗章龙，表示愿意抽时间去那里“取经”。在得到罗章龙的回信后，他就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间去了北京。罗章龙带他参观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铁路工人俱乐部，向他介绍了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搞工运的经验，并介绍他和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认识。北京《工人周刊》第一次刊登的安源成立工人补习学校的消息，就是李立三这次带去的。

李立三从北京回到安源，加强了工人补习学校的马列主义

^①隆郅和能至谐音，而能至二字比较好写好认，因此李立三在安源通行的名字是李能至。

宣传工作。对外，他们使用的是当局规定的国民课本，实际上使用的是自编的教材。李立三自己动手刻蜡版搞印刷。“阶级斗争”、“劳工神圣”、“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何谓帝国主义”、“为什么要革命”、“社会主义”等等题目，都是教材的内容。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人周刊》在补习学校也可及时读到。通过宣传，使大家认识到“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关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决压迫之必要与可能”^①。李立三还为工人编写《工农联盟歌》，配上旧谱子，教会工人们唱：

我们工农创造人类衣食住，
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
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定是工农的。

直到现在，它还是安源老工人能够哼唱的一首历史的战歌。

一九二二年初，李立三吸收八名先进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第一个团支部。不久，又从团员和先进工人中发展了周镜全、李涤生等六名党员，同年二月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他经常用一双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说明工人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革命道理，“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话者

^①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日众，最后乃共同集议组织俱乐部。”^①三月十六日召开了有十多人参加的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推选产生了五名筹备委员，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四月一日又召开第二次筹备会，专门讨论俱乐部报县衙门立案的呈文。呈文由李立三起草，他把“联络感情，函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写进了俱乐部的宗旨，以便争取合法地位进行活动。筹备会讨论通过后，由李立三、朱少连、蒋先云等十人联名报送县衙门，很快得到批准。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决定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选举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字匾牌在牛角坡五十二号门外悬挂起来，并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俱乐部成立大会。会后，补习学校的学员和俱乐部部员由李立三带领，冒雨举行了安源历史上第一次工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沿途有许多工人携带家属参加进来，使得出发时一百多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游行归来，李立三登台作了讲演，他说：“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这次的游行很成功。现在宣布一件大事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要知道，职员是金边饭碗，我们是泥巴饭碗。职员的金边饭碗找不到，我们泥巴饭碗打烂了到处可以找。所以我们不必怕丢掉这只饭碗！团结起来，我们一定会胜利！”^②群众

①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②《红色的安源》第101页。

队伍中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的口号声。晚上，俱乐部在广场上为群众演出了“文明戏”和各种游艺。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报刊报道了这个消息；党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也提到：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①。由于它宗旨明确，方法得当，很快赢得了广大工人的拥护，短短四五个月，入部工人就达到七百多人。

俱乐部成立后，李立三又在俱乐部干事会上，提议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合作社于七月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除了经营油盐米茶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尤其是后一项业务对免除矿工所受奸商剥削有极大作用，深得工人欢迎。

俱乐部的迅速壮大和工人斗争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路矿当局的恐慌。这一年九月初，矿局乘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汇报工作和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离开安源之机^③，勾结军阀，以“杀身之祸”恐吓俱乐部临时负责人蒋先云和朱少连等人，企图赶走他们，以便借机封闭俱乐部。党支部领导工人坚决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之后，矿局又请萍乡县知事“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路矿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纷纷要求起来斗争。

就在这时，毛泽东来到安源。他召开了党组织会议，听取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1922—1926）第7页。

② 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中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③ 《长沙大公报》1922年9月6日关于长沙土木工会成立的报道。

了汇报，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领导罢工斗争的策略作了指示。九月九日，李立三从长沙回到了安源，立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

九月十一日，俱乐部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同时发表致萍乡矿长函，揭露和斥责了路矿当局破坏俱乐部的阴谋，向当局提出了“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和七日内偿清积欠工人的工资等三项要求，并且限于十二时以前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当为最后之对付。”

十二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罢工问题，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指挥部，并决定李立三暂时隐蔽指挥，让新到安源的刘少奇常驻俱乐部应付一切。会议还讨论决定了复工条件十七条，作为全体路矿工人斗争的共同目标。与此同时，俱乐部收到了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罢工的来函和毛泽东的指示，鼓舞他们率领工人群众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要他们注意斗争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根据这一指示，李立三和刘少奇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罢工口号。

九月十三日，全体党团员和俱乐部骨干动员起来，紧张地进行了大罢工的最后准备。他们指出不举行罢工，工人已无出路，必须准备罢工；俱乐部罢工命令一下，就要齐心协力听从指挥，才能胜利。他们还在工人中组成工人纠察队并进行了必要的训练。

安源一带红帮势力很大，很多工人参加了红帮。为了争取红帮对罢工的支持，这一天，李立三提着一只公鸡和其他礼品，由两个加入过红帮的工人带领，去见当地红帮头子。红帮头子一

见工人俱乐部主任来见，十分高兴，连称李主任光临十分荣幸。两人喝完鸡血酒，李立三说，我们要罢工，罢工是为保护穷人，为穷兄弟谋幸福，请你讲义气，多帮忙。红帮头子拍着胸脯说：一定帮忙。李立三立即向他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

（一）鸦片馆关门；（二）街上赌摊收起来；（三）不发生抢案。红帮头子连拍三下胸脯，表示三项要求都包下了。随后他写出布告，把一二两项要求写上去，要全体红帮徒弟遵守。

十三日午夜，罢工总指挥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震动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九月十四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实现后，路矿当局和官厅都十分惊慌，赶紧调来军队成立戒严司令部，企图寻机镇压。军队曾一度占据工人俱乐部，但被愤怒的数千工人奋力夺回。矿上反动工头们出高价收买一些“亲朋好友”入窿破坏罢工，又被工人纠察队制止。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悬赏六百元，派人刺杀李立三，但李立三早已隐蔽起来。工友们还发表宣言，指出如李能至被害，“当使路矿职员不得生离安源”^①。

十五日路矿当局派出全权代表同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会谈。他们提出先开工，后商条件，当即被李立三严词拒绝，会谈毫无结果。十六日，路矿当局要求俱乐部派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刘少奇任全权代表出席这次谈判，军阀戒严司令用杀头威逼他接受“先复工后谈判”的条件。刘少奇临危不惧，厉声痛斥军阀无理。此时，外边数千工人包围会所，吼声如雷，迫使军阀软了下来，表示愿作双方调停人，从速解决罢

^①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工问题。十七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都因燃料告罄而出现停机的危险，这几处一旦停机，所有矿井就将报废，迫使矿长李镜澄出面，提出由路矿当局、商会、俱乐部三方代表，以俱乐部所提十七条为基础，商谈复工条件。当晚，李立三出席三方代表会议，谈判到十八日凌晨二时，完成草约十三条，天亮后签订了正式条约。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①

十八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场召集庆祝大会，到会工友一万多人。李立三在工人持旗簇拥下来到会场，全场掌声雷动，执帽欢跃，以欢迎之^②。李立三登台宣布罢工胜利后，发表了演说，指出这次斗争的胜利只是我们出头的第一日，还有许多痛苦留着以后去解决。他号召工友们“保持这次罢工的团结战斗精神，保持今日的热度去上工”^③。工人们三呼劳工万岁，随后燃放爆竹，由李立三前导在新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入部工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李立三被选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被选为窿外主任。

安源罢工的胜利，震动了全国，特别是华中地区的工人阶级更受到了直接的鼓舞。同年十二月，李立三主持了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实现了由安源煤矿、下陆铁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以及长江轮驳公司等五大企业的工人大联合。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一片反革命白色恐怖，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势力，使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成为全国工运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

①②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③《红色的安源》，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页。

桃源”^①。

李立三在安源工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罢工胜利后形成的一首民歌《罢工歌》^②中，歌颂他说：

工人受苦难尽表，
有一英雄天下少。
名号隆邓李先生，
出洋俄（法）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
祖籍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
要救工人出牢墙。
.....

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

“二七”罢工失败后，党中央调陈潭秋、林育南、陆沉、庄有仪等去安源工作，同时通知李立三担任党的武汉区委书记，要他速去那里重建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时，安源的反动派布置了暗杀李立三的计划。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周密保护下，他化妆成火车头上的烧炉工，同他的夫人李一纯同车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②《罢工歌》（又名《劳工记》）是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一首长诗，有多种流传的手抄本，这里引用的是1952年工人李桂荣整理的本子，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秘密离开萍乡，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底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武汉做秘密工作九至十个月，没多大成绩，只是恢复了一些支部。”^①党的三大以后，李立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武汉开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但据包惠僧回忆：“实际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张桓九、雷大同等从中作祟，李隆郅对这一工作是一筹莫展”^②。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中央和孙中山商定指派李立三、廖乾吾和刘伯垂作为武汉国民党代表出席大会。会后，李立三没有再回武汉，被党中央调到上海担任党的上海地委（后改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③。

上海是我国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但由于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经验，工运还是很薄弱的。上海地委曾向中央扩大执委会议报告，“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④。李立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上海来的。他到上海后，和邓中夏一起，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⑤，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从一九二四年三、四月开始，逐渐在上海沪西、沪东、浦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答“红卫兵”问》（记录稿，未刊）。

②包惠僧，《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1954年2月9日）。

③中共中央《李立三同志的悼词》和李立三几次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④《中共中央三届三次执委会文件·附二：上海地方报告》，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1922—1926）》第31—33页。

⑤《民国日报》1924年3月17日。

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七处办起了职工夜校。李立三、项英、蔡之华、恽代英、杨之华、刘华、李一纯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平民学校和职工夜校的教师。作为党的上海地委工委负责人，李立三每个星期轮流去每所职工夜校上课一次。他不分昼夜奔走在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基层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党组织真正在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子。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党组织首先在小沙渡创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接着成立的还有吴淞工友俱乐部和沪东工人进德会。李立三除了抓全面工作之外，还亲自兼任吴淞工友俱乐部主任。就在李立三同邓中夏一起乘火车去吴淞筹建工友俱乐部的时候，邓中夏对李立三说：你这个李隆郅的名字太难认难写了，是不是改一下？李立三接受了邓中夏的建议，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立三。从此，“李立三”这个名字，便很快为上海工人阶级所熟悉^①。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沪西区内外棉八厂的日本监工野蛮殴打女工引起工人的反抗，并举行了抗议罢工。八厂工人呼吁其他日本纱厂工人给予支援。这个消息经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渠道，迅速传播到沪西各个日本纱厂中去。各厂工人纷纷酝酿斗争，支援八厂兄弟。党中央和上海地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调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郭伯和、刘华等同志去潭子湾，在李立三、邓中夏领导下，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二

^①同时期，李立三还用过李成的名字，见于党内文件和会议记录上。

月十日，罢工工人在潭子湾荒地召开群众大会，李立三第一次在上海工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工人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老工人回忆说：听了李立三讲话，看见他的热情而诚恳的态度，很为感动^①。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罢工斗争迅速扩展，同盟罢工从内外棉五厂开始，席卷了十一个内外棉纱厂。到二月十八日，上海市有二十二家工厂、三万五千多工人卷入罢工斗争的洪流。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罢工坚持了二十多天，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央请中国商人出面调停，劳资双方签订了复工协议，罢工于三月初胜利结束。这次罢工迫使当局和厂方实际上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存在，保证不准随意殴打工人，并全部释放了被捕工人。这在上海工运史上是空前的胜利。

二月罢工以后，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实行疯狂的报复和反扑。他们拒不履行复工协议，无理开除工人，引起纱厂工人再次罢工，以示反抗。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日本职员枪杀带领群众进行说理斗争的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

这一天，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会议，听取李立三关于小沙渡罢工的详细情形和党应采取的政策报告。傍晚时分，会议得到小沙渡日本纱厂枪杀顾正红的消息，当即议决派李立三“即赴小沙渡”指导行动。李立三到小沙渡后，立即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陶静轩及全体二万五千工人的名义，写了一个《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广泛散发。这个传单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

^①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载《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

新罪行。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根据党的决定，五月十八日在会文路荣业里召开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选举了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①。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上海政治形势和党的行动策略。李立三向会议报告了日本纱厂罢工斗争的形势，向会议提出建议说：“在这种形势下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②蔡和森提出了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的正确主张，得到李立三等多数同志的坚决支持。会议决定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并决定了联合资产阶级反对租界当局“四提案”的策略。为了统一指挥这次示威，党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立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③。

五月三十日，二千多名学生在党的组织号召下，分头去公共租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发表演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上海租界的“四提案”，形成了广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开枪，杀死上海大学生何秉彝等十三人，伤几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党中央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组织各阶级统一战线，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和“四提案”。李立三又连夜召集各工会干部

①《上海总工会呈报筹建经过》（《国民通讯》稿）和《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②上海地委会议记录。

③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党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李立三《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说叫秘密指挥部；李立三答《“红卫兵”问》说自己任示威总指挥。

在宝山路宝山里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部署了三罢的斗争^①。

三十一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上海二十一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会议公推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不久，刘少奇来上海任总工会总务主任）。会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后迁共和新路），公开挂牌办公。上海总工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上海各行各业全体工人实行总同盟大罢工，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六月二日，霹雳一声，全上海实行了罢工、罢课、罢市。

六月四日，根据党中央决定，总工会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李立三主持，研究“三罢”期间统一各界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市反帝运动。

六日，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同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并公推李立三、林钧和梅电龙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十七日，总工会等二十团体在闸北召开十万市民大会。李立三在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上海人民坚决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大资本家所控制的总商会擅自篡改十七项条件、破坏爱国运动的行为。

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和李立三，成为当时帝国主义反动派最仇恨的目标，上海公共租界殖民当局说：“工部局心目中的罢工领袖为下列六人：1. 林钧：浦东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联重要分子……；2. 刘一清：安徽人，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联的重要分子；3. 李立三：总工会主席，经常散发大批款

^①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

项给罢工工人……。工部局认为倘将上述六人看管并严加惩处……则目前的紧张局势即可结束”^①。在这样背景下，破坏总工会，刺杀或逮捕李立三的阴谋很快就到来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反动派先派出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到总工会李立三办公室，企图用谈话稳住李立三，等待流氓打手的到来。李立三发觉这个没完没了纠缠他的人有问题，立即机警地托词出来，向初到上海不久，一般人都还不太认识的刘少奇布置，要他赶快去调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又叫会计赶紧把现金锁在保险箱里。这时，流氓打手已经从前门打了进来。李立三布置完工作见大门无法走出，就赶紧上楼，翻上屋顶，又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个工人家里。好心的工人老奶奶把李立三锁在阁楼里藏了起来。李立三托老奶奶在邻近找来四五个工人，又让工人分头去通知各工会办事处立即派二百名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动员所有纠察队保护各办事处；并部署第二天举行全市工人大示威，反对捣毁总工会。接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工人保护下赶到上海戒严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迫使戒严司令部派兵把流氓打手驱赶出总工会。李立三率领工人纠察队抢救了被打伤的七八个工人后，即去党中央，报告了他的应急的措施。中央同意了李立三意见，第二天举行了工人大会和抗议大示威。但时隔不久，奉军戒严司令部终于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

为了推动北方的群众运动和保障李立三的安全，党中央派李立三于八月二十七日动身去北京^②。十月下旬，中央又派李

①《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

②刘少奇在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上说李立三去北京是为了催促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见《上海总工会会议记录》。

立三和蔡和森、向警予、李一纯、沈泽等民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李立三以 Чунь кон-Ю 的化名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支援中国革命。会后，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①。

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总指挥和 南昌起义的政治保卫处长

一九二六年四月下旬，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广州，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立三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分出席，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邓中夏、刘少奇一起，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李立三先后作了三次报告，即五月三日的《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报告、五月四日的《世界工会运动状况》报告和五月十一日的《罢工战术》报告。五月十二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概括的总结：“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发生了‘二七’运动，这个运动是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先声。第二次（劳动）大会以后，发生了‘五卅’运动，这一次运动是工人领导国民革命的表现。这次大会——第三次——之后，必有更热烈的运动的发展，现在可以预料的”。大

^①参见向青：《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集。

会选举李立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①。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成立，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办事处直接领导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会组织，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已迁来武汉办公^②。李立三以全国总工会主要代表的身分，活跃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

同年十二月，李立三参加了党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湖北区委兼汉口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工作。李立三参加区委兼地委，分工负责职工运动^③。他和刘少奇、项英等人组成了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李立三任书记。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讲授《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和《国际职工运动》等六门课程^④。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群众集会，刀杀我国工人一人，伤十多人，引起群众示威抗议运动。

①见《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

②日本支那事情社编：《长江流域之劳工运动》，1927年4月23日出版。

③见《十二月特别会议关于三省党务决议案》。

④《工人运动讲习所课程》，1980年在武汉发现。

一月四日晚上，中央临委讨论决定群众示威可以进入租界。一月五日，李立三主持在汉口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群众大会。大会正在进行时，李立三接到张国焘代表中央临委写来的指示，命令他在指挥群众游行时不得进入租界，以避免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李立三按照这个指令，宣布了群众游行的路线，并在进入租界的各个入口处布置了纠察队。但是游行开始后，愤怒的群众自动冲进了英租界。鉴于这种情况，李立三也随群众队伍进入了英租界，支持和领导了群众的行动。工人纠察队占领了英国巡捕的捕房，拆毁了殖民当局设置的路障和墙堡，造成了收回租界的既成事实。随后，英帝国主义被迫和武汉政府谈判，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

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到武汉，李立三任“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总指挥，并代表武汉工人在大会发表演说。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还针对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阴谋特别指出：“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立刻迁鄂，亲自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①

一月上半月，李立三、项英、刘少奇等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李立三向大会作报告并致闭幕词。大会原选举李立三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由于职务太多，他辞去这一职务，改由向忠发担任，他担任外交主任。

二月十六日，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开幕，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李立三代表全总致词；十九日又向大会作了国际职工运动概况的报告。二十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又在汉口召开了全国总工会扩大执委会议。三月四日，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三月九日，他在邮电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三月十四日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出席军民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说。三月十五日，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出席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三月三十一日，全国总工会欢宴国际职工代表和苏兆征委员长来汉办公，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致欢迎词。

四月上旬，中央临委三次开会专门研究讨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问题，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组成一个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贯彻中央决议，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斗争。李立三等一行四人于四月十三日，即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来到上海。四月十六至十八日，他们连续开了三天的特委和江浙区委联席会议，李立三向会议传达了中央决议精神，宣布了特委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决定：与会者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出兵东征讨蒋的意见书^①。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尹宽、周恩来六人签名，发给了党中央^②。

四月下旬，李立三回到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四月二十七日大会开幕，李立三被选为大会

^①参见《上海特委会议记录》。

^②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并在会上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五大”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月三十日，中央常委会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成立以李立三为首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李立三还兼任全总党团干事会书记^①。

五月中旬，太平洋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此时，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公开出版。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同志主持和领导了这次大会。李立三为大会致开幕词，作了政治报告，被大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

七月十二日，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央政治局改组，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中央常委作出了中央机关转赴九江、上海的决定，并派李立三先期赴九江了解情况。李立三和邓中夏于七月十七日到达九江，不久谭平山亦到九江。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在九江开会研究了全国和南昌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一致认为应该把我党掌握的军队集中南昌，联络贺龙的二十军一道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李立三把他们的意见写信报告了中央。随后李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于是，他们提出了二十八日军队集中南昌的建议，并急电

①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1927年7月10日天津《大公报》。

中央。中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重大决定，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等为前委委员。八月一日，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李立三兼任前委政治保卫处处长。

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同时也负责情报和民运工作，负责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为部队搞运输等等。在南征路上。一次，李立三率领战士出外工作，途中和国民党反动军队遭遇。我军立即派兵援救，打退了敌人，但却不见了李立三。大家都说他牺牲了，于是由周恩来为李立三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正在进行中，李立三带着一些战士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

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李立三和其他同志分散从甲子港乘船经香港转上海，向党中央写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详细叙述了起义和南征的主要经过，总结了这次起义政治、军事、土地政策、财政、宣传、党务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是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经验的珍贵文献。

在“六大”前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前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因而没有获准参加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同南昌起义前委的全体成员一起受到了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所给予的警告处分。此后的一个多月，李立三在中央招待所，等待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和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后，中央决定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立即赴香港设立广东省委，恢复广东省党的工作，并继续全面贯彻执行十一月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各项政策。

十二月下旬李立三来到香港，立即召集在港的同志开会，恢复了广东省委，开始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并决定一月一日召开省委会议^①。

经过几天的调查，十二月二十八日，李立三写了《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详细汇报了广东省各地党组织状况和斗争形势，指出：“现在广东客观情形，革命仍是高涨，所以决定继续暴动策略，第一步在西江、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②这个报告整个精神是贯彻十一月会议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左”倾论断和普遍暴动的冒险主义政策。但是李立三看清了广州起义后，城市革命形势低落的客观事实，因而把发动暴动的地区转向有农运基础的农村和县城，提出了“农村割据”和“包围广州”的战略设想，在当时情势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月一日至五日，在香港召开了广东省委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根据李立三的报告明确规定：“当前主要策略是要极力发展各种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同时恢复广州的工作，积极领导工人的斗争”^③。在这次会

① 《广东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7期。

②③ 《中央政治通讯》第19期。

议上，贯彻执行甚至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十一月会议的各项“左”倾思想和政策，极其激烈地攻击了广州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负责同志。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决定执行“政治纪律”，严厉处分了几乎所有的起义领导人。会议还强烈攻击知识分子党员的所谓“机会主义”，李立三甚至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①，因而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不适当地安排了一些缺乏领导经验的工人同志参加省委领导工作。李立三还把许多受处分的领导干部派遣到各地基层去发动暴动，继续使一些同志遭到不应有的牺牲。

在这种情绪下，会议还对广州起义作出了与中央不同的估计，并写进决议中去。李立三根据省委决议写信给中央，强烈批评党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的确与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指责中央决议是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同志的报告写成的，而这个报告是“虚报中央，掩饰自己的错误”，“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要求惩罚这个同志^②。

党中央接到广东省委决议和李立三来信后，立即发通告指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了。”^③鉴于李立三、广东省委同党中央的意见分歧需要解决，中央于一月二十五日下令调李立三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

^①周恩来：《关于“六大”的研究》。

^②李立三1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③《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中央政治通讯》第26期。

工作，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省委书记。李立三回到中央以后，经过讨论和批评，在根本问题上和中央取得了一致意见。广东省委取消了一月决议，党中央也根据事实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作了一些补充和订正。事实上，李立三和当时的中央并不是不同政治路线的争论，正如李立三自己所说：“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①他贯彻执行了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政策，而在对待广州起义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他在实际工作中搞得更加“左”一些。

同年二月，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广东省委、军委和交通处也全被敌人破坏。二月二十四日，李立三奉命回到香港，“一切均须从头作起”，第二次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艰苦工作^②。这以后，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由于受到党内多方面的反对和抵制而得停止执行了，广东省党的工作也逐渐恢复起来。

四月，党的各地组织都已接到了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和选举“六大”代表的通知。李立三率领广东省代表团赴苏，出席党的“六大”。六月十八日大会开幕，李立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

“六大”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历史经验和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批评瞿秋白“左”

^①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②李立三给中央的报告：《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1928年2月29日）。

倾冒险主义问题上，大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和许多同志，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当时已是低潮的形势。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斯大林曾经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主席团成员。李立三在斯大林面前仍然争辩说全国各地还不断地发生工人农民的起义斗争。斯大林循循善诱地用铅笔在纸上画上表示高潮和低潮的曲线，然后在曲线的最低点又画几个波浪，说低潮时也会发生几个浪花嘛！斯大林说服了李立三以及与会的所有同志，“六大”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没有回国参加工作；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项英等同志回国主持领导全党工作。由于总书记向忠发政治水平很低，因而李立三在党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这以后的两年间，党中央和李立三在总的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李立三回到上海，以肖伯山的化名租了一处房子，以古董商人的身分为掩护，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当时，传达贯彻“六大”决议，转变十一月会议以来的“左”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成为党中央的中心工作。李立三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四月的一年半时间内，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和《布尔塞维克》三个党的刊物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六十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在这些文章里，他宣传了“六大”的各项正确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李立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能坚决的实行革命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能吸引农民的同情，吸引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广大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的解放。革命的前途固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它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所不能执行的任务——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①

关于革命形势，他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一样的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我们主观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②

根据这样的形势，李立三提出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只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

“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才有胜利的保障。”^③

①李立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1928年12月1日出版。

②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出版。

③李立三：《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红旗》第1期，1928年11月20日出版。

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李立三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暴动”、“罢工”、“推翻国民党”。他指出，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煽动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号召我们的同志要深入群众中去，发现和领导群众的“小斗争”，即领导群众解决日常生活痛苦的斗争，“如打人，罚工钱，在车间吃饭，放工不开大门，马桶不置盖……，这些问题是群众时时刻刻感到痛苦，每个人都感觉到的痛苦，很易发动起来，同时也易为得到胜利。”^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李立三写了一篇题为《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逐条批驳了“革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党没有办法”、“现在的人（指党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种种悲观论调和消极情绪。他指出：“很明显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利〔厉〕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样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客观上证明

^①李立三：《每日的教训——十二月二十四日》，《党的生活》第1期，1929年1月出版。

革命是一定要来的。”“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说果子不到口里来，这是极可耻的懒汉”。 “果子生长在树上快要成熟了，赶快准备我们的梯子，上树去摘吧！”他号召党员不要成为群众的落伍者。他说：“俄国多数党在（一九〇五年）失败后许多不正确的倾向的反映是列宁主义克服的；我们党没有列宁，这就要全体同志起来负起这个使命一致努力啊！”^①

一九二九年八月，李立三为党中央写了《反对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发表在党的机关报《红旗》上。他正确地指出托陈取消派的危险在于他们忽视农民的作用，反对土地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死灭，坐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提出了“他脑袋中空想出来的议会运动”。李立三说：“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斯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作一个实际的革命家。”^②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农村斗争，同时也就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四月初朱毛由长汀退出，折古城，至瑞金，于是赣南的豪绅地主大起恐慌……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③。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他介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经验说：“据朱毛几年战争所

① 《党的生活》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② 《红旗》第36期，1929年8月3日。

③ 李立三：《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7期，1929年7月出版。

得战争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①，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一九二九年九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到中央参加会议和汇报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一起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和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汇报。他们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党和红军建设问题系统地表示了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中央对红军的“九月指示”，成为后来红四军古田会议的指导思想的基础。

李立三接任蔡和森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之后，特别加强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吴亮平从莫斯科回国后任中宣部秘书，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统一对敌的决定。李立三亲自到中宣部秘密机关找吴亮平，向他说明，文艺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争吵不休；不要攻击鲁迅，要尊重鲁迅，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群众组织。他布置吴亮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决定并征求意见。吴亮平和冯乃超在内山书店约见了鲁迅，经过会谈，鲁迅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潘汉年和冯雪峰在此前后也同鲁迅谈过话，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成立的文艺团体称为“左联”的提议也征得鲁迅的同意^②。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在中央文委具体

^①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里略去一段。

^②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载《左联回忆录》，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没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亮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十二人筹委会，积极进行成立“左联”的筹备工作。两个多月后，即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的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是两人商谈过的。“左联”的成立，统一了党领导的文艺队伍，进行了有力的文化反“围剿”斗争，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九二九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反对派（指托派）在党内的活动，更须予以理论上的指斥，组织上的制裁”^①。李立三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写了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其中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章中，就列了“帝国主义怎样统治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三个题目，引用大量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材料，系统地批驳了陈独秀所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等谬论，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特别是坚持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党的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说明党的基

^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9期，1929年8月1日出版。

层组织，在极端困难的白色恐怖形势下，经过艰苦的斗争，已经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三〇年六月，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多人，在全国三百多个县开展游击战争，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小不等的十几块。同时期，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发生了反动统治的危机。这种形势使得无时不在渴望革命高潮的李立三，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内普遍危机和世界革命高潮正在生长，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论断，特别是它一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倾向，强调要开展反右倾、反尾巴主义的斗争，为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实际上，从一九三〇年三、四月开始，李立三的“左”的思想倾向就日益发展起来。这一年三月，他写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一文，就明确说：“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而提出了建立“力争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的任务，并说“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①。四月，他又进一步说：“现时形势，无疑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而且“只要是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②不久，他又提出了“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③。一九三〇年五月，李立三把上述意见编在一起，写成

① 《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② 李立三：《论革命高潮》，《红旗》第94期。

③ 李立三：《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红旗》第96期。

《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提出了“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且按照这些“左”倾错误思想，开始部署一系列“左”的诸如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群众运动，在实际工作上，开始改变了“六大”以来的正确政策。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他六月九日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它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个决议中，李立三把上述“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历史上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这个决议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决战的可能”；要求以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决议认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认为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因此要用主要力量搞城市政治罢工和暴动，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反对“以乡村包围城市”和“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的“极端错误”观念。

这个决议重弹“不间断革命”的老调，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那种认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革命的转变，是“严重的错误”。

决议号召坚决反对党内“怀疑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的

极严重的右倾观念。”^①

《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无怪这个决议传到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说：李立三发痴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不同意决议的提法，建议不要下发。李立三说罗伯特右倾，妨害党的领导工作，不理睬他的意见，强行通过和发表了这个决议。这以后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发来一系列函电，表示了不同意见，批评中共中央不尊重国际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六月二十一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了抗议信，除了为六月十一日决议辩护外，还要求停止罗伯特在中国的工作。七、八月间中央政治局又几次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或打电报，要求批准中国党的武装起义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全世界发动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给中国革命以积极的和切实的援助，甚至要共产国际改组远东局。

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何孟雄、林育南等一开始就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但都遭到李立三的压制，有的则当做右派给以严厉的处分。

这个决议通过后，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七、八两月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以便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同时调动红军向武汉进军，配合武汉暴动夺取武汉，想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①以上引文见《六大以来》（上册）第83—92页。

当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统治中心，我们党手中最主要的力量，只有由共产党员曾中生所掌握的一个学兵营。李立三通过南京市委部署学兵营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机关，夺取整个南京城，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曾中生向组织反映，仅以学兵营的兵力占领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起义不可，也应在起义后把部队拉出南京去打游击。李立三七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暴以占领南京为目的，绝不是逃跑。因此必须以攻打国民政府，推翻其最高指挥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党内反对这个布置的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予以党纪的制裁。李立三主观地认为南京兵暴最为成熟，最有把握，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他甚至重新部署进攻武汉的工农红军得手后，不必向东发展了，因为南京兵暴肯定解决了南京的问题，红军只从武汉出兵北伐打倒冯玉祥，然后沿陇海路东征，夺取整个中原，配合北京、天津等地的起义，实现全国胜利^①。遵照中央的命令，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抓紧发动南京兵暴，并且一开始就采取公开发动群众的办法，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致使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暴露，引起敌人的密切注意，遇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六月至十月，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全市党员被捕一百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宪兵连、军官团、学兵营等国民党士兵支部的党团员，由于搞兵变而暴露，遭秘密杀害的至少有四十人，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②。南京兵暴的计划终成泡影。

^①参见1930年8月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②参见南京市委档案馆有关资料。

武汉暴动的命运也是如此。当时武汉仅有党员二百多人，赤色工会会员一百五十多人^①。按照李立三布置，长江局组织起义的结果同样使党组织暴露，党员被捕牺牲很多。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载《武汉警备司令部十九年度办理共案分类一览表》统计，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十二月，他们共捕获地下共产党员六十人，其中省委级干部五人，特科人员一人，农民运动干部十三人，学运干部三人。被国民党杀害三十七人，判处徒刑十二人，病死一人，自首八人，待判一人。显然，这里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奉李立三命令准备攻打武汉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改变了他的军事部署，在“占领岳州，作打武汉的实际准备”的口号下，七月初攻占岳州，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七月二十六日，乘胜占领了长沙。长沙占领后，李立三觉得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是有把握的，从而使立三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达到了顶点。

七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争取三省总暴动胜利”的号召，并下令调动红七军和红八军攻占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红四军联合会攻武汉，红十军进占九江。

八月一日和三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部署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他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在武昌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月）。

他甚至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于是世界革命爆发，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胜利。他还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它的决定不一定正确；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同他们讲话。根据李立三讲话精神，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八月六日，李立三在总行委成立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为了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的领导各地暴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不仅中央成立总行委，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也要成立总行委。从此，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停止经常工作，合并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搞武装暴动。

这时，传来了红三军团退出长沙的消息。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情况，严厉批评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右倾错误，并下令红一军团西进，会合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

“立三路线”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也是全党起来反抗“立三路线”的时候，不仅党的领导机关有越来越多的干部起来反对“立三路线”，广大奋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干部，也坚决要求党中央停止“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同年七月下旬，在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下，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主要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含蓄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对远东局的态度。八月，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八月下旬，共产国际发出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报。电报同时还要求李立三去共产国际汇报。经过瞿秋白、周恩来两同志的工作，李立三承认了错误。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致国际电，表示接受国际七月的决议和指示，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电报说立三同志态度坚决，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

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与策略上的错误，他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李立三被撤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旅居莫斯科的十五年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同年七月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的调子，说李立三的错误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还说李立三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右叛徒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信不仅把立三错误升了级，而且暗指党的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没有真正执行国际决议。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三中全会的

《补充决议》，承认李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也承认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立即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他预料到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国，因而行前与即将临产的妻子商量，让她产后把孩子送给一位老工人。安排好这件事后，他抛下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①，于十二月五日匆匆启程。

一九三〇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立即参加一连串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会议。他在这些会上，对于自己的错误作了反复、全面、深入的检查批判，表现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库西宁说：“应该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立三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但是，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布尔什维克进布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之中去学习。”“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②

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改用李明的名字，还起了一个亚力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名义进入了列宁学校。一九三一年秋，王明充当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国内来到莫斯科。李立三虽然被王明吸收

^①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是李崇善，李立三走后曾经被捕坐牢，现在已经去世。她同李立三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李立三生前没找到他的三女儿。

^②以上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于立三路线的讨论》，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为代表团成员^①，但是他把打击李立三作为提高自己威望和吓唬别人的手段。李立三回忆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②即使这样，李立三仍然毫不气馁，随时按照王明的需要，参加批判“立三路线”的各种会议，作自我检查；同时又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分配给他的一切工作。

一九三四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中断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一九三五年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指派率领一个技术组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他到阿拉木图后，曾派两批人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由于地理和技术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他又派刘长胜带上由他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一九三六年秋，长征后的党中央第一次打电报到了莫斯科，但是译不出来。康生把已去南俄休养的李立三找回来翻译，这才重新建立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从这时起，李立三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同时主编《救国时报》^③。他工作十分紧张，时常坚持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待人谦逊，作风民主，关心和团结同志，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④。这期间，他还在该报上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与宗教》等署名文

①李立三此时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②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会上的发言。

③最初称《救国报》，后改名《救国时报》。

④张报：《党在国外的报纸——〈救国战报〉》，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5期；又见张报：《回忆李立三同志》（未刊稿）。

章，阐明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一九三五年七月，李立三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王明曾经策划召开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充当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企图通过这个非法的会议选举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派人动员李立三签名作这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李立三严词拒绝了 this 提议，并采取行动进行抵制，使王明的阴谋破产^①。这使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第二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路上丢了一个皮包，王明借机严厉批评他丢了“机密文件”，成为后来逮捕李立三的一个“理由”^②。一九三六年开始，苏联内务部正式指定专人监视李立三的行动。

李立三这期间曾经在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为中国党干部开设的军事学院兼课，具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丰富具体，批判深刻，给听课学员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国，原定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在启程的前夜，王明宣布李立三留下。王明走后两个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了李立三。从此他在苏联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活。内务部人员开始审问他，问他的名字、身分等等。他说：“我叫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使内务部人员十分吃惊，赶紧把他关进一个单人牢房里。事过不久，他们又审问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答“红卫兵”问》；又见李立三1967年6月给毛泽东的信。

②事实上皮包里没有任何机密文件，李立三拒绝了王明的批评。

他，说他是日本特务，任务是刺杀斯大林，等等，并且对他实行了肉刑。李立三严厉驳斥了内务部的无稽之谈，并写信给斯大林揭露了苏联监狱的不法行为。但这一切都是无效的，他被先后转移了几个监狱，生活条件极端恶劣。

李立三爱人李莎^①，当时在莫斯科外语师院学习。她每月从二百五十个卢布的助学金中拿出五十个卢布，买些日用品给李立三按时送去。李立三靠李莎的支持维持着生命。他在监狱图书馆，借到许多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阅读学习，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学和俄文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秋天，李立三的案子急转直下。监狱负责人找李立三谈话，再不谈日本间谍的事情，而是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说“中共‘六大’决议是机会主义的”等等。李立三申明他要控告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这个负责人对李立三说：周恩来最近到了莫斯科，你是否到他那里去谈谈？李立三说，我不想干扰周恩来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苏联内务部人员把李立三送回家去，对李莎说：“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宣告了对李立三的无罪释放。李立三在李莎协助下，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用俄文写了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控告书。十一月十一日，他把这份控告书，送到共产国际，并且会见了周恩来和任弼时。十一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李立三的控告。周恩来出席了一次会议，中间插话支持李立三的一些论点。但周恩来不久就回国了，李立三的案件被拖下来，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

^①李莎，苏联人，1933年同李立三相识，相处三年后，由于非常赞赏李立三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活动而同他结合。

作出结论，说：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通通搞清了，但他在中国党内问题，还得中国党去作结论。因此决定停止李立三的党籍。

李立三出狱后，没有工作，户口也不准落在莫斯科，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金生活。他求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许多部门，都不受理，最后得到共产国际秘书曼努意斯基的帮助，才得以回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部去当翻译。此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党中央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以普通居民的身分参加挖战壕和防空警戒。在最紧急时期还曾一度随着出版社机关撤退到恩格斯城。粮食严重缺乏，他每年要到莫斯科郊外种植马铃薯。

一九四五年六月，郭沫若到达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据郭的日记记载，李立三曾三次会见他，作长时间叙旧。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同志，并请他对自己所翻译的《俄罗斯人物》和小说《考验》提出批评意见。在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请他转致党中央一封信，要求党中央向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

郭沫若回国不久，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外联络部干部找李立三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为了作回国准备，让他先去阅读中国报纸，了解国内情况。这时期他读了《论联合政府》，知道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消息。苏共负责人还问他对于被捕事情有何意见，他说：“被怀疑是难免的，现在弄清楚了，苏联是正确的，斯大林是英明的。”^①一九四五年最

^①李立三 1967 年 6 月《答“红卫兵”问》。

后一天的晚上八九点钟，当人们正在欢渡除夕、迎接新年的时候，苏共中央联络部打电话把李立三找去，由部长潘友新和其他两个干部陪同接见谈话。他们一见李立三就十分热情地站起来，祝贺他当选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并且无条件的准许他回国。李立三晚上十一点回到家里，心情万分激动，当即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告诉了李莎。祖国没有忘记他，党没有忘记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能比这更激动人心吗？犯了大错误，在异国羁旅十五年的李立三，他想的是只要能够回国作一个普通战士，参加祖国的解放斗争，就算实现自己的最大心愿了。李立三后来回忆说：这“当然给了我莫大的振奋，但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一九四六年新年过后，李立三立即打点行装，办好手续，于一月十六日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转乘苏联军用飞机，回到了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局城工部长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李立三回到哈尔滨，见到了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身分在哈公开活动的李兆麟。接着，他从哈尔滨去滨县，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李立三和陈云是老战友，早在五卅时期，陈云就是上海印刷工会的负责人，曾和李立三并肩战斗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一九三五年，陈云长征到川西后由党中央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后去苏联住过一个时期，同李立三交往密切，是参加

^①李立三 1956 年 9 月 23 日在党的“八大”会上的发言。

李立三和李莎婚礼的少数几个中国同志之一。李立三在滨县住了十多天，从陈云那里系统地了解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的历史，了解了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由衷地敬佩。他心情激动，百感交集，革命热情又焕发出来了。李立三根据他回国后初步了解的情况，向陈云建议说：我们应该在哈尔滨公开亮出牌子，进行党的活动，以便迅速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陈云说，苏联红军受外交问题的限制，对外不承认有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因此我们还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你又犯了急性病。谈话后陈云对其他同志说：“此人革命精神可嘉，方法未变。”^①陈云还把《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延安出版的《整风文献》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介绍给李立三，希望他认真地读这些书。李立三回忆这次读书的感受时说：“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十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就好象乡下人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②。

三月初，李立三同陈云、高岗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去南满，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于三月六日在抚顺召开，后因国民党进攻抚顺，又撤退到梅河口继续举行。会上在讨论是否占领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另一种意见是，放弃某些大

^①刘达：《李立三的一些情况》（1968年11月6日），未刊稿。

^②李立三1956年9月23日在党的“八大”会上的发言。

城市（必要时哈尔滨也可能退出）和主要铁路线，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李立三同意了前一种意见，并且在会上提出了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发来“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实际上支持了后一种意见。李立三认真学习中央指示，很快发觉自己又主观性急了，遂主动作了检讨^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饶漱石来东北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我方首席代表，并带来中央指示，要东北局派干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东北局决定派李立三和伍修权等人前去。四月，李立三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三人小组工作。五月中旬，李立三随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六月三日，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报告——《东北情况》，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立三路线”错误，汇报在莫斯科十五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他还请求给延安干部讲一次话。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朱德派自己的警卫员孟进跟随李立三，负责保卫工作。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要他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配他的工作。不久，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中央干部和党校学员二千多人发表

^①李立三1967年6月12日《答“红卫兵”问》。

了长篇讲话。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的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称颂毛泽东思想伟大，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并表示了自己今后的决心。听过李立三这次讲话的同志，普遍反映他自我批评精神不错，态度诚恳，有很大的革命干劲^①。

六月中旬，李立三到南京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讲了国共谈判的形势和方针，分派他继饶漱石之后，负责东北地区的三人小组工作。不久，李立三返回东北，立即以东北三人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和林彪代表的身分，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郑洞国、廖耀湘、杜聿明等将领谈判实行停战协定的具体事宜。李立三根据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东北地区我军必要的一段休整时机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六年秋天，李立三回到哈尔滨，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部长职务。这期间，他负责同美国联系，领导了数万日侨的遣送工作，接待了美国的“鲍莱代表团”，处理了被我军俘获的美军顾问人员等。同时，他还负责处理同苏联的联系，经党中央同意，从苏联调回并安排了廖焕星、贺子珍、林莉等人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②。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大反攻，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搞敌军情报，以及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在东北敌军中，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是来东北的滇军，即曾泽生率

^①师哲谈李立三（1980年7月16日访问记录）。

^②东北局敌工部成立于1946年秋，李立三兼任部长，1947年5月改敌工部为城工部，李立三专任部长。

领的六十军和卢濬泉率领的九十三军。李立三先后派遣刘浩（原云南人，九十三军中党组织负责人）、刘生、叶伟、李竞等人携电台，利用一切关系去吉林、锦州、长春进行瓦解敌军工作；还派遣吴铎等人去南满专任城工部长，并写信给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要他亲自过问，“不惜资本开辟这一工作”^①。我军发动夏季攻势攻打吉林时，李立三带领城工部干部到吉林外围指挥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攻打四平战役，李立三也亲自到前线领导这一工作。辽沈战役开始后，被我军围困在长春城内的敌六十军，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感到走投无路，派人同我第六纵队谈判起义问题。李立三派刘浩进城同曾泽生谈判，获得成功，六十军宣布起义。此期间，李立三住在长春外围解放军的六纵队司令部，为组织六十军起义和接管长春，作了大量组织工作。

一九四七年，东北局成立了由李立三领导的、有林莉等人参加的编译小组，一九四八年初就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等翻译成俄文，出版后在国外发行。随后，李立三又报告中央，任用了从苏联回国的徐介蕃等人充实编译组的力量，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中文原版为晋察冀解放区出版），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发行。李立三和夫人李莎始终参加了译文的校审工作。他们还参与了许多中央文献的俄文翻译工作。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工委发出指示，在哈尔滨召开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成立解放区工联，并指定由李立三负责主持这次大会。后来中央决定改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经过一段筹

^① 《李立三给韩光的信》。

备，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八月一日在哈尔滨开幕，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报告。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朱学范、李立三、刘宁一为副主席，李立三担任常务副主席。陈云说：李立三同志是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会后首先成立了东北总工会，李立三兼任主席。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立三路经北平前往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受到了会议的好评。中央指定王明发言检查错误，王明敷衍推托过去，而李立三主动检查错误，恰成鲜明对照。刘少奇在会议总结时表扬了李立三。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回到北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要从事全国总工会工作。同时，他还协助周恩来组织南下工作团，争取国民党谈判代表和负责同苏联方面的联系外事工作，为我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

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身兼数职。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部党组书记、中央劳动工资司司长、中央对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委会委员等等^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成

^①见1930年3月4日李立三亲笔填写的《干部简历表》。

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人民防空十人领导小组，李立三担任秘书长，并主持城市防空训练班。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回忆说：一九五二年前，李立三经常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重要会议，常常是晚间前去，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略事休息，又紧张地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建国之初，李立三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建立和健全各行业和各级工会组织，明确工会任务和方针政策，制定法令和工会工作的规章制度。李立三指出，毛泽东所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为此，工会首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搞好生产^①。全总和劳动部在国营企业中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贡献力量。李立三总结和推广鞍钢工人发展生产的经验，开展了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树立了郝建秀、王崇伦、马恒昌小组等先进典型；在私营企业中贯彻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组织工人搞好生产，同时确立工人参加工厂管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全总按照党中央、政务院的决定，参加筹备和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全国评选劳动模范，推动了全国工人劳动竞赛运动。

全总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努力从事工人的工资福利事业。李立三主持召开劳动工资会议、劳保会议，在开办工人疗养事业和救济失业工人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①李立三1951年4月11日在北京各机关党委和《学习》杂志联合主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李立三注意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他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倾向，也反对党委包办一切，取消工会的错误。他主持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保证工人群众物资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政策法令共六十八项，为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工会建设作了大量的奠基工作。

建国后，李立三十分注意工人群众的生活问题。每到一地工厂视察，他都在大食堂同工人一起进餐，检查工厂的卫生保健和车间保险设施，指示有关部门改善工人的食宿卫生和劳动条件。但是，他对自己在生活方面却要求极严。他的锅炉工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从后勤部门要了一个闹钟，他发现后立即让退回去，然后自己出钱给买了个闹钟使用。他的一件大衣的毛皮是活用的，冬天挂上御寒，春秋拿下来仍然穿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他彻底检查自己周围的不合理待遇和浪费现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扩大的党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定主持全总工作的李立三犯有狭隘经济主义、严重工团主义和工作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等错误，并且强调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的事业极有害的。”陈伯达对这次会议的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李立三在建国初期关于工会工作的一系列的主张和实际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全总这次会议及其决议是错误的。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结果，使工会干部由于害怕犯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错误而不

敢发挥工会的作用，助长了党委包办一切的错误作法^①，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

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以后，离开总工会，专门负责劳动部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他去武汉作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手工业作坊、烘炉，同手工业工人和业主谈话了解情况，在硃口召开武汉地区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座谈会，然后写成报告，向党中央建议发挥手工业的作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李立三积极参加揭发批判高岗反党活动的斗争。周恩来在他的一个发言稿上写了批语，指出李立三同志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灰心，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组国务院领导机构的时候，为了照顾民主党派的席位，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不久，他得到党中央的允许，去南方休假。几个月里，他回了醴陵的老家，但是为了防止人们对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歌颂，他没有去安源，也绕过了南昌。

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建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对这项工作的意见。他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同志。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么？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同志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担任副部长，在这里

^①参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复查结论》。

一直工作到一九六〇年。李立三不计较地位的高低，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中央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一九五六年，中央工业部经过调查研究，结合我国特点，主张改变仿效苏联的一长制原则，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得到中央批准。李立三为制定和推行这一体制制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李立三准备在会上的发言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只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改动，批示可用；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同志都没意见。李立三在大会上的发言再次深刻检查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并且着重检查了思想根源，深刻批判了自己的“猖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他以自己切身经验，充满情感地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表示了感激党的信任和继续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李立三的发言是感人的，发表后在大会内外都得到了良好的反映。

一九五八年初，李立三去黑龙江省的北安庆华厂、齐齐哈尔建华厂（都是军工厂）调查研究，然后在哈尔滨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的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他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①的思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在全国推广。一九六〇年，毛泽东把它规定为“鞍钢宪法”，为促进我国工业体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九年六月间，李立三到东北抚顺调查煤炭工业情况，纠正了那里在“大跃进”中实行破坏性开采的错误，指示

^①“两参”即工人参加管、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

他们必须恢复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他回到北京后，又按照中央通知，赶赴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时，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已经开始。他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很不理解，但也在小组会上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中央工业部撤销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李立三自愿去华北局，继续作李雪峰的助手，担任了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

六十年代初期，为了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李立三曾经去太原钢厂和大同煤矿作调查，及时把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帮助克服了焦炭生产的困难，解决了继续生产的关键问题。回京后，他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工业管理条例（七十条）的起草工作，其中有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部分，是由李立三负责起草的。

从一九六〇年起，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李莎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的高度信赖，以及多年培养起来的深厚情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于一九六二年底交出了手中的苏联护照，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是，李立三仍因李莎的问题受到影响，处境更加困难。他有时主动抓些工作，但常常感到领导上对他的戒备。一九六四年底，他申请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得到批准，去河北省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两公社长期蹲点，后来又去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实际上不再管华北局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立三就被戴上“老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的帽子，列为批斗对象。但是，人们认为他是“死老虎”，一九六六年十月，李立三还以革命领导于

部身分，向华北局机关干部作了一次诚恳的自我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所谓“历史上的罪行”。他们找到李立三，让他“交代”同刘少奇的关系，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李立三同这个联络站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地讲了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和武汉政府三个时期同刘少奇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针对他们给刘少奇加上的“工贼”和“叛徒”的莫须有的罪名，明确地说：

“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①。不仅如此，凡是刘少奇在这期间所作的革命事迹他都如实地列举出来。这期间，各种各样的“造反联络站”络绎不绝地来找李立三，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材料。他以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不怕得罪林彪、江青，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被调查者的历史功过。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为给“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作平反工作，查阅材料时，发现李立三当时所提供的证言都具有这个特点。但是，李立三那时这种正直的态度，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叶群抛出了“李立三反对并企图谋害林副主席”的谣言；“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接见“造反派”头头们的会上，公开点名说李立三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于是，六月五日成立了一个有各地五十八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宣布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

^①《李立三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林如海、王小华谈话记录》。

六十八岁的李立三从此被连续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严重的折磨。他头晕，手脚麻木，已经不能支持。他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他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再接受群众批斗，但是得不到任何答复。六月二十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说：“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他准备从全部党的历史过程中，说明自己的错误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事实。但是他还没写完，来揪他的“造反派”已经走进房中，他把没写完的这封信藏在床单下边，就被揪走了。此后，他被连续批斗，看管在三里河一栋楼房的一个房间里。六月二十二日中午，李立三吞服了大量安眠药，提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走上了自杀的道路，犯了又一个“罪行”；但是他申明“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含冤死去后，看管他的人以“服毒者李明”的名义把他的遗体火化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一大批和李立三有工作关系的同志都被株连，坐牢达七八年之久，有的人病死在狱中。一九八〇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开追悼会时，已经无法找到他的骨灰，骨灰盒里只装上他生前所戴过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的烈火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贞不渝的。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脚注中已列者外，还参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一大”纪念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和资料室等单位提供的或公开出版的有关资料；以及访问何长工、徐彬如、赵君陶、张维桢、张金宝、易礼容、黄玠然、师哲、罗章龙、李一纯、谭天度、郑超麟、吴克坚、卢竟如、魏抱一（李石）、吴诚、张报、张锡俦、李泽、邓清仙、王家元、苏纯古、甘田、高原、赵朴、姜沛南、曾宪林、赵洵、林莉、陈石林、姚卫华、刘仲衡、李佩群等和李立三的家属李莎、李人纪、李人俊、李竞、李英男、李亚兰、李人扬、李人琳等的谈话记录。

毕 磊

卢 权

(一)

毕磊，号安石，乳名澧儿，笔名有三石，坚如等，祖籍湖南衡阳，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澧县^①。后来他家由澧县迁到长沙市定居。父亲毕继沅是一位靠抄写文书为生的小职员。母亲平莲静，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毕磊为长子，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全家人口多，生活相当困难，有时，要靠借债渡日。毕磊自小勤于家务，疼爱弟妹，懂得为劳累得抬不起头的父母亲分忧。

毕磊七岁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他知道自己家贫，读书不易，因此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十四岁时小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而免费升入明德中学后。读书加倍发奋，刻苦用功，深得校长和老师们的器重。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长沙是这一运动开展得较为热烈的地区之一。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湖南青年学生和各界

^①据湖南省民政厅提供的材料（1983年2月）。另一说毕磊出生于长沙。

群众还掀起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念初中三年级、年纪只有十七岁的毕磊，平时放学回家，总是闭门不出，沉默寡言。但学校举行集会时，他也积极参加，师友们的演讲，使他深受教育，有时自己也跑上台去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称赞。

一九二二年，毕磊从明德中学高中毕业。明德中学送他到广州读书，以官费考入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①英语部，并要求他日后学成回来，为母校服务^②。

这年八月，毕磊远道来到广州上学。当时的广州，政局仍十分混乱动荡。尽管他对叛变革命的粤军军阀陈炯明深恶痛绝，对平日非常敬仰的孙中山离开广州避居上海深表惋惜，但他却抱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宗旨，只求在学问上得到深造。

十一月，他与同学褐参化、余鸣銮、苏熊瑞等十余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知用学社的团体，并张贴宣言，公开声明以“求知致用”为宗旨，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宣称“政治立场个人自负责任”^③。他为知用学社编辑了一份《学灯》周刊，由学社社员撰稿，在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刊登，作为该日报之一种副刊。一九二四年，毕磊等知用学社社员在广州市纸行街开办了一所知用中学，以“求革命之知、致革命之用”^④为校训，毕磊担负讲授英语课程。毕磊品学兼优，作风踏实，办事认真，生活俭朴，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与

①1924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成广东大学，毕磊仍在广东大学英语部读书。

1926年，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

②据湖南省民政厅优抚处提供材料，1983年2月。

③④据陈志文：《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8辑。

信任，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渐渐成为知用学社的中坚人物。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孙中山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广东也就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以新学生社^①为核心的广州青年学生运动也开展活动，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新学生社的周围。他们接近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也极力拉拢争取青年学生，支持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加以利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这期间，广州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团体，使得不少原先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也渐渐被卷到政治漩涡中去了。

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阮绍元、莫耀焜、刘范、黎兆葵等数十人，共同组织了一个民权社。毕磊作为知用学社的重要成员，也同时参加了民权社，并成为民权社的骨干分子。民权社创办了一个《民权》旬刊，由毕磊、刘范，许学彬等人主编。民权社标榜信仰三民主义，主张“伸张民权”、“促进民主”、“实行贤人政治”^②等。它的成员

^①“新学生社”是广东地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于1923年夏成立。

^②据林增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对孙科、伍朝枢等官僚政客右派人物表示拥护，只是呼喊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时而三民主义，时而国家主义，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是一个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的团体”^①。同年，毕磊还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②。这时的毕磊，政治态度也同样动摇不定。他崇信三民主义，但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却多少抱观望态度。在他参加主编的《民权》旬刊中，一方面发表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势力的文章，但同时又刊登一些盲目反共的言论。他力图埋头读书，不卷入政治漩涡，但又时常受到政治潮流的冲击与影响，处于矛盾与彷徨的状态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工人、青年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奋起投入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二十多万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决定举行一次反帝政治大罢工。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它象一场强烈的地震，猛烈地摇撼着香港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罢工工人纷纷从香港撤回广州，受到广州工人的热烈支持与接待，广州顿时充满着浓厚的革命气氛。毕磊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国内封建军阀势力相勾结，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任意杀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情景，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心中的怒火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再也无法沉默与回避了，决心与广大青年同学一道，积极投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中。

①据林增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②徐彬如：《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

六月二十二日，由各爱国团体联合组织的广东对外协会召开会议，决定动员全市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于翌日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动。毕磊热烈拥护这一决定，当即与周鼎培等一班同学商量，决定发动广东大学以至外校广大同学参加这一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爱国活动^①。第二天，广州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人民五万余人在广州市区东较场集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广东大学学生亦参加了示威游行，并排在学生队伍的前面。毕磊、周鼎培等积极分子走在前头，用喇叭筒带领学生们高呼爱国反帝口号^②。但当游行队伍行进至沙面对岸的沙基地方时，惨遭英、法等国军队开枪袭击，当场死伤达一百多人，周鼎培亦受伤三处，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当晚，广东大学召开全校员生紧急大会，报告当日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当场一致通过举行反帝大罢课，并组织爱国会、演讲队等组织，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反帝主张，向各界募捐，支援省港罢工工人。周鼎培被选为演讲部主任，毕磊任副主任^③。会后，大家分头出发工作，或在本市活动，或奔赴北江、西江各县进行宣传。

这次血的教训，使得毕磊更加猛醒过来，毅然抛弃“不问政治”、“教育救国”等错误观念，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同时，他也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口头高唱“革命”，而实际却在极力干着谋私夺利的勾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

^{①②③}周鼎培：《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

争的革命党。此后，他主动靠拢由党、团直接领导的新学生社等进步社团，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继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项政治活动，磨炼自己。共青团广东区委和广东大学共青团组织，也及时派人与毕磊联系，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进一步认识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及革命青年的正确出路等等问题。在党、团的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是年九月，由新学生社倡议，并联合民权社、青年军人联合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女权运动大同盟、雷州青年同志社及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等青年团体，成立“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以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毕磊代表民权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九月二十六日，邓颖超代表新学生社参加并主持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毕磊也代表民权社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通过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的宗旨为“本国民革命之精神，联合青年肃清一切反革命派，以实现民族解放”^①。毕磊被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具体分工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在此期间，毕磊与广东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一次“倒邹（鲁）运动”。邹鲁是广东大学的校长，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不顾当时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却与张继、谢持等右派头目沆瀣一气，拉帮结派，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国共合作等活动，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毕磊发动的“倒邹运动”，使得邹鲁在广东大学师生面前空前孤立，只好于九月间溜走了事。毕磊的英勇斗争，获得了大家的好评与拥护。这年秋天，

^① 《工人之路》第96、97号，1925年9月28日、29日。

广东大学学生会进行改选时，广大同学不顾右派学生、“士的党”^①的威胁与破坏，一致选举毕磊担任学生会主席^②。不久，他还被选为广州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锻炼与考验，毕磊于一九二五年秋天参加了共青团。同年年底，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二)

毕磊入党以后，在党的直接教育培养下，以忘我的热情积极为党工作。这时的民权社，不仅有广东大学的学生参加，还有“市师”、广府中学等校学生参加，人数达到二百多人。毕磊带动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毕磊的影响下，其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新学生社，一些人后来还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学生运动中的进步力量也就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毕磊还根据党的指示，与其他同志一道，致力于广州地区学生运动的团结统一工作。他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广泛接触各方面的学生，广交朋友，耐心做思想发动工作，启发和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认识到应以革命大局为重，有力地抵制了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拉拢诱骗一

① “士的党”即广州地区的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因其成员经常拿手杖（英文stick，译音为“士的”）殴打进步学生，叫嚷“要从广东大学打到广州，再打到全国”，因而亦被称为“士的党”。

② 据林增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的左右派斗争》。

③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

些学生加入为右派分子操纵的“士的党”等社团与革命力量相对抗的分裂活动，使学生运动更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英勇牺牲七周年，一月二十一日，则是列宁逝世两周年。广州学联借此机会举行纪念活动，以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振群众之革命精神”^①。毕磊代表广东大学积极参加筹备这项纪念活动，还具体担负了宣传部和募捐股等部门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在新学生社的推动下，广州各青年团体于广东大学大礼堂召开统一青年运动大会，“以统一青年革命战线”^②，毕磊也积极参加这一活动的筹备工作；大会期间，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他主持大会的进行，恽代英等人被邀请到会演讲“关于青年之革命途径”等问题。在大会通过的关于“统一学生运动问题决议案”中，着重指出“在过去之学生运动，尤其是广州，恒有分裂之现象，此实为过去工作之极大错误”；决议号召“青年学生能牺牲其部分之利益及成见”，“为整个的革命运动而奋斗”，“谋日后统一青年运动之进步”^③。大会选举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毕磊、区梦觉等人当选为委员。四月中旬，广东全省青年运动人员大会于广州召开，毕磊以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参加了大会，还具体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在毕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要排除干扰，克服分裂现象，团结起来，为“实现统一青年运动”、“打倒军阀及帝国

① 《工人之路》第205号，1926年1月18日。

②③ 《工人之路》第221号，1926年2月3日。

主义”而努力^①。

为了进一步推动广东全省青年学生的团结与统一，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广州学联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倡议成立全省性的学生联合会，并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联络工作。四月十五日，有五十个县市的学生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的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毕磊作为广州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以广州学联代表的身分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呼吁全省同学共同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会议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欢迎学代会的召开。刘少奇等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勉励青年学生要加强团结，做革命的先锋。毕磊代表学联也在会上发表演说^②。在毕磊及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广东全省学生运动决议案》及《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决议案》等文件。经过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毕磊已锻炼成为广州地区青年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五月七日，广州地区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群众四万余人，于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毕磊代表广州学联，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毛泽东、陈其瑗等人一道，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在大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以誓雪国耻及取消二十一条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相激励”^③。大会进行期间，“士的党”等右派学生组织派人到会场捣乱。毕磊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青年部编：《青年工作》第8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②《工人之路》第295号，1926年4月19日。

③《工人之路》第313号。1926年5月8日。

与广东大学学生一起与他们进行斗争，揭露其破坏阴谋，要求公安局将其惩处。

这期间，毕磊还奉党的指示，以党员身分出现，“做公开的工作”^①。他在广东大学除了做学生工作外，还负责联络和团结教师的工作，沟通他们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发动学生支持配合进步教师的活动。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知名学者相继到广东大学任教。郭沫若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毕磊经常主动同他亲近，向他介绍有关情况，支持协助他的工作和活动，并把他的意见及思想情况及时反映给党组织。三月三十日，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了一次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大会。大会由毕磊主持，邀请郭沫若在会上发表演讲。五月十日晚，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到广东大学参观。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毕磊则代表全校师生致欢迎词。郭沫若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曾对学院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把一批迂腐的清朝遗老清除出校，毕磊发动广大同学积极支持配合郭沫若这一革命措施。在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中，郭沫若曾向毕磊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毕磊便及时将此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告^②。陈延年十分重视，即与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研究，建议郭沫若先参加一段实际工作。陈延年命毕磊将区委这一意见转告郭，再由恽代英找郭沫若谈话。郭沫若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意见，离开学校，于七月间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军北伐去了。第二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①②}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

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毕磊从广东大学毕业。由于工作需要，他又随即转入中山大学文科继续学习，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不久，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职务，协助学委会书记恽代英工作。萧楚女、徐文雅（即徐彬如）等为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管理广东文化教育工作、青年团工作，也管黄埔军校的青年工作”^①。毕磊工作十分积极，经常忙得废寝忘餐。他精干朴实，平时不爱说笑，谈吐简明扼要，头脑冷静，不易冲动，关心同志，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在生活上则十分刻苦耐劳，因经济困难，平日衣食简单，经常穿着一套朴素的中山装^②。但他对此毫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

七月间，毕磊接受党组织的委托，负责筹办并主编以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当时人手奇缺，经费不足，编辑、印刷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毕磊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想方设法地克服重重困难。使刊物很快就能出版，并能够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出版了“北伐专号”（创刊号）、“拥护（省港）罢工专号”（第二、三期合刊）等专刊。

在主编《广州评论》中，毕磊为刊物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在《解决罢工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省港大罢工爆发的原因，是因为“援助五卅惨案而起的”，它“不是一个经济罢工”，而是一场伟大的反帝政治罢工，“是为全中华民族生

^①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

^②据韩托夫1983年7月回忆资料。

存与自由之政治斗争”^①。他在文章中赞颂罢工工人在反帝斗争中的英勇表现，表示“罢工工人坚持奋斗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钦佩，其所贡献于国民革命的更使我们一刻都不忘记”。文章还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向来是顽强狡猾（的）”，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这次罢工问题。文章最后号召：“我们不愿屈服，务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我们誓死拥护省港罢工！”^②又如在一篇题为《最挂心的是中国国民党——为纪念廖先生作》的文章中，他针对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势力加紧向革命力量进攻，制造事端，挑起纠纷，破坏统一战线，压制工农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情况，借纪念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害一周年之际，鲜明地指出廖仲恺的不朽功绩之一，在于坚定地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贯彻孙中山关于民主革命的主张，执行三大革命政策。正因为如此，招致了国民党内“一班反革命派的党员和军队”，“视廖先生如仇雠，藉‘反共产’的名词，来掩饰他们的罪恶，以行刺廖先生”。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他在文章中还着重揭露当时一批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向本党（指国民党——引者）进攻”的一系列事实，指出“他们根本反对国民政府，说‘国民政府已经赤化’；他们根本反对联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干，用不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们要把本党改组以后本党生命之所寄的一切命根，根本打破”。为此，他提醒人们说：“我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难道还不感觉得本党危

^{①②} 《解决罢工的问题》，载《广州评论》第2、3期合刊，1923年7月31日。

机吗！”他要人们很好地“考察”这一切现象！并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能团结一致”，就“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打倒他们！”

关于毕磊在这期间的战斗生活及表现，他的同学范师任曾叙述说：“广州各种热烈的群众大会，由毕磊领导者居多。他在广东虽不久，但他的广东话说得很好。实在说一句，他那活动的的能力比谁都要大，他的责任心比谁都要重，他的革命的色彩比谁都要浓厚！”^①。

（三）

在毕磊短促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最为光彩耀目的一页，就是他与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之间战友般的密切关系与革命情谊，以及毕磊在沟通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党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力量，一九二六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召集区委有关领导人和学生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穆青（广东区委组织部长）、恽代英（广东区委学委会书记兼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李求实（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少年先锋》主编）、毕磊（广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徐文雅（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和熊锐（刚从德国回国）等人开会，研究和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要求中山大学当局聘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恽代

^①范师任：《悼毕磊同志》，载1927年6月7日汉口《中央副刊》第74号。

英、邓中夏、苏兆征等人担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的训育员；要求中山大学聘请当时正在厦门的鲁迅到校任教。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不是一般的“自由人”（知识分子的意思），而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争取他，同右派斗争^①。

其时，正值国民党右派头目戴季陶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陈延年当即与恽代英、邓中夏、毕磊等人研究，由他们几人出面，与戴季陶进行交涉，向他提出邀请鲁迅前来中山大学工作等项要求。由于戴季陶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扩充他自己的势力，也想借鲁迅来广州工作的机会达到捞取政治资本、拉拢诱骗青年学生的目的，因而表示同意，指示顾孟余（中山大学校委会副委员长）、朱家骅（中山大学校委会委员）等人立即发出聘请鲁迅前来中山大学工作的函电。鲁迅经过再三考虑后，毅然决定接受聘请，前来中山大学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做好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亲自进行了部署。他指示中山大学支部一定要全力以赴，并指定毕磊（后来又加派了陈辅国^②）代表党组织负责公开与鲁迅进行联系。陈延年说：鲁迅抵粤以后，你们应该迅速帮助他了解当时当地情况，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自己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陈延年还嘱咐毕磊要多陪鲁迅到各处走走看看。他说：“鲁迅这个人喜欢青年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③

①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

②陈辅国又名陈烈浓，当时为中山大学法文预科学生，共产党员。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叛变时，与毕磊等一道被捕牺牲。

③据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载1961年9月21日《光明日报》。

毕磊由衷地拥护党的决定，决心努力去完成这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从厦门抵达广州，翌日即迁入中山大学大钟楼二楼居住，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文学系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抵校不久，毕磊便主动上门探望他和亲近他，坦率地向他介绍自己的情况和其他情况。鲁迅对毕磊的诚恳坦率态度，一开始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他表示欢迎。接着，毕磊又带徐文雅等人上门探望鲁迅。由于毕磊事先介绍，鲁迅已经知道徐文雅的身分，对徐文雅也“非常诚恳，热情”^①。徐文雅清楚记得这次与毕磊一道前往探望鲁迅的情景：“当时鲁迅正在房子里（大钟楼）翻书，床上桌上都是书报杂志，地下堆着线装书，还有蓝印花土布的行李，许广平站在他身边。鲁迅向我介绍许广平……我们谈了些政治形势。”^②

此后，毕磊“几乎每天都和鲁迅见面”，还经常陪鲁迅去“陆园茶室”吃茶^③，相互间情投意合，水乳交融。当年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欧阳山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我到大钟楼上去找鲁迅先生。推门进去，只见鲁迅和毕磊正在热烈的谈论着什么，看他们两个谈得很得意、很高兴的样子……”^④毕磊为人朴实，诚恳虚心，热情精干，并主动地如实地向鲁迅介绍其所希望了解的各种情况，因而很快赢得鲁迅的器重和信任。鲁迅也对毕磊无所不谈，时常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提出来与毕磊交换意见。甚至连当时一小撮国民党政客右派分子如何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鲁迅、向鲁迅送礼等事情，鲁迅

①②③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

④转引自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

也及时告诉毕磊，因为鲁迅把毕磊看成是我们党所委托的与他“联络的同志”。通过毕磊，我们党也能很快知道“哪些工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和支持，哪些工作鲁迅先生又发表了什么意见……”^①。

为了表达广大青年学生对鲁迅的爱戴和敬仰之情，中山大学党团组织与学生会决定组织一次欢迎鲁迅的活动。为此，毕磊与徐文雅等代表大家邀请鲁迅参加他们的欢迎大会。由于鲁迅已经拒绝过学校当局提出要为他举行欢迎会的邀请，所以向毕磊等人表示不准备参加了。毕磊向他再三解释，说明这次欢迎会是在党团支持下、由同学们自己热心发起，而不是奉学校当局之命行事的。鲁迅听了十分感动，最后欣然答应了。

欢迎会定在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举行。事前，中山大学党组织通过党团员分头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届时踊跃参加；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防止“士的党”等右派分子捣乱，毕磊还周密地布置一些进步同学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做好保卫工作。二十五日下午，在毕磊、徐文雅等陪同下，鲁迅前“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②虽正值放寒假，但整个大礼堂都挤满了人。欢迎大会由毕磊主持，他“虔诚而又兴奋地宣布欢迎词”^③。正在此时，学校负责人、国民党右派分子朱家骅却自行走到讲台上，当着鲁迅的面发表了一阵肉麻的捧场，言不由衷地说鲁迅是“革命战士”、“革命家”等等。

①韩托夫：《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载《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②《鲁迅日记》（1927年1月25日）。

③清水：《我纪念到鲁迅先生》，载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13期，1936年12月5日。

对于朱家骅的鄙恶行为，鲁迅从内心感到憎恶。他当即登台发表演说，毫不留情地把朱家骅的卑鄙奉承顶了回去。他说：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接受。我对朱先生的话要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接着，鲁迅对广州当前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得很。因此，我就来看一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得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红标语，红布标语中还有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真是使人有点害怕^①！最后，鲁迅勉励广东的青年们要敢于冲破沉寂的气氛，说：“在现在，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因为说话总比睡觉好，有新思想的喊出来，有旧思想的也喊出来，可以表示他自己的旧思想之快将灭亡！”^②鲁迅的精采演讲博得了全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欢迎会开得十分成功，富有教育意义，在广大青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毕磊的邀请与陪同下，鲁迅又“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原已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选出“欧阳继统、何思源、刘云门、李绍华、丘启勋、毕磊、李冰若、许金元、陆冠莹等九人为干事”^④，由毕磊负实际领导责任，欧阳继统

①沈鹏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

②转引自坚如（即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载《做什么》第1期，1927年2月7日出版。

③《鲁迅日记》（1927年1月27日）。

④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5期，1927年3月7日出版。

负责处理日常工作^①。社会科学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科学知识”为宗旨，成员主要为中山大学的党团员及进步学生一百余人，还有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骨干四十余人。研究会下面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等组，认真热烈地学习革命理论和进行社会科学训练。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筹办过程中，处处受到学校当局朱家骅之流的阻挠，校方既不给地方活动，又不拨活动经费；后来又声称必须要在学校“指导”下，才能考虑“酌予津贴”。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对于朱家骅一伙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在毕磊的号召与组织下，纷纷捐献活动经费，还捐献了一批图书，开办了一个图书室，组织学生们进行学习。经毕磊的介绍，鲁迅知道了上述情况后，当即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支持学生们这种热情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除亲赴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外，还定期为研究会捐赠活动经费。在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月三十一日，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②十元”，“四月十三日，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十元”。鲁迅的热情支持与指导，更加激励了青年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性。

在加强对鲁迅的团结和联系工作过程中，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还着重指示毕磊、徐文雅等人，要注意经常将党主办的有关刊物送给鲁迅阅读，同时向鲁迅如实地介绍党的有关政策以及对当时形势的主张，以便让他进一步了解党，了解政治局势。当时广东党团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人民周刊》（中共广东

①许涤新：《鲁迅战斗在广州》，载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1980年）。

②泉，钱的意思。

区委的机关刊物，先后由张太雷、任卓宣等主编）、《少年先锋》（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由李求实主编）、《支部生活》（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出版的内部刊物）。此外，在广州发行的，还有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及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毕磊等遵照党的指示，定期将上述刊物送给鲁迅。鲁迅对此十分高兴和重视，认真阅读后还珍重地收藏起来。在鲁迅的日记中，数次记载了这一事情：“一月三十一日，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二月九日，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即《做什么》——引者）三本”等。

鲁迅抵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还指示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与中共中山大学总支专门出版一个刊物，表示对鲁迅的欢迎，并以此作为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陈延年将刊物定名为《做什么》（英文名“what ToDo?”），由毕磊负责主编。筹办过程中，为解决经费困难，曾在党团员中发起过一次“刊物捐”。由于大家都是穷苦学生，一百二十人才共凑到二十七元四角钱^①。鲁迅后来知悉此事，也即解囊捐助了一部分印刷经费，使刊物得以于二月七日正式出版。

在《做什么》创刊号上，毕磊撰写了《欢迎鲁迅以后——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负起文艺的使命来》一文。他就鲁迅在欢迎会上指出“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这一事实，联系谈到广州的文坛方面的情况，也同样是“几乎可说如同一块沙漠，连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但是，广大要求革命的青年对于这种现实“是耐不住的了”！

^① 《中山大学支部周刊》第5期，1927年3月。

“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打破，用全力来呼喊，在这沉静的沙漠上猛喊几声。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为此，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应该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负起我们文艺的使命来，在西南的园地上开发几朵灿烂的鲜花”。

在《做什么》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毕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文章，都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富有说服力和鼓动力，深受读者们的欢迎，也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在后来所写文章中，曾经叙述说：“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①。为了有所比较，鲁迅还特意买了两本由广州国民党反动文人组织的“革命文学社”编的刊物《这样做》回来，与《做什么》相对照，结果发现《这样做》“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是“大相反对的两种刊”^②。对于《这样做》这些打着“革命文学”的幌子而大干反革命勾当的卑鄙行径，鲁迅十分憎恶，后来还特意发表文章，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指出它“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在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③

鲁迅对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情况；过去已有印象，称他是自己的“老仁侄”^④，是一位有出息的青年；经过向毕磊、徐文雅等人了解，对陈延年也就更加敬重。有一次，鲁迅

①②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10月）。

③鲁迅：《革命文学》（1927年）。

④因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很早与鲁迅相识，故鲁迅称陈延年为“老仁侄”。

向毕磊表示了自己想与陈延年会面的心情。毕磊将鲁迅的意见向陈延年报告，陈延年表示同意，并吩咐毕磊与任旭（陈延年秘书）负责安排。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日益明显，形势十分复杂，因此决定两人的会见秘密进行，地点选择在广东区委。

三月下旬的一天，在毕磊陪同下，鲁迅到了座落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广东区委（文明路七十五号至八十一号）。陈延年已在区委二楼会客室等候，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陈延年还向鲁迅介绍了党的任务和策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等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直至深夜才结束。鲁迅告辞出来后，偕毕磊一齐返回中山大学大钟楼^①。事后，陈延年说，这次与鲁迅会见“谈得很愉快”，还说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②。毕磊介绍两人会见的情景时也说：“鲁迅先生在见面以后，流露了非常满意和兴奋的情绪。”^③通过这次会见，使鲁迅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了解，思想更加明确了，从而更有信心地在党的帮助与支持下进行战斗。

三月底，陈延年与苏兆征、彭湃等离开广东，北上武汉参加即将举行的党的“五大”。临行前，陈延年再次召集中山大学党支部和区委学委会的负责人毕磊、徐文雅等人开会，部署今后的工作，同时对中山大学党组织争取团结鲁迅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结性的估计，他说：“我们对鲁迅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效果，今后还要继续抓紧这个工作。”他还说：越到环境

①据徐彬如 1973 年 5 月的回忆资料。

②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七二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 年）。

③据沈鹏年：《鲁迅和陈延年的见面》，载 1962 年 4 月 10 日《羊城晚报》。

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方面来。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陈延年一再嘱咐毕磊等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并反复强调指出：“鲁迅是我们党的真正朋友。”^①毕磊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继续主动亲近鲁迅，与鲁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直至四月十三日，毕磊还收到了鲁迅亲手交给的捐与社会科学研究会作活动经费的十块钱。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驻广州的桂系军阀，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也在广东实行了反革命叛变，对广州地区的革命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进行突然袭击，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分子。整个广州顿时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一支反动军警在“士的党”分子刘范等人的指引下，冲进了中山大学，按预先开好的黑名单进行大搜捕。当时毕磊正在学生宿舍睡觉，不及走避，与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欧阳继统、陈辅国等人一起被捕，押到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院，后又转押到南石头监狱。翌日，广州报纸披露称：“闻军警捕获萧某某（即萧楚女）、容某、熊某（即熊锐）等，在中大学校捕获毕某（即毕磊）等”^②。第三天（十七日），上海《申报》也报道说：“广州共产党分子被捕六百余人，在南关戏院收容。首要为刘尔崧、李亦愚、李森、何耀全、谭其锐、毕磊、萧楚女、沈春雨等。”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毕磊是被列为共产党的首要分子的。

四月十五日清晨，许广平家的老仆人阿斗给鲁迅带来了关

^①据徐彬如1973年5月的回忆资料。

^②据1927年4月16日广州《现象报》。

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恶耗，并说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连到鲁迅身上的。“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①但是，鲁迅非但没有逃走，相反却惦念着毕磊等革命青年的下落与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起身从白云楼寓所赶回中山大学^②。当他知悉毕磊他们已被反动派抓去时，不禁义愤填膺，立即发出召开各系主任会议的紧急通知。下午，他“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③，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在会上，鲁迅首先态度鲜明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主张营救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料想不到的。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怂恿政府抓捕学生，这将怎样解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的同学赶快营救出来^④。但是朱家骅却凶相毕露地胡说什么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异言。这样一来，其他在场的人都只好不再作声了。“鲁迅在这场合，看看不能扭转局势，即表示辞职，以表明抗议这种横蛮无理态度。”^⑤四月十六日下午，鲁迅特别“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元。”^⑥

毕磊被捕后，戴季陶、朱家骅之流曾向毕磊劝降，要他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②这时候鲁迅已从中山大学大钟楼迁到广州东堤附近的白云楼，与许寿裳、许广平合住在一起。

③《鲁迅日记》（1927年4月15日）。

④陈志方：《广州“四一五”我所见到的鲁迅》，载1981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⑤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载《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鲁迅日记》（1927年4月16日）。

“悔过自新”，当场遭到毕磊严正拒绝，痛斥他们叛变革命的行径“卑鄙无耻”。戴季陶、朱家骅当场出丑，狼狈异常地溜走了。毕磊大无畏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口号。反动军警赶忙用铁链将他捆绑起来，用刺刀戳得他体无完肤，然后加以杀害。事后，中山大学反动当局还无耻地张贴布告，宣布开除毕磊、欧阳继统等一批革命学生的学籍。

毕磊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当毕磊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后，鲁迅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而感到十分悲痛。他时常与许寿裳等知己“提起有某人（即毕磊——引者）瘦小精悍，头脑清醒，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①在他以后所写的文章书信中，一再提及毕磊，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毕磊的深切怀念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无耻杀害革命青年的憎恨。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學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②他在文章中叙述道：“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按：应为十五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悍的湖南的青年。”^③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时，鲁迅对于国民党残杀青年学生事，仍然非常愤慨。当他碰到中山大学的同志时，总是显得十分亲热，“他对国民党杀害毕磊等同志的暴行，表示十分痛恨。”^④鲁迅还因毕磊等革命青年惨遭杀害，谈到对自己思想的冲击与震动，他说：

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39年版。

②鲁迅：《致李霁野》（1927年4月20日）。

③鲁迅：《三闲集·怎么写》（1927年10月）。

④韩托夫：《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 “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①。毕磊留给鲁迅的记念是深刻的，他留给我们革命青年的记念也将是永远的。

^①鲁迅：《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

张宝泉

李振民 张守宪

张宝泉是党中央交通的早期负责人之一，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形势下，为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雄壮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全国解放前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多次提到张宝泉，深情地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死得很壮烈，我们应当怀念他。^①

(一)

张宝泉，字仲苍，一九〇一年出生于陕西三原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张宗厚在县城开杂货铺，常入川作生意。母亲是四川人，早年去世。叔父张宗福（字景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任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父亲、叔父和于右任系同乡同学，常有交往，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

张宝泉从小酷爱学习，他先在本县私塾及高等小学堂就读。一九一五年入三原渭北中学，约半载，转学西安省立三中。那时，陕西教育在封建军阀陈树藩的把持下，十分落后。张宝泉和

^①访问马文彦、严信民记录（1979年、1980年）。

不少同学对这种状态极为不满，又加上军阀战争的影响，他在三中上学期间，停课荒疏学业就有一年之久，这使渴望得到深造的张宝泉十分苦闷。五四运动后的革命形势给了他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乃决定奔赴外地求学。一九二〇年农历腊月初八，他和堂弟张仲超及同学张乃华、李伯恂等一行数人，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西安，乘马车在冰天雪地行走七天，至河南观音堂改乘火车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

五四运动之后的京津一带，新思潮风起云涌，青年思想极为活跃。张宝泉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在南开中学，他阅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特别喜读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十分向往。一种对未来社会的炽热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得这个一向总想埋头读书的青年，再也无法在书桌前平定下来了。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时，南开中学的陕西同乡武止戈、屈武、刘尚达等十余人，发起创办了一个进步月刊《贡献》。张宝泉满怀热情地为《贡献》捐款，象园丁一样爱护和关怀它的成长。他和在南开的一些陕籍同学古文基础都比较好，作文成绩一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常得到国文老师的夸奖。办起《贡献》以后，他们决心不写文言文，宁愿不要国文老师的高分和不怕“倒退到才会说白话”的讥笑，和同学们一起，相约用白话文给《贡献》、南开校刊、《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即毕业前一学期，张宝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组织决定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感到能够到向往已久的苏联深造，真是莫大的幸福，因此心情十分激动，积极进行准备，决心不虚此行。

一九二四年七月，张宝泉和陕籍同学武止戈等自天津乘船启程转赴苏联。同期分道赴苏、进入东方大学的还有李求实、刘伯坚、吴化之、严信民等。张宝泉自感革命理论缺乏，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抓紧时间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理论。他性格比较沉静，平时不大说话，但却蕴藏着一腔热情，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关怀备至，每次分发衣物时，总是先让别人选合适的，最后剩下的自己用，劳动中也总是一声不响地抢着干重活，深得同学好评。当时，东方大学中国党团支部定期张榜公布同学的鉴定，张宝泉一向被公认为优秀学员。他在东大学习约一年时间，由于“五卅”惨案发生，国内出现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二五年七月，张宝泉和一些同志相继奉调回国。

(二)

张宝泉回国后，分配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事地下交通。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运动仍然十分关心。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他接到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十分激动，立即提笔复信：“今天接到吾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报告，果中所料。把第二次大会宣言及总报告读了一遍，引起无限的感想，不得不说几句话。”他在信中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中国八十多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现在要使全国民众都明吾国目前的纷乱的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豢养的走狗——媚外军阀——与夫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

说：“怎样扫去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唯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他高度评价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组织民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严肃批评了那种“专好讲漂亮话”，言行不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语重心长地表示希望共进社同志不要做口头革命派。他说：“我并非侮视我们的同志，不过觉得愚者必得的话，为吾社进一言。”他激励大家“抱定此次大会的宣言，努力奋斗，以达到中国十月革命的成功！”^①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是张宝泉革命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

一九二六年三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张仲超在游行示威中惨遭杀害。张宝泉得知极为悲愤，乃函慰家属，其中有云：“仲超为伸正义而死，为求真理而死，虽死犹荣，此恨终有报复之一日。”^②足见其革命愈益坚定。

一九二七年春，张宝泉随中央到武汉。未几，时局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武汉形势渐趋紧张。“七一五”武汉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至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中央机关开始迁到上海，张宝泉担任党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或称总交通），负责市内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地址、通知开会、接待和护送出入上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等工作。

①《共进》第93期（1925年11月1日）。

②《张宝泉烈士事略》中共西安市委编，西安市档案馆存件。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年代，党内交通是一支在无形战线上和敌人拚搏的无名英雄队伍。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出生入死，以高度的机警和智慧，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为党传送情报，接通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是党不可缺少的“血脉通道”。张宝泉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他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悉心学习地下工作的经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自香港到上海，领导整顿和健全中央保卫机关的工作，张宝泉得以有机会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早在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自广东秘密到上海，张宝泉就已经和他有所接触，这对张宝泉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当此党的工作大转变的紧要关头，张宝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很快就适应了形势的要求，逐渐练就了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机警、沉着的工作本领。他原以上海大学学生的身分作掩护，上大被封闭后，又利用陕西同乡的关系，常出入戈登路（现江宁路）原上大校长于右任的公寓（于住南京，此处为于夫人黄仁爱所住），跑市内交通，经常到中央各机关和江苏省委等处传送文件，在他的活动日程里不知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险境，然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革命者习以为常的事情。

一次，天色已晚，张宝泉突然接到上级党组织下达的任务，要他立即设法通知撤掉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镇余里一号^①。这是座落在狄斯威路中段一个里弄里的一幢浅灰色的二层楼房，由长途交通王凯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住在这里。时间紧迫，他顾不得吃晚饭，便匆忙的穿上一件西服上衣，朝镇余里奔去。穿过繁华的闹市拐进狄斯威路进入镇

^①王凯：《忆张宝泉同志》。

余里时，路灯十分昏暗，行人疏稀可数。他靠着一根电杆，点燃一支香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正当要移步走开时，突然一个被路灯照得修长的身影闪动了一下。“尾巴！”张宝泉立即警觉起来。这是他在地下交通中经常碰到的情况。他想：这是敌人发现了自己？还是在监视镇余里一号？为了试探敌人的动向，他甩开步子朝前走去。果然敌人向幽灵似的跟上了他，这样他倒暗自高兴起来。因为只要敌人不是监视镇余里一号，凭着他的经验，适当时候甩掉这个“尾巴”并不是件难事。然而走了没有多远，敌人就又消失了。奇怪！他回过头来朝镇余里望去，方才跟踪他的敌人正在镇余里一号后门和另一个特务交头接耳，随即又向他走来。坏了！敌人果真是在监视镇余里。怎么办？有危险不去了，可以马上走开。可是当他想到党组织要他一定在天亮前把通知送到镇余里一号，否则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络点就会遭到破坏，王凯一家就会被捕，事关重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种对党的事业和对同志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把通知送到的决心。但是，镇余里门口有特务监视，硬要闯进去只能更加暴露秘密，他急中生智，突然想到可以试走镇余里一号的前门，因为上海人出入习惯走后门，前门终日关闭着，他决定试一试。他带着身后的“尾巴”，差不多周旋了两个小时，终于把“尾巴”甩掉。接着，迅速拐回，轻轻敲开了镇余里一号的前门。通知送到了！王凯夫妇收拾好文件、枪支和衣物安全转移了，党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终于得到了保护。张宝泉就这样默默无闻而又出色地战斗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

那时，内交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不仅来上海的中央同志由他负责接待，一些由上海到外地的有关人员也通过他派

人护送。如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彬如、黄玠然、王凯、顾玉良等都和他联系过。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后处理武汉学生赴苏学习事、给天津顺直省委送文件及护送彭述之妻子离沪等，就是通过他安排顾玉良执行的。①由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善于巧妙的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对党忠心耿耿，因而多次在惊险中奇迹般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一九二八年春，反动派在两湖大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了。为了便于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经组织批准，张宝泉和驻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婉卿结婚，同志们凑钱为他们在老半斋举酒祝贺。但是，继之而来的并不是燕尔新婚的蜜月，而是更加险恶的政治风浪，党的一些秘密机关被破获和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时发生。当他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酷打成招，供出了党的秘密时，庄严地向党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是无论如何受非刑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②他的誓言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两个月后，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毫无愧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鲜血写完了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

那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党中央政法局常委、中央

①顾玉良：《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布尔塞维克》第22期，（1928年6月30日）。

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的第二天，上海市空气相当紧张。张宝泉为了下达中央紧急警戒的情报，先到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郑超麟。郑超麟给他换上自己的黑色大衣，脱去他进门时穿的灰色大衣。改装后，他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沉着地前往别处。不料刚到康脑脱路（一说西摩路，现在陕西北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封锁路口、搜查行人）。他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被巡捕带到捕房^①。捕房见张宝泉携带有党内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就把他当作一个“奇货”，急欲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对他千方百计进行诱逼，在毫无所获时，就施用各种酷刑拷打，其中一种是被称为“九尾猫”的所谓“科学的刑具”（这种刑具会使受刑者皮肉极端痛苦，却不会立即伤害生命）。但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吐露真情，只说和于右任有亲戚关系。捕房带他到于右任公寓，包探问于右任夫人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于夫人说：认识，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先生的老乡，常到我家来玩。捕房胡乱搜查了于夫人及女儿于芝秀的住所，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搜查中，张宝泉态度镇定自若，当时在于公寓的还有张宝泉熟悉的几名党员和进步青年，他都装作素不相识，一句话也不说。但因为案情重大，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正象当时《布尔塞维克》所揭露的“因为龙

^①张宝泉被捕日期系根据当时党刊《布尔塞维克》第22期记载。至被捕细节，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法不一，此处系根据有关资料及回忆综合而成。

华没有‘科学的刑具’，没有‘九尾猫’，只有亚洲式的极野蛮极残暴的刑法^①。当天，张宝泉即被提堂审讯，法官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数百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他的双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空地上，用七响盒子枪和三把刺刀，将他乱打乱戳致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他的尸体挑起，扔到七、八尺高的围墙外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②。

张宝泉牺牲后，上海各报没有一个字记载，这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严重白色恐怖下，是并不奇怪的。党组织得知了张宝泉的英雄事迹后，很快在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以《革命党人的一个好楷模——张宝泉同志》为题，作了报道。当时能够读到这个刊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莫不深深为张宝泉的英勇献身而感佩。他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

张宝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① 《布尔塞维克》第22期，1928年6月30日。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资料。

作者附记 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者外，还参阅了：

1. 1924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有关党内交通的文件。
2.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党内交通史料征集办公室：《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内交通》，《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3. 徐彬如、黄玠然、顾玉良、郑超麟、严信民、屈武、胡瑞莲、李瑞阳、张秀逸、张乃华、马文彦、方仲如、韩志颖，罗乐水、曹志麟、刘尚达、李伯恂等访问记录或被访问者给作者的信。

寻 淮 洲

卢应权 唐伯藩

曾长秋 杨权荣

学生时代 忧国忧民

寻淮洲，又名寻波，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民国元年农历七月十七）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社港区莲溪乡黄狮塘一个贫农家庭里，父亲寻馥盛是位识字不多的忠厚农民，一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母亲胡聘秀是个慈祥友善、乐于助人的勤劳妇女，成天为家人的生计而操劳，为邻人的困难而分忧。寻淮洲的童年，是在军阀肆虐、列强横行、国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寻淮洲的一家与千百万蒙受灾难的劳动人民的家庭一样，由于高额的地租，繁重的捐税，终年苦于耕作，不得温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穷困的生活，使寻淮洲幼年发育受阻，体弱多病，无钱诊治，四岁犹不能独立行走，与同龄孩童相比，更显得矮小瘦弱。父母出于爱子情深，担心体弱的儿子日后难以胜任重活，于是节衣缩食，挣钱准备送儿读书，为将来另谋生路创造条件。一九二一年，寻淮洲九岁时，终于上了小学。

寻淮洲发蒙甚晚，更体念到家境困难，自己就读不易，于是专心致志，刻苦攻读，加之领会敏捷，记忆力强，学业成绩

在班上名列前茅，受到师友称赞。为了减轻父母的辛劳，他在上学之余，还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寻淮洲从小喜欢听父亲、长辈讲爱国主义内容的故事。听后，他又把这些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给同学们听，在自己的心田里扎下爱国主义的根苗。父亲对他的学习要求很严，常常要他在放学回家时背诵课文，他都能流利地背完。父亲为此十分喜悦。

一九二五年，寻淮洲十三岁，进入莲溪乡高小读书。他擅长作文，尤喜文史，常常在文章中抒发自己的看法。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反帝爱国的风暴遍及三湘四水，寻淮洲的思想认识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提高。他在《法兰西大革命》这篇作文中写道：“我国没有革命以前，欧洲早有一国，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全世界由君主专制改为民主共和的第一次，这个国家，就是现在世界上五强里面的法兰西。”^①文章反映出他从少年时代起，便开始思索着中国向何去处的的问题。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胜利地经过湖南，赵恒惕对湖南的残暴统治垮台了。胜利声中，寻淮洲写下了《今年双十节有感》这篇作文，表示了对国民革命的祝贺，同时也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感情。他写道：自武昌首义，民国诞生，“这十五年间，全国频年骚乱，天灾流行，水旱交至，群民失所，饿殍载道。到了民九、民十年以后，还发生了几次剧烈战争，都是那万恶的军阀和野心的武人，只图扩充自己的势力，增加自己的权利，不知以民生国域为计，弄得九万里神州没有净土，四百兆同胞没有安宁。”文章还发出“我国的人民，真是可怜极了”的感叹。在此，寻淮洲寄希望于人民的民主觉醒，期望国民

^①寻淮洲作文本存浏阳县档案馆。

革命深入发展。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田波扬、潘心元等回到浏阳，成立了中共浏阳县委，领导浏阳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各乡的农会、工会、学联、妇联组织，如雷雨过后，春笋怒生。这一切，对于学生时代的寻淮洲走上正确的道路，发生了直接的影响。高小毕业前，他以《现在的我》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明确地表示：“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虫一样，春来也好，秋去也好，一味甘食美衣，玩日愒岁，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由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此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思〕吗？”因此，如果要做些事业，在学生时代，“对于学业上，应该猛力前进，求一些丰富的知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炼，求一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更应该随时练习，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他在另外一篇《对于浏北学联应否加入的我见》的文章中，还大声地疾呼：“我国自海禁大开以来，每每受列强的胁迫、帝国主义的侵袭、强权的恐吓，几乎将要亡国了，”在这危急的时候，“对那黑暗的社会”，“怎么可不负一番改造唤醒的责任呢？”就是这样，寻淮洲带着改造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强烈愿望，投入了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

投身革命 展翅翱翔

一九二七年初，寻淮洲上高小最后一个学期时，莲溪乡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寻淮洲即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此时国民政府刚从广州迁到武汉，革命形势继续高涨，湖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村大革命。寻淮洲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活动，查禁鸦片，禁止赌博，动员妇女剪发放足，破除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革命活动，立即引起反动阶级的不安，莲溪乡高小反动教员徐飘蓬秉承土豪劣绅的旨意出来干涉。寻淮洲对同学们说：“我们不要上他的当，这样反动的家伙，根本不能为人师表，我们不去听他的课。”徐飘蓬又气又羞，当听说寻淮洲要领着学生斗争他时，吓得赶紧溜走了^①。

浏阳的农民运动，在中共浏阳县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寻淮洲主动向党团组织要求参加斗争，组织分配他协助农民协会做宣传工作，他十分积极地担任这项任务，常在大小群众集会上，拿着土喇叭，爬到高桌上演讲。有时区里开会，也请他登台宣传。他的演讲，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受到群众欢迎。不久，寻淮洲高小毕业，被破例受聘到附近的下湖初小担任教员^②。在教学时，他认真负责，关心同学，注意灌输革命思想，深受同学爱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紧接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浏阳在中共县委书记潘心元的带领下，组织过几百农民进攻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由武汉政府解决，长沙附近各县农军被迫撤退。反动势力随即疯狂反扑，大肆清乡屠杀，三湘四水漂流着工农革命群众的鲜血。七月初，潘心元率领浏阳工农义勇队撤到湘赣边境，浏阳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社港区的反动势力也配合许克祥的军队到处抓人。原来被赶跑的反动教员徐飘蓬随着土豪劣绅还乡，

①②访寻淮洲哥哥寻淮玉及其家乡人民的记录。

在社港区团防局恶狠狠地说：“我要亲手杀了寻淮洲才甘心！”

寻淮洲的父亲是个农会干部，已经随一批革命同志转移了，寻淮洲也接到了转移的通知。临行时，他向母亲和未婚妻告别。母亲拉住寻淮洲的手，两眼含着热泪，哽咽地说：“儿啊！你就在附近隐蔽下来，躲躲风浪，娘舍不得你离开呀！”寻淮洲安慰母亲说：“我们要去平江参加武装部队，有了枪杆子才有力量打倒地主豪绅，才有打回来的希望，请母亲等待着这一天吧。”说罢扭身就走。他的未婚妻赶上前来，把自己缝制的手巾、袜子塞到他手里后，呜咽起来。寻淮洲安慰了几句，就匆匆离去。谁知这一走，便转战闽山赣水，最后血洒皖南。这次惜别竟成了与家人的永诀。

寻淮洲走到离家三里的大洛坪，碰上了清乡队，他手无寸铁，撒腿想跑，已来不及了。清乡队把他押到大洛坪集镇上，关在一间民房里。看守他的是一个被抓来当兵的穷苦农民，曾经听过他的演说。寻淮洲从门缝里同他拉家常。当谈到地主豪绅的凶狠，穷人没有活路的时候，两人唏嘘起来。稍停，那人贴着门缝悄悄地说：“明天要把你押到社港团防局去，我看你还是今晚跑了，免得吃亏。”寻淮洲非常激动，又考虑不连累这人，便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攀上屋梁，推开几行瓦，折断椽木，然后跳下来对那人说：“这样，他们就以为我是在深夜从屋顶上逃出去的。”

脱险后，寻淮洲连夜往北向平江跑。他不敢走大路，沿着连云山绕了二百华里，终于到了长寿街。这时，浏阳工农义勇队正在这里休整待命。寻淮洲找到指挥苏先骏（后叛变）和党代表潘心元，要求参加队伍。苏先骏见他只有十五岁，个子矮小，就说：“你还没有步枪高，还是留在平江参加地方工作

吧！”寻淮洲说：“我恨透了反动派，早已立志干武装，请允许我效命沙场吧！”在旁的慕容楚强见寻淮洲决心大，就极力主张将他收下，潘心元也很感动，终于答应了。

不几天，浏阳工农义勇队接到通知，编为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独立团，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行至江西永修县时，闻起义已提前于八月一日举行，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去了。于是部队又折回湘赣边境活动。这时，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因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来到湘赣边。两支部伍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下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称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称为第三团，驻铜鼓。寻淮洲是第三团第一营的战士，因为他年纪小，又有文化，能说会道，战士们都喜欢他，称他为“小参谋”。

八月底，潘心元到安源去找组织联系，参加了张家湾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举行湘赣边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寻淮洲所在的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主，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元（未到任，由徐骥代理），参谋长何坚。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十一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寻淮洲随部队从县城的肖家祠堂出发，向浏阳境内挺进，首战白沙镇告捷，消灭敌人的一支部队，解除了当地的地主武装。第二天，乘胜直取浏阳东门市，守敌一个营被我击溃，毙敌排长一名，敌向达浒逃跑，我军进占东门市。由于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又由于苏先骏疏忽大意，不认真执行毛泽东严密警戒敌人的命令，致使敌军两个团迂回过来，分两路包围了我三团。敌人占领了羊牯脑制高点，架起重机枪扫射。一、三两营

冒着敌人的火力，从羊牯脑两侧往上仰攻，以期夺取敌人的机枪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三营营长汤采芝身先士卒，多次率战士向敌阵冲锋，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部队撤离东门市，向东经白沙镇转移到上坪。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指示起义各团取小道往浏阳文家市集中。

九月十九日，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齐集文家市，共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当日黄昏到达，连夜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粤交界的山区进军，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九月二十二日，部队到达泸溪，遭到朱培德的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再次受到损失。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寻淮洲编入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①。

十月上旬。在毛泽东率领下，部队沿湘赣边南下，途经宁冈的砦市，酃县的十都、大院、水口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十月二十三日，寻淮洲所在第三营在遂川县大汾镇，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靖卫团的袭击，三营与团部的联系被割断。营长张子清将部队带到湘南桂东一带，一面开展游击活动，一面积极设法与毛泽东联系。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湘南，三营与之取得联系，并得到武器弹药的援助。同年十二月底，寻淮洲随着部队回到茶陵，归还建制。这时，他担任代理排长职务。

^①张启龙、王俊民等的回忆。

保卫苏区 喋血苦战

在开辟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寻淮洲所在的第三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转战湘赣边界南部地区，打了许多硬仗。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他们与第一营配合攻打遂川县，在大坑地区打垮了肖家壁的靖卫团，占领了遂川城。翌日，营部要寻淮洲率领全排去城外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他们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并为部队筹到了一批粮款。

同年二月，寻淮洲所部又由遂川开回茅坪集结，攻打宁冈新城。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击毙敌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并处决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次战斗，寻淮洲排首先冲进新城，与伪靖卫团团部展开了激战，俘敌二十多人，缴枪十余支。就在这年春节，年仅十六岁的寻淮洲由于作战勇敢，经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介绍，在茅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党委书记，张子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团长。旋即调往湘南支援湘南暴动。寻淮洲随部队在资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时，天气还很寒冷，部队动员了一些贫苦农民参军，寻淮洲把自己仅有的两件单衣拿出来送给新兵。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民自卫军向井冈山转移时，寻淮洲所部担任后卫掩护。敌三个团企图占

^①访问宋任穷的谈话记录。

领鄱县县城，截击我军主力。寻淮洲等在团长张子清指挥下，抢先占领县城和城北高地，在城郊接龙桥一带阻击敌人。战斗中，张子清左脚骨被打断，影响了指挥。寻淮洲与战友一道，沉着应战，打退敌人连续十多次的冲锋。战斗坚持了数天，毙伤敌数百人，我军终于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截击企图，掩护了朱德、陈毅所率部队胜利到达宁冈，为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在宁冈耒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原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由师长张子清兼，团党代表由师党代表何挺颖兼。他们委派寻淮洲担任红三十一团第三营的连长，寻淮洲开始有些犹豫，担心自己年龄轻，怕挑不起这副重担。张子清鼓励寻淮洲说：“你是个年轻的老兵，相信你是能够干得好的！”不久，张子清因负伤逝世，寻淮洲失声痛哭，他决心铭记师长的叮嘱，认真学习军事，在革命战争中锻炼自己。

一九二八年七月，赣敌十一个团乘我红军大队开赴湘南之机进攻永新。这时，寻淮洲正跟随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打游击，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常利用战斗空隙，向寻淮洲等红军干部讲述游击战争思想，使寻淮洲深受教育。这期间，部队紧密依靠群众，用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方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有利战机歼灭小股敌人，将敌人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寻淮洲对游击战争思想心领神会，并在这次军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机智和坚定。不久，因为红二十八团在湘南的战斗中失利，毛泽东亲率红三十一团主力支援，寻淮洲随部队再次转战湘南。值此时机，湘赣

两省的敌人乘虚“会剿”井冈山。井冈山留守部队在何挺颖、陈毅安等指挥下，在黄洋界哨所凭险抵抗。军情紧急，寻淮洲受命星夜驰援，保卫了根据地。

为了打破湘赣之敌对井冈山的围困、封锁，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留守井冈山，他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寻淮洲随部队出发。二十四日，部队与赣敌三个团战于大余，因敌情不明，初战受挫。从三十一团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何挺颖身负重伤，毛泽东甚为关切，嘱陈毅转告该团团长林彪，务必妥善照顾，安全转移。林彪只顾自己突围，置何挺颖于不顾，致何坠马牺牲。寻淮洲闻讯，满怀悲愤地说：“何党代表如在三十一团的话，我舍死忘生也要把他护理好，怎能让他坠马呢？！”阶级的感情，战斗的友谊，使他潸然掉下了怨恨和惋惜的眼泪！

部队突围后，寻淮洲随主力转战闽粤赣边界至吉安、兴国一带。由于离开了根据地，给养没有保障，生活很是艰苦，有时连五分钱一天的菜金也筹措不到。寻淮洲为了鼓励战友们的革命斗志，经常带头唱起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创作的歌曲：“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部队深入敌后，饥寒交迫，在转战途中曾四战受挫。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在隆冬大雪纷飞中，部队日行九十里。寻淮洲身单体瘦，还替伤病员扛着两支步枪，两只脚走起了血泡，鞋底磨穿了，血水渗过鞋袜，印在洁白的雪地上。

临近年关，部队到了赣南瑞金。大年初一这天，与敌刘士毅部激战于瑞金北面的大柏地，直至次日中午才结束战斗。这

场硬战，是红四军突围屡战受挫以来所打的一场翻身仗，全歼刘士毅部尾追的两个团，俘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八百余人，缴枪逾千，为进军赣南闽西打开了局面。战斗中寻淮洲率领全连勇猛冲锋，戮力杀敌，每人仅有的二十发子弹打光了，就用树枝、石头当武器。寻淮洲的左臂受了伤，鲜血顺着袖管流下来，战友们赶紧扶住他，要把他抬下火线。他推开战友们，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布片包扎了一下，又把驳壳枪一挥，叫道：“冲啊！跟我来！”继续投入战斗，追歼敌人。

红四军纵横驰骋在“赣水苍茫闽水碧”的广阔战场上，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寻淮洲随部队转战南北，参加了三战闽西、九攻吉安的战斗。一九三〇年春，闽西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成立红十二军。红四军抽出了一部分干部去支援，寻淮洲奉命调到新组建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百团担任营长。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寻淮洲所在红三十四师第一百团，与红三军、红四军，奉命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待机歼敌。他召开全营誓师大会，号召战士们要英勇杀敌。按照总前委关于“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寻淮洲同战友们一起自黄陂、小布星夜疾奔龙冈山区埋伏。拂晓时，骄横的敌人向我设伏的阵地走来。待敌人接近时，寻淮洲一声喊“打！”红军战士立即奋起杀向敌人。敌人突然应战，慌作一团。激战到中午时，便将敌人打垮。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为我粉碎。战后，寻淮洲因作战勇敢，指挥得力，提升为红三十四师第一百团团长。

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寻淮洲所部在瑞金北面的大柏地集结。四月下旬，向西北方向的东固、龙冈

隐蔽，追敌而居，待机歼敌。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寻淮洲部与红三军、红四军一道，先后在富田、白沙、中村歼灭了大批进攻的敌军。五月二十七日，歼灭敌许克祥师一个团于广昌。战后，寻淮洲所在的红三十四师留守广昌。不久，他调到红三十五师任师长，此时，他才十九岁。

一个月之后，红军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寻淮洲率红三十五师从闽西宁化出发，向西翻过武夷山，绕道千里，回到江西兴国地区集中。为了迷惑和吸引敌人，寻淮洲所部奉命在万安县东北方向活动，牵制了富田之敌第十一、十四两个师，配合主力在另一个方面歼灭敌人，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反革命“围剿”。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又动员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反革命“围剿”前后共八个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调兵遣将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大举进犯。中央苏区为了配合两地的反“围剿”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九三二年六月，寻淮洲率红三十五师随一、五军团迅速由福建回师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准备迎敌。那时自夸为“铁军”的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十八个团，向我赣南苏区进犯。七月，寻淮洲部在朱德、罗炳辉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道，从信丰向西出击，在粤北南雄东部的水口圩和赣南漳水之滨的池江地区连打两仗。水口战役异常激烈，寻淮洲率战士们冲上去，用马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歼敌两个营，陈济棠的部队溃退。这两仗，有力地守卫了江西南线，使红军能够移师北上，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年八月，为了进逼抚州，威胁南昌、九江，调动蒋介石部队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

鄂西的压力，寻淮洲奉命指挥红三十五师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在战斗中，寻淮洲率部直捣敌后，牵制敌数师兵力，对反“围剿”战争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为此，寻淮洲所部红三十五师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他本人也荣获二级列宁勋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利用战斗间隙，中央军委在瑞金召开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刚满二十岁的寻淮洲，从红十二军的三十五师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

寻淮洲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了，但他仍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生活同战士一般艰苦，常穿草鞋行军，很少骑马。他平易近人，与战士在一起谈笑风生。就在这次瑞金召开的军事干部会上，在一军团担任团政委的宋任穷和慕容楚强，听说有位浏阳的同乡是位年轻师长，很想认识一下。正说着，前面走来了一位挎手枪的战士模样的人，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们以为是个警卫员。一眨眼，寻淮洲走到他们跟前，一眼就认出了五年前在平江长寿街支持自己入伍的慕容楚强，立即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怎么不认得我了？我叫寻淮洲！五年前我要求参加革命队伍，是你从中赞助，才将我收下的，真没想到在这里重逢啊！”慕容楚强在秋收起义后，先回浏阳打游击，后到中央苏区，对这件事早已淡忘了。经寻淮洲一说，才恍然记起，哈哈大笑，热情的手握得更紧了^①。

一九三二年冬，蒋介石调集近五十万兵力，部署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第二阶段的进攻。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敌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犯。当时，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统治了党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要求红军先发制人，

^①宋任穷、慕容楚强的回忆。

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寻淮洲率红五师与一军团一道，于二月十二日强攻南丰不克，而敌陈诚部三路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这时，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二月十二日，“改强攻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之敌。寻淮洲部与兄弟部队向西转移到东韶、洛口、吴村地区，待机歼敌。从二月下旬到三月底的二十多天中，集中兵力打埋伏战，取得了黄陂、草台岗两战役的胜利，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此后，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寻淮洲师已成为红军主力师之一。

威震东线 卓著战功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闽西进攻红军。十九路军来势很凶，接连占去我连城、新泉等苏区重镇，严重地威胁中央苏区的安全。七月，中央军委下令，以红三军团（缺红六师）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寻淮洲受东方军指挥部之命，率领红五师从江西的头陂出发，向福建进军。七月五日抵宁化以西地区，执行收复连城、新泉苏区，开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①。

入闽的第一仗，就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它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堡墙高二丈五尺，厚约二丈，驻有绰号“闽北王”的卢兴邦师的第三〇七团，还有

^①李志民：《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经验教训》，见《革命回忆录》（4）第6页。

周围四个县的地主武装四百余人，并储备了大批粮食、食盐，是一个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这个钉子不拔除，东方军就不能完成任务。七月九日，敌三〇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里的延祥设伏，全歼三〇九团。红五师包围泉上，决定采取坑道作业的方法进行爆破。寻淮洲令李天佑的第十三团东进，歼灭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城。这个胜利，为攻克泉上土堡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十九日拂晓，寻淮洲又亲自指挥白志文的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一声巨响，炸开土堡围墙，我红军战士冒着弥漫的硝烟，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第三〇七团及地主武装。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歼敌一千二百余人，毙旅、团长各一人，营长二人，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枪七挺，驳壳枪六十支；此外，还俘获了敌县长二人，地主、恶霸三百余人，缴获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入闽第一仗的重大胜利。

东方军入闽首战告捷，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把红军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不是让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却匆忙地命令部队去收复连城。连城守敌是十九路军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辖两旅六团，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全系德国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是国民党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加之连城敌军筑有坚固的野战工事，易守难攻。在瑞金遥控指挥的代理中央军委主席项英，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却按地图位置指令寻淮洲师由北向南进攻。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根据寻淮洲等的报告，立即亲赴前线作实地

观察，认为这一打法是错误的，将会陷部队于被动地位，主张不打连城，而打区寿年师驻朋口的黄康营，以便调动连城、莒溪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歼敌主力。彭德怀将意见电告周恩来、朱德转项英，要求改变原来作战方案，几经争论，才获批准。七月二十八日，东方军一部主力向朋口、莒溪发起进攻，一部主力包含寻淮洲师担负着牵制连城敌人和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朋口、莒溪打响，不出所料，连城敌四六六团钟经瑞部来援。寻淮洲指挥第十三团在二十九日晨抢占了朋口东侧的高山，控制制高点，敌人也来争夺。寻淮洲指挥部队迂回敌后，前后夹击，全歼敌四六六团，然后乘胜回师围攻朋口、莒溪之敌，又全歼黄康营。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四个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热烈庆祝建军六周年。庆祝会上，彭德怀、袁国平先后讲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并转达了中央军委表彰寻淮洲部在战斗中成绩卓著的特别嘉奖令。寻淮洲在会上代表红五师全体指战员表示，决心创造新的战绩来回报中央军委的嘉奖。

一九三三年九月，寻淮洲师随东方军总部转战到延平（今南平市）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驻沙县的敌六十一师，是十九路军最精锐部队，敌六十一师企图以部分兵力抢占西芹，掩护其主力增援延平。寻淮洲奉命率部连夜出发，截击来犯之敌。九月十八日晨，寻部与敌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郑为辑部在木芹山遭遇。该处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了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战士不顾一夜行军的疲劳，奋勇抢占主峰。敌人也拚命争夺这个山头，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在山顶上展开肉搏。我红军战士勇猛冲杀，终于把敌人打垮，并乘胜追击数十里。号称十九路军中战斗力最强、有胜无败的“铁军”三六六团，乃被

我东方军寻淮洲指挥的红十三团全部歼灭，开创红军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战绩^①。此役充分表明东方军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以及寻淮洲的坚毅果断、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

一九三三年秋，当东方军在闽西、闽中频繁作战、连续取得胜利时，蒋介石又调动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震惊于黎川失守，命令东方军立即返回江西，企图收复黎川。接着，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从第一、三军团中调出部分主力师，扩建成几个新的军团。十月中旬，寻淮洲指挥的三军团红五师，在鹰潭附近的贵溪县上清宫，与红十一军合编成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委肖劲光（后为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三十四师，仍归东方军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开始了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一月四日，三军团由头陂出发，于十日到达沙县东二十里的富口地区待机。寻淮洲率红七军团的十九师、三十四师也先后从泰宁南进到三明市地区配合行动。十一日，我东方军围沙县城，并在沙县东三十公里的青州击溃由延平来援之敌第四师，毙敌团长二人，营长四人，消灭敌二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与此同时，寻淮洲指挥的红十九师、红三十四师，在三明市附近，以少胜多，歼敌一个旅，并奇袭永安城，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卢兴邦的一个兵工厂。此后，寻淮洲把

^①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第37页。

这个兵工厂的机器运返瑞金，为红军修理武器，翻造子弹，对支援反“围剿”斗争作出了贡献。不久，因敌情变化，苏区的泰宁、建宁军事吃紧，红三军团奉命撤回广昌，留下寻淮洲的红七军团留守沙县。到此，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便告结束。

东方军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寻淮洲作为东方军的一位青年指挥员，先后直接指挥红五师、红七军团，两次入闽，英勇杀敌，威震东线，战功卓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缺席（仍在前线作战）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先遣抗日 转战千里

由于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继续统治着中央，贯彻“左”的军事指导方针，使得我军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从原来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纵横各三百余里。内困外扰，国难当头，形势极为险恶。七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命令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军北上抗日。”^①

抗日先遣军由红七军团组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红七军团由福建的连城地区，返回瑞金待命。抵瑞金时，中央军委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版第155—156页。

的负责人和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接见了军团的指挥员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等人，并宣布了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的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红七军团军政委员会；刘英、粟裕继续分别担任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①。先遣队的行动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支援皖南休宁、祁门、石台、歙县的农民暴动。

接受任务后，寻淮洲召集军团全体干部，通宵达旦地研究敌我力量、制定作战计划和进行政治动员。由于红七军团在东线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只剩下四千人。于是，在苏区突击补充了两千新兵，以此六千兵力（非战斗人员约两千）编成三个师，有长短枪一千三百支以及少量轻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还有宣传品三百担、物资二百担。总的情况是武器不足，物资缺乏，战斗人员不够精干^②。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在寻淮洲、乐少华等率领下，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他们出赣南，向闽西，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攻克大田，抵尤溪以东，进入闽中地区。沿途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高水险，森林密布，道路崎岖。福建山区的天气多变，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大雨倾盆。战士们风餐宿露，冒雨行军，还时有战斗发生。特别是在雨后，山间小路泥泞难走，宿营无屋，席地而卧，山间黑夜，蚊子特多，使红军战士彻夜难眠。寻淮洲心里十分焦急。他想起了一

^{①②}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新华月报》1981年第8期。

个家乡的土办法，叫战士点燃艾草堆，驱散蚊虫，解决睡眠问题。在行军作战中，寻淮洲从不骑马。他的战马“转到卫生队服役了。”他迈开能征惯战的双腿，带领先遣队疾进。战士们且战且走，爬山涉水，已经十分疲劳了，一当坐下来休息，便立即入睡。寻淮洲见状，很心疼战士，因此，每次催促队伍起程，从不大声呼唤。有时用一只橡皮小鸟，在战士耳旁边，捏得吱吱作响，把战士从梦中唤醒^①。

寻淮洲率先遣队进入闽中后，突破的第一道防线是强渡闽江。闽江是福建境内一条大河，可通小火轮，是敌人在福州、南平之间的主要运输线。先遣队抢渡闽江，是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实现的^②。为了配合先遣队北上抗日，中央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从江西石城苏区出发，专程护送七军团东渡闽江。闽江上游有个号称“铁城”的南平，它南面的尤溪口和樟湖坂之间，是福州和南平中间的一个三角地带，敌人武装力量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红九军团迅速占领这个地区，控制了樟湖坂，这就切断了敌人闽江上下游的联系，确保了红七军团左翼的安全。寻淮洲指挥七军团与九军团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船只和竹排不够，会游泳的红军战士扶着砍来的竹木，首先泅水过江，抢占了敌滩头阵地。终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于闽江下游的横田和水口之间顺利渡过了闽江。

先遣队渡闽江后，按原来计划，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再到达中央指定的目的地皖南。但中央军委突然改变原计划，电令寻淮洲部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

①访问李志民谈话记录。

②涂通今：《红九军团护送先遣队北上抗日》。

州。八月一日，部队改变行军方向，继续东进。在进占水口之后，红七军团在水口镇召开“八一”建军节的纪念大会。寻淮洲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政治动员，红七军团全体指战员，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整装待发。出发前，寻淮洲收到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军功章一枚。

先遣队在闽中突然出现，国民党反动当局异常惊慌，忙调遣闽东敌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布防福州，又将正在湖北整训的敌四十九师海运驰援。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闻讯，急从漳州飞往福州“视察”，为部下打气。福州南濒闽江，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外驻有两个团和一些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还有飞机场，且敌已沿江设防，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八月二日，寻淮洲率部队从水口向福州开进，黄昏时遭到敌机袭击，我伤亡近百人。从水口到福州城约八十里，红军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和沿途敌碉堡的密集火力，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夺取，到八月七日才抵福州的西北近郊。当晚发起攻城，经一昼夜激战，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主要街道。但是，寻淮洲这支善于游击战的野战部队，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和攻坚手段，围攻三昼夜不下，遂自动撤出战斗。八月九日，部队向闽东的桃源地区转移。敌八十七师一个团跟踪追来。红七军团后卫部队与敌激战一夜一天，打的是阵地战，虽击毙许多敌人，有所缴获，我军也伤亡不少，形成对峙局面。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我军再次主动撤出战斗。

桃源战斗结束，部队继续向闽东挺进。由于远离根据地，物资供应得不到保障，指战员们常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时值

八月，天气酷热，伤病员增至八百人，而部队缺医乏药，仅能弄到一些清凉油、仁丹，碘片算是难得的好药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寻淮洲与战士同甘共苦。当他发现有人情绪低落时，就耐心开导：“我们先遣队北上抗日，为的是挽救国家危亡，支援皖南暴动，解放劳苦大众。我们红军战士，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劳动者。这次北上行动，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解放呀！吃苦、牺牲、忍饥、受热，在我们有革命理想的红军战士面前，算得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很注重言传身教，处处对战士体贴关心，有时，还帮助炊事班生火做饭，鼓舞了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和战斗意志。

部队过了连江，与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困难有所缓和。寻淮洲对地方党的领导人十分尊重，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当时闽东同志要求红七军团拿下罗源县，以便打通宁德与连江之间几块游击区的联系。寻淮洲马上派出侦察小分队，对罗源县城的敌情和地形作了详细调查，然后部署兵力，改原来阵地战的打法为奇袭战术，全歼守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缴枪数百支。这次胜利满足了地方党和群众的愿望。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部队，伤病员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红七军团因前段战斗伤亡较重，在这里补充了一批新战士。为了帮助地方发展武装力量，寻淮洲决定把缴获的几百支枪送给地方党组织，留下来的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为闽东独立师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寻淮洲率部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继续北上，向闽北前进。他指挥红七军团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于八月下旬攻克福安县西北的穆阳

镇，歼敌数百人。接着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并攻克了庆元县城。部队乘胜进军，势如破竹，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余人，缴步枪数百支，轻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月，连胜三仗，红七军团的军威大振。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甚多，物资上也得到了补充。到九月初，部队进入了闽北苏区的古楼游击区。

由老党员黄道领导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各方面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寻淮洲、粟裕、刘英等主张利用苏区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寻找机会给尾追之敌四十九师以有力的打击。这些切合时宜的意见，是寻淮洲等人根据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来的，却遭到了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政委乐少华的坚决反对。为此，寻淮洲要求请示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当时还抱着“左”倾军事指挥方针不放，把寻淮洲这种切合实际的战略措施指责为“游击主义”，复电竟批评说它“恰合敌人企图”。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到达闽北苏区时，为时已近两个月，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一个多月到达皖南的限期。先遣队本应向皖南急进，然而，中央军委却再次来电，根本不提北上皖南的任务，反而电令红七军团去浙西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是破坏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二是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红七军团奉命离开闽北向浙西前进。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深厚，而且保安团组织严密，实力较强，交通线和通讯线路纵横交织，不利红七军团开展活动。可是，中央军委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多次来电

批评红七军团“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对此，曾洪易、乐少华只知道机械地执行，按中央军委在地图上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进军，使部队极其被动。敌人日益加紧围追和堵截，部队差不多天天要打遭遇战、掩护仗，而在白区作战的困难远远大于苏区，失去了后方依托，伤员很难安置。寻淮洲动员指战员说：“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为人民打仗，一定要照顾好伤病员同志，无论如何不能把伤员丢下”。红军战士出于深厚的阶级感情，自动组合起来，每三个战士照顾一位重伤病员，由两个人抬，一人替换，这样长距离抬着走，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削弱。尽管如此艰难困苦，红七军团指战员仍然顽强地深入敌后，在龙泉、浦城、玉山、江山、兰溪、衢县破坏敌人交通线，攻击车站，炸毁桥梁，给敌人以很大威慑。但部队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行军作战，虽然寻淮洲指挥红七军团勇敢拼搏，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却未能摆脱被动困境。

九月十三日，红七军团攻占江山县的清湖镇，歼敌一个营。接着，强渡江山河，在大陈地区，打破敌人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正当红七军团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九月十七日，军委又来电指示：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敌后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隔两天，又电令寻淮洲务必以遂安为中心，于皖边各县开展游击战，建立新的苏区。寻淮洲在军团干部会议上，再一次指出军委的这个指示是完全脱离实情的。他具体地分析了遂安地区的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认为它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二百公里，虽属山区，但地处衢江、兰江、新安江的三角地带，江水深，轮船能通建德、兰溪，且有公路干线与横贯东南境地的浙赣铁路相

联，显然地形不利我军机动作战；加之地瘠民贫，又没有群众基础，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我军面临严重的敌情，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和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加紧对我追击，企图断我去路，合击我军。面对这种情况，部队要在此立足是困难的。最后，寻淮洲恳切地说：“我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我宁愿接受中央军委的处分，也不能再执行这个指示了，应立即向皖赣边转移。”

九月三十日，寻淮洲挥师向西，抵婺源县北的段莘地区，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干部群众上山游击。他听取了皖赣特委和游击队领导人的意见，率部继续西进，抵达黎痕地区，并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打了几个胜仗。皖赣苏区地方党热情地欢迎主力红军，给红七军团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部队经过困难之后，开始出现好的转机。

在此，军团领导人看到皖赣边和皖南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和群众基础，确比前段经过的浙赣边、浙西要优越，更加坚定了在这里建立新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为此，寻淮洲向中央军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红七军团在皖赣地区打游击，配合当地党和游击队，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歼灭尾追之敌；（二）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以便机动灵活作战；（三）在敌严重进攻、追击、围堵的情况下，允许七军团能机动、自主地解决作战有关问题。但是，这些正确的建议被“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束之高阁，未获批准。^①

十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来电，命令寻淮洲率部队转移到闽

^①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浙赣苏区休整补充。军团领导人又一次进行细致的研究，仍深信在皖赣边开展游击战争是适宜的、有利的，进至闽浙赣苏区必须经浮梁、德兴之间几道敌人封锁线，对我军不利。于是，向中央军委发电指出，如果仍北上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而以七军团主力向皖南游击区活动，即以雷湖、柯村为中心的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活动为好。十八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方案。寻淮洲等感到十分欣慰，以为部队将有新的发展了。可是，事隔三天，中央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去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寻淮洲只好率部队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这时，作为中央随军全权代表的曾洪易，看见先遣队自出发以来，艰苦转战，部队极度疲劳、减员过半；特别是闻知中央红军主力已作战略大转移，于是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失败，前途无望了。公然在干部中散布失败悲观情绪，主张放弃武装斗争，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甚至他提出要求离开部队。曾的错误观点，受到了寻淮洲等人极为严肃的批评^①。后来曾洪易果然离队逃跑，到南京向国民党自首告密，成为可耻的叛徒^②。

红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先后转战闽、浙、赣、皖四省数十县，历时四个月，行程三千二百里。这期间，它虽然遭受王明“左”倾错误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是，在寻淮洲的指挥下，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马不停蹄，连续作战，深入敌人心腹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在一定

^①邵式平、汪金祥：《闽浙赣（赣东北）党史》。

^②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程度上牵制敌人的兵力，支援了中央红军主力作战略大转移。他们用鲜血写下的这一段战斗历史，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

血洒皖南 永垂青史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到达重溪地区后，受到了苏区革命群众的热情欢迎。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从一九二七年开始领导创建的，曾经多次粉碎过敌人的“围剿”而坚持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十一月四日，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立即偕同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和新十军的领导人，从葛源北上，赶了五十里路来到重溪，看望和慰问红七军团的战友们。苏区的革命群众，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来慰劳七军团的亲人，并且热情地称呼这支转战千里、以运动游击战著称的人民子弟兵为“老十军”（原闽浙赣的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编入红七军团）。红七军团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回到了苏区怀抱，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战斗情绪迅速地振奋起来。

根据中央军委十一月四日的命令，方志敏会同七军团的领导人，研究了两军合编的问题^①。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以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在德兴县重溪共同组建了红十军团，共有兵力六千余人。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编为第二十师、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后被捕牺

^① 《方志敏传》，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师政委、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王如痴(后被捕叛变)任师参谋长。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这时,中央苏区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十一月四日中央军委的电令中还明确指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①。

在军团干部的调整问题上,寻淮洲两次受到了“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打击。在红七军团时,寻淮洲虽为三人领导核心之一,但实权被曾洪易、乐少华把持;组成红十军团时,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却把军团长寻淮洲降为师长。面对这种处境,寻淮洲胸怀坦荡,从不计较,决心带领红十九师,去夺取新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按整编后规定的任务,从怀玉山和德兴县东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红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过来。寻淮洲充分发挥我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芳村地区部署兵力,给予尾追之敌以坚决的打击。敌军大败,蒋志英负伤逃回常山县城。接着,寻淮洲又指挥红十九师经上方镇,突破敌补充第五旅的防线,强渡新安江,逼近昌化县,其先头部队到达杭州西部五十公里的临安县,震动了杭州。随后,寻淮洲率部转向皖南,经过歙

^①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

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再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渡过青弋江，威胁芜湖。在这段时间内，红十九师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充分地发挥了寻淮洲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正当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开展游击性运动战取得成效的时刻，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益严重的情况，命令红十军团指挥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向北转到外线，同寻淮洲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又调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此时，寻淮洲考虑的不是自己被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的问题，而是把整个红十军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是否恰当的问题。诚然，寻淮洲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还缺乏全面认识，也从来没想到把一个大的军团改编为游击队。但他回顾近四个月来先遣队的作战，结合自己过去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处于孤军深入白区，远离根据地，面对优势敌人的堵截追击的情况下，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他还认识到，红七军团整编为第十九师以后，自己在浙皖赣边指挥作战，打得灵活机动，进退自如，局面正在开始好转。如今，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转移，敌人重兵加紧对闽浙赣苏区“围剿”，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央军区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反而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游击性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大

兵团活动，集中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其后果会是怎样呢？寻淮洲一面带着自己没有解答的疑问，一面率部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于十二月十日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二十、二十一师会合。

红十军团三个师会合后，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战役。当时，敌调集了由顾祝同指挥的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还有宣城一带的反动地方武装近十万人，分成三路，自北而南，向汤口扑来，企图一举歼灭我军。十二月十三日，红十军团沿着屯溪至青阳县的公路向北转移，经过乌泥关进抵黄山东麓的太平县谭家桥地区。

军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这段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打伏击。具体部署是：皖南游击大队从左右两旁吸引牵制敌人，红军主力由乌泥关起始，沿公路两侧从南到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寻淮洲的第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的阵地依次衔接；第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并阻击可能增援之敌。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我军突然发起攻击。预先毫无准备的敌人顿时惊惶失措，陷入被动状态。担任敌前卫之第二团，在我军猛烈冲击下，一片混乱，抱头回窜，团长被我军打伤，战场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是，第十九师在部署兵力时，没有将主力配置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战斗打响后，火力施展不开。而敌人抓住这个时机，重新调整了部署，

集中力量攻我战斗力较弱的二十、二十一师，置我十九师于不顾。第二十、二十一师是游击部队改编，指战员虽奋力反击，但因不长于打阵地战，很快陷于被动。第十九师主力“以有用之兵，置于无用之地”，增援不及，致使公路两旁我方的阵地被敌人冲垮。接着，敌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争夺乌泥关制高点，原由第十九师一个连控制的六三〇高地被敌夺去，战局开始逆转，形成胶着局面。

为了扭转战局，寻淮洲率部向敌人发起反攻。阵地上的枪声、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山石被打得粉碎，树枝在硝烟中纷飞。敌人居高临下，处在有利地位，我军多次冲锋，均被敌火力压回来。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激战了八个钟头，仍无进展。在此严峻时刻，寻淮洲亲自带一个排争夺制高点。他冒着弹雨，手执盒子枪，站在距敌几百米的坡地上指挥战斗。战士们见师长亲临火线，顿时增添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一个猛攻，把乌泥关的制高点重新夺了回来！可是，寻淮洲却腹部中弹，负了重伤，昏倒在地。他忍着剧痛，又顽强地支起身子，手指前方，命令部队：“抓住时机，向北突围！”

寻淮洲的伤势很重，战士们做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他从枪林弹雨中闯了出来，迅速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无力对我追击了。我军转移到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福官墩时，寻淮洲因流血过多，昏迷不醒。军医虽奋力抢救，终因药物和医疗条件有限，不幸逝世。在他停止呼吸前，口里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不满二十三岁的红军将领寻淮洲牺牲了！指战员泣不成声，把他安葬在潘村马蚁山脚下的约事岗。

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营来搜山，挖开了寻淮洲烈

士的坟墓，割去头颅，向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请赏去了。当地革命群众不忍烈士遗骸暴露，冒着生命危险，又重新掩埋，修复坟墓。

方志敏对寻淮洲的牺牲十分痛惜。他怀念战友，对寻淮洲作了高度评价：“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导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之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战，缴获敌枪六千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余架，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二十四岁^①，很细心学习军事学，曾负伤五次。这次打伤了小肚，又因担架颠簸牺牲了！当然是红军中一个很大的损失！”^②

一九三八年五月，陈毅奉党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深入敌后，挺进苏南，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途经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专程爬上陡峭的蚂蚁山，拜谒了寻淮洲烈士墓地，并在墓前吟诗说：“十年内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他还提出要重修寻淮洲烈士陵园，亲自写了碑文，由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录书。碑文是：

寻淮洲同志，湖南浏阳人，农家子。参加民十五年中国大革命，由农民自卫军追随毛泽东同志转入红军第四军。任战斗员、排、连、营长之职，屡功晋升至红七军团军团长，民廿三年冬，随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谭家桥之役负伤，至茂林镇伤重不救身死。寻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奋斗到底，

^①这里是按我国习惯的虚岁计算的。

^②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在在足为抗日战士楷模。民二十七年夏，新四军出发东线杀敌，道经茂林，为修治墓道立碑，以示不忘，且为完成其遗志而奋斗。目前抗日斗争已成为全国人民之神圣事业，国共两党由过去之对立变为亲密合作，一致对外，前线战局，日益发展，全部胜利可期，中华民族独立之基础已奠，谨以此告慰寻同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应更进一步以东线胜利，驱逐日寇，回答先烈，庶几无愧！

陈 毅 谨志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新四军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敬立^①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一、走访宋任穷、王首道、李志民、粟裕、张启龙、李贞、慕容楚强等老同志，以及寻淮洲的亲属、好友的谈话记录。
- 二、参阅过的文献书刊有：
 1.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2.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3. 李志民：《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经验教训》。
 4. 涂通今：《红九军团护送先遣队北上抗日》。
 5.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6.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7. 邵式平、汪金祥：《闽浙赣（赣东北）党史》。
 8.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9. 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10. 韩荣璋、肖裕声、杜魏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匪剿”战争始末》。
 11. 安徽省军区：《新四军在皖南》。

^①安徽省军区编：《新四军在安徽》。

杨 林（毕士悌）

李 政 文

（一）

杨林，朝鲜人，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州平、杨宁、毕士悌、老周等。一八九八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的一个爱国人士家庭。

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整个朝鲜，对朝鲜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血腥的屠杀。杨林的心灵里从小就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他在平壤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并组织反日学生运动，是当时平壤学生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鲜爆发了“三一”爱国运动。杨林和他的父亲一起平壤参加了这一伟大的人民起义。“三一”运动被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下去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惨遭杀害或被拘捕监禁，杨林的父亲也在起义中英勇牺牲。这就更加激起了杨林的民族义愤。他不顾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毅然参加了反日团体，积极从事反日活动。杨林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注意，日本军警到处对他进行搜捕。他在

^①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杨林材料。

朝鲜难以立足，遂秘密前往中国。

一九一九年春，杨林来到我国吉林省通化县哈尼河，进入了朝鲜族反日团体创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军事^①。是年末，他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军校的学习。一九二〇年二月，杨林被调到吉林省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当教员^②。同年十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珲春事件”^③，并即刻动员驻扎在朝鲜和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侵略军万余人，侵入我国东北延边地区，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讨伐”。为了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反击，杨林所在的军事学校的师生编入了反日武装部队，并于十月十九日主动转移到和龙县青山里白云坪一带，埋伏在山高林密的一段大山沟里。反日武装部队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分左、中、右设置了三个阵地。杨林指挥一个连，埋伏在中间的正面阵地，待命杀敌。

十月二十日早八时许，敌前卫部队一千余人在一个少佐的率领下，沿着一条仅有的羊肠小路进入了埋伏圈。反日武装部队三个阵地上六百多支步枪、六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交织成猛烈地火力网射向敌人，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慌乱无措，仅一个多小时，就将其大部分歼灭了。接着，这支反日部队又趁南北两路敌人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际，迅速转移，致使两路敌军互疑为敌，自相厮杀，又死伤了数百人。青山里一战，反日部队共消灭了日寇一千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延边各族人民的反日志气。连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其损失的惨重：“……我军死

①新兴武官学校是朝鲜族反日团体西路军政署建立的军事学校。

②《独立新闻》上海朝文版1921年3月3日。

③1920年10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出兵东北镇压朝鲜族反日部队而制造的事件。

加纳联队长一名，大队长二名，中队长五名，小队长九名，下士以下兵士死亡九百余。”^①

日本侵略者在青山里一战惨遭失败后，以百倍的疯狂扑向了延边地区。兽蹄所至，成百个村庄成了废墟，上千计的男女老幼遭到了屠杀。这一严重事态，强烈要求反日团体和反日武装联合起来去阻止敌人的暴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可是，绝大多数反日团体和武装部队的领导者，这时却纷纷逃到苏联远东地区去避难，资产阶级旧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朝鲜族反日民族主义运动随之彻底失败了。杨林从这一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要求得自己民族的解放，必须同中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去反抗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一九二〇年末，杨林离开东北到上海，经熟人介绍，决定去云南讲武学校继续学习军事。一九二一年四月，他由上海起程路经广州，绕道香港、越南，来到云南边境，然后又步行一千余里，历经千辛万苦，于同年六月到达昆明，改名为杨州平，并以“华侨”身分（因昆明有日本领事馆，讲武学校有日本教官，校方不许暴露朝鲜人身分），考入了云南讲武学校（旧云南讲武堂，民国后改为讲武学校）第十六期，被编入第六队第一区队^②。杨林入讲武学校后，严格要求自己，废寝忘食地学习军事课程，苦练杀敌本领。据周保中回忆：“云南军校教务长经常举杨林的例子，说高丽学生杨州平每天早晨背十块砖头跑十多里路。他是有志的青年，大家应该学习他的精

①《青山里血喷史》1939年西安出版。金勋（杨林）谈话，载《独立新闻》1921年3月3日—6日。

②杨炳岭谈话记录（1980年6月19日）。

神。”^①由于杨林刻苦努力，无论在学科和术科上，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

有一天，一个日本教官给学员上刺杀课。他讲完课后，十分傲慢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对学生们说：“你们当中，有谁敢出来跟我拚一下？”全场一时沉寂。那个日本教官又说：“五分钟也可以。”杨林随即迈着稳健有力的步子走出队列，两人立刻刺杀起来。十多分钟过后，那个日本教官招架不住了，只好低着头，伸出右手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样的！”杨林以自己的勇气和平时苦练的高超技术，灭了日本教官的威风，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在场的教职员和学员们均报以热烈的掌声^②。

杨林在云南讲武学校学习期间非常关心政治，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他经常帮助学友提高政治觉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当时，云南讲武学校规定，军人不许过问政治，更不许谈论国家大事，杨林不顾“军纪校规”，在背地里经常给要好的学友讲述革命道理。他针对当时不少学生“上军校为的是讨碗饭吃”的思想，对大家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却受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欺负，我们要立志把他们赶出去！”他还对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学友说：“我们要多想国家大事，要多想革命。”当学友们问他什么叫革命，怎么才算革命时，他回答说：“孙中山先生做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走孙中山先生的路就是干革命。”杨林的这些话，当时启发了不少人的觉悟。

^①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杨林材料。

^②杨炳岭谈话记录（1980年6月19日）。

杨林，生活俭朴，情绪乐观，从来不到大街上闲逛，不到饭馆吃喝。他平时话不多，对人却很热情。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他，同他交朋友。教官和学友们从杨林所作所为，都觉得他是一个有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①。

(二)

一九二四年初，杨林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他谢绝了校方要他留校的建议，立即离开昆明到了广州。由于国共合作，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很好。杨林在驻粤朝鲜革命者的推荐下，持云南讲武学校毕业证书，考取为刚成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下级干部，被分配到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他除在黄埔军校努力工作外，还经常聆听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讲话。从这时起，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的革命主张，并主动地同共产党人接近。

同年十月间，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广州地区发生了商团叛乱事件。杨林随同军校师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十一月，周恩来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通过艰苦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大多数学生和士兵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杨林也得到了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及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经常听取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讲的政治课。通过学习以及在共产党员们的引导和帮助下，杨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向坚信共产主义。一九

^①杨炳岭谈话记录（1980年6月19日）。

二五年一月，第三期学员入校后，杨林被任命为第三期学生队第四队上尉队长^①，并加入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同年二月，杨林参加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的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六月，他随东征军回师广州，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在东征与平定杨刘叛乱战斗中，杨林机智、勇敢，奋不顾身，建立了战功。他在军校内部与右派势力斗争中也表现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努力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办事，较好地发挥了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作用。“沙基惨案”后，杨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被军校提升为技术助教官^②。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杨林从黄埔军校调到独立团任第三营营长^③。他到职后，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仅注意对战士进行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而且十分注意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例如，独立团成立后不久，他在三营发现了一些士兵有报假名、假籍贯的现象，便和营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按照独立团党支部的决议，对战士耐心地进行启发教育，使他们弄通了思想，自觉自愿地重新填写了自己真实姓名和籍贯，增强了官兵的团结。

杨林在独立团任职时，对广东的农民运动十分关心。当时，高要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盘踞在罗建地区，对抗农民革命运动，到处破坏农民协会，屠杀革命农

①②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民，焚烧农民房屋，抢掠农民的耕牛和财产。杨林率第三营随独立团开到领村和伍村一带，参加了镇压反动地主武装的战斗。他还发动农民迫使地主接受“赔偿农民损失，实行减租减息”的要求。杨林每到一地，都主动深入农民中去，向农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教唱国民革命军的军歌，对农民的鼓舞很大。当地农民知道他是一位朝鲜人时，无不为之感动，纷纷给他送鸡蛋、鸭蛋吃，表示对他的敬重。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反对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后又乘机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压迫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撤出。四月，杨林根据党的决定，调回黄埔军校工作^①，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七月，北伐开始，黄埔军校的大批师生被派到北伐军各部队担任各级将领和战斗骨干，杨林则继续留在军校工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黄埔军校内部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斗争更加激烈。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气焰，并采取多种形式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杨林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在党组织领导下，始终积极地支持连队左派学生掀起的反对黑暗专制的风潮。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相继发出了《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密令广州反动当局举行《四一五》反共大屠杀。军校当局于四月十八日在校部和各个学生驻地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共四百多人。在这严重关头，

^①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杨林材料。

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一九二七年八月，派杨林到苏联学习。杨林与爱人李秋岳一起，由上海前往苏联莫斯科，先进中山大学学习一年政治，然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两年多的留苏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杨林的军事技术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三)

一九三〇年夏，杨林夫妇从苏联回到了上海。根据满洲省委提请派遣军事干部的要求，八月，中央军委派杨林到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做军事工作。杨林来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省委军委。在杨林等省委军委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东北各地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了军委。不久，省委根据满洲革命斗争的需要，又派杨林到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建立农民武装。

杨林到东满后，加强了各县委的军事工作。他广泛发动延吉、和龙、汪清、琿春等地朝汉族农民群众，夺取反动地主和反动军警的武器，建立了工农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到十一月，仅东满地区就建立起三个大队的工农赤卫队。十二月，在杨林等领导下，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各族人民举行了反对日本增兵延边和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群众大会，有一万五千多名群众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镇压了三十多名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此后，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琿春以北地区攻打了一家反动地主，缴获了一些武器武装了赤卫队，并且没收了大量财产，烧毁了地契，把粮食和一些财产分给了贫苦的农民。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曾经要求满洲省委将杨林调回中

央军委工作。满洲省委因工作迫切需要，请求中央免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夕，满洲省委将杨林调回省委，再任省委军委书记^①。

杨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鲸吞我国东北，并收罗一些叛徒、汉奸，一手导演建立伪满洲国丑剧的时候。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北，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领导东北人民实行武装抗日的根本方针，从一九三二年起开始广泛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杨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主动积极地协助省委书记罗登贤研究制定军事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大力武装人民群众，广泛团结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二年四月，杨林到磐石地区巡视，传达省委关于武装抗日的指示，并协助磐石县委开展反日群众斗争。他与李红光、李东光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磐石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四月三日，在杨林和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下，发动了蛤蚂河子农民反日大暴动。接着又举行了“五一”、“五七”等反日示威。五月七日那天，有四千多名朝汉族农民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汉奸走狗”等口号，当场处决了五十多名罪大恶极的日本走狗，并把吉海铁路老岭段的铁轨拆毁达数里之长，迫使敌人十几天不能通车。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杨林又协助县委，以原县委“打狗队”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式创立了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简称磐石工农义勇军），以磐石县玻璃河套一带为活动中心，分别在磐东、磐北、伊通三个地区组成三个

^①饶卫华：《我参加革命的回忆》，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

小队，积极开展活动。这支武装队伍建立后的短短两个月里，就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了六次分粮斗争，处决了三个恶霸地主，打散了百家长的地主会兵^①，缴获了大排队^②的枪支弹药。到七月间，工农义勇军发展到四个中队，成为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杨林是这支武装队伍的创始人之一。

(四)

一九三二年七月，杨林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赴上海参加会议，接着被中央军委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③。这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四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前夕。为了支持战争，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该委员会“有计划和管理经济上、军事上、劳动上的全部动员，及对于政府各部委、军区、地方政府关于战争动员问题的指挥之权”。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兼任该委员会主任。杨林来到中央苏区后，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参谋长^④。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凡是扩大到主力红军中去的工农战士，统要经过补充团的集中训练，以便整队的送往前方”的训令，他协助周恩来成立了十个补充团，并亲自负责训练，把训练过的新战士输送到主力红军中去。苏区青年热烈地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当红军，单是江西十

①②会兵、大排队，都是东北地区地主武装。

③④李沛群谈话记录（1982年3月29日）。

四个县就扩大红军二万多名。为了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军用品，杨林和其他“劳战”委员会同志一起，协助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迅速修好道路、桥梁。“劳战”委员会在此期间还募集了革命战争短期公费六十余万元，解决了经费的困难。一九三三年春，敌人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杨林和“劳战”委员会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夜以继日的工作，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作出了贡献。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杨林调到总动员武装部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一月，他作为中华苏维埃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代表大会后，他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工作。杨林在中央苏区期间，直接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毛泽东还亲自过问了从东北调杨林的爱人李秋岳到中央苏区工作的问题^②。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杨林坚决拥护和支持《宣言》。七月二十二日，他通过红色中华社发表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③，指出：“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了大半个中国，现在进而要出卖整个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亡国的耻辱，降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只有苏维埃及其红军才是武装全中国民众的统帅，抗日的唯一正确代表。”他强烈希望，全中国人民响应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紧

^①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1号。

^②冯仲云的回忆。

^③杨林当时的名字是毕士梯。

急动员起来，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江西苏区四所红军学校加上干部队，奉军委命令，合并为统一作战组织——红色干部团，杨林被任命为红色干部团的参谋长^①。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同干部团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带领全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在长征中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尤其在巧取金沙江绞平渡口和强占通安镇的战斗中，杨林都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干和卓越的组织能力。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命令干部团夺取金沙江绞平渡口。夺取这个渡口，对整个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完成有决定意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中央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给干部团布置了这项任务；张闻天还亲自到干部团，集合全体指战员，进行奇袭金沙江绞平渡口的动员，命令干部团在五月一日前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干部团接受任务后，在刘伯承指挥下，杨林和其他同志带领部队，昼夜强行军一百八十里，趁夜巧渡金沙江，没费一粒子弹，未损失一个人，并活捉了六十余名守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以实际行动纪念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红色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后，又接到军委关于夺取通安镇的命令。这是巩固金沙江渡江地点的一次关键性战斗。完成这一任务，必先占领通往通安镇的咽喉——金沙江西北的一个火焰山隘口。五月一日凌晨，杨林率领前卫侦察排，踏着崎岖险要的羊肠小路，迅速赶到山下。他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

^①莫文骅给作者的信。

挥全排战士，一阵冲锋，就把守山的一连敌军冲垮，夺取了山顶隘口。接着，又一鼓作气，尾追逃敌到通安镇，趁敌人措手不及，迅速地冲进街头，缴获了两门迫击炮，并同敌人展开激战。不久，干部团的后续部队赶到，终将敌人打垮，顺利地占领了通安镇。此役，干部团以牺牲四人、伤八人的代价，消灭了数百敌人，仅俘虏的就有六百余人，其中还有一个团长。这一胜利，巩固了渡江点，保证了全军源源渡过天险金沙江。中央军委下令嘉奖，干部团的威名震四方^①。就这样，杨林和全体长征红军战士一样，爬雪山、过草地，打退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步行二万五千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跟随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这时，杨林被调入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任参谋长^②。

此时，敌人正以五个师的兵力对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杨林参加了这次战斗^③。当进入直罗镇之敌一〇九师被我军打垮，敌师长牛元峰趁黑夜率残部突围逃跑时，杨林等奉命率七十五师指战员，一气追了二十五里，在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消灭了残敌一个营，并活捉了牛元峰^④。直罗镇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①蒋耀德：《长征中的红色干部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

②韦杰、刘震给作者的信。

③刘震给作者的信。

④徐海东：《奠基礼》。

(五)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党中央率领抗日红军渡黄河东征。东征大军要顺利渡过黄河，必须首先突破山西军阀阎锡山在黄河东岸的千里封锁线。阎锡山曾吹嘘说：“河防是铜墙铁壁，红军飞也飞不过来。”为强渡黄河，中央军委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红十五军团准备渡河的地段，决定杨林率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为先锋营^①。中央军委指示先锋营：“先头绝对隐蔽深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侧翼的掩蔽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人发觉，立即改为强渡”^②。杨林遵照这一指示，一面积极筹备船只，秘密运往渡口；一面化装前往黄河岸边侦察地形，计算渡船往返时间，选择登船和攻击地点，以及登船后的前进道路。

二月二十二日夜十时，军委命令先锋营渡河，杨林向上级领导郑重表示：“只要有一个连登岸，渡河就有保证。”同时，向先锋营战士进行动员，讲明完成渡河任务的重要意义。他说：“毛主席从这里渡河，我们一定要保证渡河成功”^③。

先锋营开始登船偷渡，但渡船还未到达对岸，就被敌人发现，遭到了猛烈炮火的攻击。杨林果断下令强渡，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地射来，一些同志倒下去了。但全营战士在杨林指挥下毫不畏缩，一边划船疾进，一边还击敌人，终于在贺家凹西北登岸，并立即向敌人展开了进攻。敌人依据碉堡抵抗，并以

①②③ 《周士第回忆录》。

碉堡群的强大的火力封锁先锋营前进的道路。杨林指挥先锋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勇猛冲锋。他们攻破了贺家凹路口的一个碉堡，接着又突破了敌纵深阵地，最后占领了贺家凹村，消灭了守敌，掩护二二三团、七十五师以及军团直属队和七十八师顺利渡河。

可是，杨林在继续向敌人纵深阵地攻击前进的时候，不幸腹部中弹，肠子被打穿。昏迷中，他仍关心着战局发展，询问周围同志：“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当他听到全军团都已渡河，毛主席也已安全渡了河，正向义牒镇行进时，才放下心来。他又坚定地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①不久，我军主力攻克了敌人的河防司令部驻地义牒镇。杨林因伤势过重，经多方抢救无效，英勇地牺牲了，时年三十八岁。

① 《周士第回忆录》。

郭 纲 琳

应尔玉 陈哲生

张 逸 毛健人

“永是勇士”^①的郭纲琳，是党的优秀女战士、共青团的好干部。一九三三年前后，历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等职。一九三四年一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长达四年之久。一九三七年七月被敌人枪杀在南京雨花台，年仅二十七岁。

(一)

郭纲琳，曾化名张英、刘英、郭英。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一日（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出生在江苏省句容县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祖父郭业庸，靠经商起家，在句容县城鲜鱼巷口开“泰和生”布店，兼营百货；后在城郊买了上百亩的土地，又在天王寺镇开设了“祥和”分号，很快成为句容城里的暴发户。郭家大院纵贯句容县城西门大街路北，有七进共四十多间房屋。郭业庸能经商，善交际，与当时所谓名士马相伯、康有

^①郭纲琳烈士在狱中曾将铜板磨成铜心，镌刻“永是勇士”用以明志。

为有交往。在郭纲琳祖母六十寿辰时，康有为曾题写“福寿双全”的条幅，轰动了句容县城。所以郭家在当地算得上名门大户，颇有声望。

郭纲琳的父亲郭定棠，排行第二，十八岁就独自经营天王寺的“祥和”分号，常住天王镇。

郭纲琳自五岁起就跟随祖父母生活。在叔伯姐妹中，她排行第四，故家人都叫她四姑娘、四丫头。祖父母对郭纲琳爱护备至，平日管教虽然严厉，处事却还通达，郭纲琳的同学、朋友来访，总是以礼招待。父亲虽然重男轻女，看不惯郭纲琳活泼豪爽、喜爱交往的性格，但常不在身边，也就难以管束。母亲张氏爱玩麻将，很少在女儿身上用心。所以少年时代的郭纲琳，生活过得倒也自由自在，无所拘束。

在这个大家庭里，七叔郭定林对郭纲琳影响很大。郭定林在外读书，曾参加过大革命，虽然后来消沉，但当时却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郭纲琳最愿意亲近他。六叔郭定荣早年离家，就读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他对郭纲琳也颇有影响。因而郭纲琳自幼胆大倔强，富有反抗精神。早在读小学时，就敢于当面指出老师的错别字，敢于为同学和姐妹伸张正义。有一次，她到庙里玩，竟爬到威严可怕的“金刚”身上，打它的嘴巴，还边打边说：“泥巴做的，怕什么！”^①她乐于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几乎每年都要家里做一件大衣，私下送给同学或亲友。父亲知道后，骂她是“败家子”，她却说：“店里有的是，送件大衣算什么。”^②她对佣人态度和善，从不要他

①访问郭纲琳谈话记录。

②戴国琴的回忆材料（1982年1月）。

(她)们盛饭、洗衣，还经常给他(她)们分送礼品。

一九二四年，郭纲琳毕业于句容县立女子小学，即节孝祠小学，在七叔郭定林支持下，和堂姐郭纲瑛同时考入无锡竞志女子中学。不久，因江浙战争，社会混乱，学校停办，她便辗转回乡，在家补习英语^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句容创办县立初级中学，郭纲琳就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②。

句容离南京只有九十里，国共合作举行北伐的消息，由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句容人带回家乡，县城里一时政治空气活跃起来。句容县立中学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很多老师倾向进步。尤其是从北京来了一位愤恨军阀统治、痛感社会腐朽的进步青年李少仙，到县立中学任国文教师。按他自己说，到县立中学是“从新革命，创造新生活，寻求新生命。”^③当时县立中学正如李少仙所描写：“j县（指句容县——编者）的初级中学，是j县的革命策源地，是j县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也是j县人民认为充满了危险物的火药库！学生六七十人——内有剪发的女生十余名。”^④郭纲琳正是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在句容县立中学的火热环境里，迎来了她的青年时代。她一天天在变，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着。她喜欢听北伐的胜利消息，常与要好的同学议论政局，讨论形势，排演进步戏，并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潮》、《新青年》及其它进步书刊，开始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①访问郭纲瑛谈话记录。

②巫省三、张录春的回忆材料（1982年12月）。

③④李少仙：《从革命说到教书再扯到白话碰壁和饭碗打破》，载《语丝》第4卷第23期，1928年6月出版。

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一天，北伐军第十七军路过句容县城，热闹非凡。郭纲琳走上街头，带领同学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歌曲。一位名叫上官芬的北伐军政治指导员，以国民党名义接管句容“县政”，发动了“反土豪”的斗争。在斗争中，郭纲琳挺起胸膛，曾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北伐军到来的第二天，郭纲琳带头剪去辫子，留上短发，还动员家中姐妹们反束胸、缠脚、穿耳环，鼓励她们要努力读书上进，做新时代的新女性。这一年，她祖母过生日，照例合家要祝寿。郭纲琳讨厌繁琐的封建礼节，故意不回家。她还主演了话剧“炸弹”，宣传婚姻自主，向封建礼教开火^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也笼罩句容县城。上官芬躲到上海去了^②，省里派来了亲蒋派人物当县长，逃跑的土豪也接着回来了……。句容县立中学的政治空气顿时沉闷起来，郭纲琳处于苦闷之中。这时，李少仙跟郭纲琳等进步同学讲革命的道理，讲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介绍俄国的革命情况，才使郭纲琳重新振奋起来。她特别愿意听李少仙的国文课，听他讲鲁迅的《呐喊》，邹容的《革命军》，借以激励自己。李少仙还专门给郭纲琳讲如何对待人生，如何认识和反抗家庭，劝勉郭纲琳“不可消极，往奋斗的道路上走。”^③

郭纲琳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越来越厌恶自己那个大家庭的腐朽。她憎恨那种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寄生生活，鄙视那些家养娇妻却又偷鸡摸狗的丑恶行为。她

①访问郭纲琳的谈话记录。

②巫兰溪的回忆材料。

③《语丝》第4卷第23期，1928年6月出版。

同情年轻的二嫂戴国琴。戴国琴十五岁来到郭家，嫁给了性愚形丑的二哥郭纲信。郭纲琳先是反对这门亲事，后又教戴国琴识字、读书，启发她要做新女性，不当寄生虫，设法离开这个罪恶家庭，以结束这场婚姻悲剧。她更为八婶杨家庆的死而悲愤。杨家庆由父母包办嫁给郭纲琳的八叔郭定相。郭定相嫌妻子文化低，成亲当晚即抗婚出走，不久郁郁病死于日本。年轻的杨家庆，虽有志读书，以求自立，但寡妇弱女，在那个社会和家庭里，终因不堪克夫之讥，在南京燕子矶投江自杀。这一幕幕的悲剧，使郭纲琳看透了这个大家庭的丑恶本质。她愤慨地说：“这个吃人的家啊！我恨不得杀个鸡犬不留！”^①

大革命失败后，句容县立中学也日趋反动。白话文被禁止了，李少仙被怀疑是共产党，师生们的进步活动被视为不轨行为。校方以“整饬风化”为名，公布了许多条文来禁止男女师生和男女同学的接触，实际是阻挠进步师生之间和进步同学之间的一切活动。为抗议校方的无理决定，郭纲琳和一些同学曾公开到李少仙住处聚会。一九二八年五月，校方借故解聘了李少仙，郭纲琳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李老师。李少仙临行嘱咐同学说：“社会是黑暗的，人群是麻木的。不要为我难过，一定要振作精神，勇往直前。”

郭纲琳父亲得知女儿在校“越轨”，十分恼火，常以辍学要挟。于是郭纲琳决心离开家庭，外出求知，寻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暑假，郭纲琳考入南京鼓楼“五卅”公学^②。在南京，她目睹了蒋介石血腥统治下的“新都”的恐怖惨状。

①访问郭纲琳谈话记录。

②郭纲伦：《郭英史略》（1951年4月）。

十分气愤。她常读具有革命倾向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创造》杂志，更激起了她的革命热忱。

一九二九年春，在七叔郭定林帮助下，郭纲琳到了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高中部）。一九三一年秋进入大学部^①。

（二）

中国公学是清末革命党人创办，后赖孙中山、黄兴扶持，得以发展。它在上海是所老学校，胡适、邵力子、熊克武等先后任过校长，但校内有共青团、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贫苦人的地狱。郭纲琳目睹这个极不公道的社会，气愤极了，常与进步同学在一起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咒骂国民党的腐败。在学校，她勤奋读书，积极探求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读了大量苏联的革命小说，如《母亲》、《毁灭》、《士敏土》等，深为书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所打动。

一九三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九月二十二日，我党中央发布决议，提出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多码头工人罢工，十万多学生罢课。

中国公学沸腾了！爱国学生为抗日救亡，同校内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校方竭力阻挠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利用旧学生会少数人，压制学生的抗日热忱。在学校地

^①蔡大燮 1983年1月26日给作者的信。

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爱国学生闹起了罢课风潮，接管旧学生会并驱逐校长。当时还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郭纲琳，在同寝室党团员的带动和帮助下，斗争积极勇敢。为了尽快组织中国公学的抗日救国会，郭纲琳带头冲进校长室，当面质问反动的副校长潘公展：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不让成立抗日救国会^①？她又毅然猛敲校钟，集合同学召开大会，并登台演讲，痛斥反动政府将祖国锦绣河山奉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同学们不要当亡国奴，要坚决抗日，收回失地。郭纲琳铿锵有力的演说，振动了在场人们的心弦，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据她的一些老同学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很钦佩她，羡慕她一个女同学能懂得这么多道理，羞愧自己不够关心国家大事。”^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郭纲琳和大家的努力奋斗，终于组织了中国公学学生抗日救国会。这时，反动派竟指使一个反动的浙江青年，给郭纲琳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妄图拉拢她放弃抗日斗争。郭纲琳不受诱惑，立即将信写上按语，加以公布^③，打击了反动派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破坏。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郭纲琳于一九三一年十至十一月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④。

“九一八”事变后，郭纲琳连续三次参加了上海学生到南京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为声援北京大学同学在南京的示威斗争，上海学生第三次来到南京，与广州、天津、北平等三万多学生汇合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国民党政府。一路

①李伟、王天眷的回忆材料。

②戚铮音的回忆材料。

③龙潜：《郭英烈士传略》（1945年2月）。

④蔡大燮1983年1月26日给作者的信。

上，郭纲琳和同学们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等口号，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息；并同大家一起砸碎了一贯造谣诬蔑爱国运动的《中央日报》社的玻璃橱窗。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蒋介石竟然命令反动警察和军队实行镇压。很多学生被推进了秦淮河，然后再用石头乱砸……。郭纲琳毫不畏惧，赤手空拳与军警搏斗，抢救受伤和落水的同学。时值寒冬，北风刺骨，她见一位落水同学冻得浑身发抖，便脱下棉旗袍披到那位同学身上。

当晚，组织上要郭纲琳立即回沪报告情况，发动更多学生前来支援。她冒着危险冲出反动派的包围，躲过多次搜查，到下关搭车返沪，顺利完成任务。然后又赶回南京，投入新的战斗。第二天，国民党派大批警察、步兵和马队，包围了示威学生的住所——中央大学，把学生们赶到大操场。国民党将领宋希濂骑着高头大马，训斥学生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蒋委员长命令你们立即离开南京，回学校去，谁不离开，‘格杀勿论’……。”他的话音刚落，郭纲琳和一群同学立即涌上去，责问宋希濂：“为了中华民族独立生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来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违什么法？犯什么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政府一声不哼，一枪不发，而对我们爱国学生出动全副武装，‘格杀勿论’，你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东洋奴才？”问得宋希濂哑口无言，竟指挥每两名荷枪士兵架一个学生，把大家押往下关车站强迫返沪。郭纲琳走在前头，借机向士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她的带动下，被押学生在路上展开了宣传攻势，不少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改变了原来的凶恶的态度，说：“我们不反对你们的抗日救亡行动，但我们是军人，

只好服从命令。”^①

郭纲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一九三一年底，就在第三次上南京示威游行返校不久，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蒋仲牟通知她，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②，同时转党的还有蔡大燮。从此，她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占领东北后，接着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上海，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挑起“淞沪战争”。郭纲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代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了上海学联工作。当时，中国公学因淞沪战争毁于炮火，很多学生无处安身。郭纲琳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被难同学会”，收容学生；募集寒衣，救济难民；夜以继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战地服务队，支援前线，干得热火朝天。

郭纲琳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她在上海当律师的大伯郭定森的不满。郭定森写信告诉了郭纲琳的父亲，说她在上海“不安分”。郭纲琳的父亲得知后，十分恼火，当即写信威胁女儿。郭纲琳毫不犹豫，用红水笔（表示绝交）给父亲写了回信，说：“我再也奈不住读死书了！”^③表示要坚决走救亡的道路。

此后，郭纲琳完全失去了家庭在经济上的接济，生活靠几个朋友一顿一顿的接济。一九三二年四月，党组织决定调郭纲琳到上海市法南区团委负责妇女工作。郭纲琳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放弃学业，投身革命。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解决生

①戚铮音的回忆材料。

②蔡大燮1983年1月26日给作者的信。

③郭纲伦：《郭英史略》（1951年1月）。

活困难，经组织允许，她到南市美亚绸厂任小职员^①，化名刘英。不久，她在厂里组织了左翼文研分会，以广泛团结群众。在上海工厂里建立文研分会，这是第一个。

美亚绸厂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女工、童工，厂里没有房子住，工人只得就近寄居。郭纲琳深入女工们的住所，为她们办起了女工夜校，教她们识字，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她揭露国民党借抗日为名进行航空募捐、搜刮民财买飞机，却到江西去打共产党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妇女为挽救祖国危亡和自身解放而斗争。为改善生活，增加工资，她多次组织工人罢工，还亲自带领女工夜晚到大街上书写标语，到电车上撒传单，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先后发展了二十多名团员，建立了团支部。这些活动，还波及到手套厂、袜厂和纱厂。

郭纲琳在开展工厂工作的同时，常到泉樟中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中学等校发动学生，开展救亡活动，建立团组织。她还到上海环龙路社联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班上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工人、学生的觉悟，武装他们的头脑。在讲习班上，她给有的工人讲了量变到质变、理论联系实际等哲学道理，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②。她还编写新歌词，秘密教进步工人唱歌，如：

共产党创造新世界，
领导工农兵，
努力干革命。

①一说郭纲琳到美亚绸厂是当工人。

②王留春的回忆材料。

杀地主、除豪绅，

贫农土地分。

打倒资本家，

实行八时制。

推翻国民党，

军阀铲除尽。

大家齐心共努力，

共产主义社会兴。

郭纲琳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战斗着、学习着，常常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照着，学习党的文件至深夜。她生活极为简朴，夏天只有两件衣服，平日常以几个烧饼充饥，省下的伙食费，支援其他同志。

一九三一年后，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上海街头布满了敌人的“眼线”，郭纲琳也常发现有密探跟踪。同志们为她担心，她却笑着说：“口供早就准备好了！怕什么？”^①

一九三二年冬，郭纲琳与她的老同学、战友李伟（即章全、詹伟烈）结婚，不久一同调至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郭纲琳负责领导工厂支部工作。沪西区工厂多，任务繁重。工人们白天都在紧张劳动，工作难以开展，郭纲琳常常是天未亮就在街灯下迎接上班工人，向他们了解情况；晚上又在路旁等候下班工人，同他们谈心。整整一个严冬，她就这样冒着寒冷，夜以继日地战斗着。

^①1951年7月1日《新华日报》。

一九三三年春，郭纲琳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与团省委巡视员李丰平直接接头。在恶劣的环境下，她机动灵活地将党的秘密指示、文件和生活费用递送给李丰平，传达到她联系的单位，从未出过差错。有一次，郭纲琳身带很多重要文件在街上走，遇上敌人搜查。她机警地躲进附近一家居民院里。当时，这户人家大人不在，只有两个小孩，郭纲琳告诉孩子她是“李姑妈”，从口袋抓了把糖果分给孩子吃，趁机将文件藏起来。当敌人搜查到这家时，郭纲琳神态自若，孩子对她也很有亲热。敌人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草草翻了一下就离去了。郭纲琳躲过敌人的搜查，完成了转送文件的任务^①。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郭纲琳以团省委巡视员身分到无锡，任团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无锡、宜兴、江阴、常熟、苏州等地共青团工作。她化名张英，以表姐身分住省立无锡中学一位女团员家中，为恢复和发展团的组织日夜奔波。她深入工厂，鼓励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她深入学校，向学生们推荐革命小说和鲁迅杂文，领导“反会考”^②的签名运动，引导陈云霞姐妹、华萼姐妹和顾秀芬、丁定英等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她深入商店、机关和街道里弄，连老太太也被发动起来了。团员华萼母亲信佛教，经郭纲琳的宣传鼓动，将抗日宣传品装进“朝山进香”的黄布袋里，散发在沪宁铁路线上。

为配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郭纲琳刻写、油印和散发传单，并且找工人谈话，宣传反“围剿”的重大意义。

^①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②“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阻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规定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统一考试合格，才发毕业证书，学生们起来反对这一做法。

为改善黄包车工人的地位，党团组织决定发动无锡全城黄包车工人的罢工斗争。郭纲琳深入黄包车工人之中，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大家起来同资本家斗争。这次罢工影响很大，使无锡市内交通瘫痪了好几天^①。

一九三三年底，无锡团县委被叛徒出卖而遭破坏，不少同志被捕。在危急中，郭纲琳迅速通知已暴露的同志立即转移，布置未暴露的同志隐蔽起来。安排定后，她自己化装为新娘，由黄宝华护送，绕道南门到旗站乘火车，脱离了险境^②。

一九三四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闸北区委已两次遭到破坏，环境险恶。郭纲琳毫不畏惧，接受任务后积极投入战斗。她主持制订了大昌德绸厂罢工计划，拟定了绸厂罢工宣传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傍晚，郭纲琳前往海宁路祥麟里一三三八号亭子间郑子仪家开会^③，布置绸厂罢工事宜。当她走进郑家，已有一个叫吴仁卿的在场，接着又来了浦东人顾阿新和自称是暹罗人白敦。房主郑子仪听说他们中有人未吃晚饭，便借口买面条出去了。不一会，一支中西探捕队闯了进来，郭纲琳感到突然，但很快镇定下来说：“我们是请房主人介绍工作的。”探捕们把亭子间翻腾得乱七八糟，从一只皮箱里抄走了文件和书籍二十五种，共几百件，遂即恶狠狠地把郭纲琳等四人推上囚车。到捕房后，敌人确认吴仁卿是他们的“眼线”加以释放，而郭纲琳与顾阿新、白敦则一起被关押。第二天，美国人在上海出版

①陈云霞的回忆材料。

②访问华渭臣、黄宝华谈话记录。

③一说祥麟里 1338 号是闸北区委机关所在地。

的《大美晚报》，就以《又一批共产党嫌疑被捕》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①。

(三)

郭纲琳被捕后化名郭英。第二天，敌人就将她从工部局汇司捕房押解到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并当即开始审讯。郭纲琳沉着、坚定，据理驳斥法庭的审讯。当天《大美晚报》的报道中说她“态度之从容，为从来犯人所罕见，面容冷酷，时摇头发平静之冷语。推事询其是否加入共党，摇其首称：‘什么党不党，我不知道’。问以汝为共产党书记，答称：‘不知道’，语更冷淡，站立被告席中无半点忧色。总之，为一冷酷镇静资格老练之女性，彼常向公安局人员面部注视”^②。

第二分院是特别法庭，凡在租界被捕的政治犯，都要在这里公开审讯后，方可引渡。一个星期后，即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法庭装模作样地对郭纲琳进行公开审讯。法官在问过郭纲琳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指责她犯了“危害民国”、“破坏睦邻”罪。郭纲琳从容不迫，反问法官道：“谁丢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三省土地，谁便是危害了民国。你们说这是我，还是你们国民党？谁侵犯了邻国的土地，谁抢劫了邻国的财产，谁奸淫了邻国的妇女，谁便是破坏了睦邻。你们说是我，还是日本帝国主义？”^③这一连串义正词严的责

^{①②}1934年1月13日《大美晚报》。

^③195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参见香港《周末》，1950年7月1日。

问,使法官们目瞪口呆,在场听众鸦雀无声,无不投以钦佩的目光。有一个外国记者报道说,“郭英——这位青年的女孩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光芒,比古代皇后还富于权力。那种光芒射向法官,法官失色;射向国民党那位可怜的官员,那位官员低头。结果弄得不是法庭在审讯犯人,好似犯人在裁判法庭。”^①公开审讯后,郭纲琳即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不久又押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郭纲琳被捕后,她的家里出于维护名门声望,立即设法营救,国民党也即乘机对郭纲琳加以诱惑。开始,郭家先托句容周乡、英巡捕房头目出身的上海大中华饭店经理戴步祥,后又求律师秦待时,虽破费近千元,结果都因郭纲琳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②。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罢休。在看守所里,敌人对郭纲琳继续进行诱惑和审讯,妄图使她屈服,但郭纲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敌人把她关在哪里,她就在那里战斗。一天,她在看守所偶然遇到战友李丰平,了解了狱中情况。从此,她便与难友们一起,巧妙地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并把嫂嫂、妹妹送来的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病弱的难友共同享用^③。有一次,有位女同志受了严刑,流露出悲观情绪。郭纲琳紧紧抱住她,亲切地吻着她,说:“我们是革命的战士,要爱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党性的纯洁。我们可以抛弃一切,决不能失去这个比生命更伟大的政治贞操!敌人要枪杀我们的身体,这是无法抵抗的,但

①郭纲伦:《郭英史略》(1951年1月)。

②1934年1月13日《大美晚报》。

③访问李丰平谈话记录。

我们决不允许敌人枪杀我们的灵魂！”^①那位女同志听了十分感动，她说：“我记住你的话，我的灵魂与你们在一起，与党在一起。”通过郭纲琳等同志的一番努力，在阴森恐怖的看守所里，多数同志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他们满怀信心，精心地用铜板在地上、墙上、铁床架子上磨成各种形状，有的还刻上字，互相赠送，以表达自己的心愿和互相鼓励之情。郭纲琳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将两枚铜板细心地磨成两颗铜心^②，镌刻上“健美”、“永是勇士”的字样，以表达她决不投降，永当粉碎旧社会的勇士，永当无产阶级革命勇士的决心。她这坚贞不屈的精神，鼓舞着每个难友。李丰平为永远纪念她的革命精神，将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大纲、大琳。在看守所，郭纲琳始终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除了咒骂敌人，唾弃叛徒外，别无口供。最后，敌人以郭纲琳犯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罪，判刑八年，于一九三四年五月押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执行。

模范监狱一排十间的平房里，关押着三十多名女政治犯，有何葆珍（化名田芬芳）、帅孟奇、夏子栩、钱瑛（化名彭友姑）、熊天荆（化名田耕）、易纪均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其他同志，郭纲琳与她们在一起共同进行斗争。一次，一位难友因写了“救国何罪？判刑坐牢，想不通……”的家信，被敌人发现而受拷打。郭纲琳立即将写有“不要害怕，坚持斗争，大家支持你”的纸团从铁窗里扔进去，那位同志看了纸团很受鼓舞^③。

①陈农菲：《不倒的红旗》。

②遗物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陈列室。

③戚铮音的回忆材料。

郭纲琳还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二次绝食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支持牛兰夫妇的斗争。太平洋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牛兰和他的夫人汪得利，由英、美帝国主义授意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也解送到南京模范监狱。这两位国际友人要求无条件释放，反动当局不理，于是他们绝食两周。郭纲琳等为支持牛兰夫妇的斗争，集体宣布绝食。当时出于斗争策略，在支持牛兰夫妇绝食提出的要求中，以抗议克扣囚粮、要求改善伙食为主要条件。斗争到第四天，敌人送来米饭和红烧肉，妄图进行破坏，还威胁说：“谁不复食，就枪毙谁！”参加绝食的同志们虽已体力衰弱，站立不稳，但决不示弱。郭纲琳首先挺起身子，高呼“不答应条件，决不复食，要枪毙一起枪毙吧！”接着同志们都高喊起来。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敌人被迫答应了条件，牛兰夫妇送医院治疗，斗争取得一定胜利^①。

监狱规定犯人每天一角五分的伙食费，本来已经少得可怜，又经过层层克扣，所剩无几，就以烂菜、霉米，掺上大量砂子、稗子和秕糠，让犯人吃。郭纲琳一边团结难友同监狱克扣犯人伙食费的罪行作斗争，一边在每次吃饭时细心地将砂子、稗子拣出来晾干，日积月累，竟积存了一大堆。她把这些砂石、稗子装在自己缝制的枕套里，对难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将这个枕头送到革命纪念馆，让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后代都知道为了革命胜利，我们这些人过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生活；也让他们看到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每一粒砂子、稗子便是对敌人的一份仇恨。”^②

^①夏之栩、戚铮音等的回忆材料。

^②陈农菲：《不倒的红旗》。

监狱中的女同志，还利用刺绣、打绒线来锤炼自己的意志。郭纲琳在一条手绢的左上角绣上五角星，右下角绣了英文“Long live”（万岁）^①字样，以表达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日夜思念之情；在一个枕头套上绣了一行刚劲有力的英文：“To struggle for truth！”（为真理而斗争！）^②以表达她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为探求真理而奋斗终身的决心。郭纲琳最喜欢大雁，曾对难友说过：“雁是很高尚的鸟，它们是合群的、最有组织和守纪律的。”她又准备了一个枕套，想绣一只大雁，以表明自己严守党的纪律和与难友们团结奋斗的决心。但是，刚绣完雁头雁身，被监狱当局发现了，收走了她和所有女友的针线。郭纲琳没有屈服。她找来一根竹签将其磨尖，用它代替绣花针，最后绣完了大雁的双翅，还在旁边加了“起来”二字。大雁昂首高飞，带着她的一颗赤心，去迎接明天的胜利！

在狱中，郭纲琳努力学习，她常叫妹妹郭纲华给她带很多书来，还设法买进一些书，与难友们共同秘密阅读、讨论。她常说：“我们的理论基础太差了，对革命工作常常感到不能胜任”；“革命只凭忠心，只凭热忱是不够的，必须学会战胜万恶敌人的本领。”她在给哥哥的信中说：“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直到最后一日。”^③她发觉狱中不禁止读外文书籍，高兴极了，便对难友说：“我们还可以读点马列的原著。”因此，在狱中很多女同志开始学习外语。而郭纲琳在原来掌握英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日语，如饥似渴地攻读英、

①②郭纲琳烈士的这些遗物，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陈列室。

③郭纲琳给郭纲伦的信（1935年8月）。

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她深有体会地说：“读点书，杂念也消失了。”

郭纲琳在监狱关押期间，嫂嫂翟其英、妹妹郭纲华、同学张录春常来探望。嫂嫂盼她能早日出狱，几次劝她悔过。她说：“你们如果要敌人在精神上枪毙我，我便不是你们的妹妹了。我是相信真理的人，我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人……。死，我是从来不怕的，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但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这番话对嫂嫂及在场的小妹郭纲华是极大的教育，她们从此再也不劝郭纲琳悔过了。但是，大哥郭纲伦得知如有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即可出狱的消息后，又请南京文艺联社负责人李宗璜说情保释。李宗璜串联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同狱方交涉^①，条件是要郭纲琳在出狱后放弃政治主张。郭纲伦写信给妹妹，希望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郭纲琳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回信说：“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我不能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后来，郭纲琳的父亲又请伪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民训部视察专员巫兰溪来劝郭纲琳悔过。巫兰溪以老师身分（在句容县立中学教过书）对郭纲琳说：“你父亲托我来看你，”“现在不少人都登报悔过了，出来了，你就出来算了。你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又有谁能记得你呢？”她断然答道：“你叫我们抗日，可以。要叫我写什么东西，是不行的。”^②，“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为了追求我的最崇高理想，我可以献出生命、青春和一切，我并不希望人们记起我、

^①郭纲伦：《郭英史略》（1951年1月）。

^②巫兰溪的回忆材料。

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上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上前进！你们这些人类的废料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斗争的意义。”

自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玩弄两面派阴谋，公开答应“准备大赦”，实际上将政治犯转到反省院，进行精神折磨。一九三六年九月，郭纲琳与其他难友们一起，被押到首都反省院（南京燕子矶晓庄附近），编入乙班^①。

在反省院，敌人对政治犯虽在物质条件方面改善了些，但在思想上却进行大量的所谓政治感化，规定每天早会要唱国民党的国歌，上午要上“三民主义课”和“马列主义批判课”，下午要写反省日记等。郭纲琳带头拒绝唱国民党的国歌，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并带头不上“三民主义”课。她说：“你们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杀民主义，你们根本没有实行什么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她发动难友们拒绝上“马列主义批判”课，还借写反省日记的机会写传单、情报，以鼓励难友进行斗争。这一切打乱了反省院的秩序，气坏了院长，就将郭纲琳关进了禁闭室^②。禁闭室大小不到两平方米，四面皆壁，只在门上开有一个二寸长、四寸宽的小窗孔，作为监视窗。室内空气不流通，阳光见不到，一天除三餐饭和一盆水外，再也接触不到人和事。在这里呆着，久而久之就会自瘫自亡。但是，郭纲琳以非凡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斗争。她用破布蘸上牙

①夏之栩的回忆材料。

②薛勤的回忆材料。

膏和吃饭时省下的青菜，在牢房墙上写下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及抗日救国等口号；在禁闭室高唱《国际歌》、《少先队歌》，以激励自己和鼓舞同志们继续斗争。很多难友也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来支持、声援郭纲琳的斗争^①。最后，郭纲琳以绝食来抗议，把送给她的米饭在禁闭室的门上一颗颗粘贴成“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十个大字^②。这次斗争后，国民党把郭纲琳看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准备将她送往别处管制。这时，郭纲琳的表妹张振华来到反省院，因她不知底细，还兴冲冲地对郭纲琳说：“琳姐！这里是关押的最后阶段了吧！你只要认个错，就会被释放的。”郭纲琳十分严肃地对张振华说：“认错？！我有什么错？！我没有错，更没有罪。振华！我不能为了贪生违背良心。我要坚持真理，挽救祖国，我为此视死如归，愿为真理献出我的生命……。”她鼓励张振华说：“你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无私无畏，有益于人民的人，以不负姐妹之情。”^③这坚定而热忱的言词，一直教育着张振华。

不久，敌人便将郭纲琳作为重点惩处对象，押回了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郭纲琳被押到有名的杀人魔王谷正伦那里，立即关进了“甲所十一号”。这号子是关押判过死刑即将执行的犯人的地方，所以难友们称其为“等死台”。郭纲琳来到这里，自知敌人将要对她下毒手，因而斗争得更为坚决。看守所长姚儒栋、中校法官李华龙亲自出马，软硬兼施，妄图叫郭纲琳屈服。郭纲琳借机与敌人周旋，对姚儒栋

①易纪均、龙潜等的回忆材料。

②戚铮音的回忆材料。

③张振华的回忆材料。

说：“你要我不闹可以，但你得拿钱请客。”当姚回答说无钱请客时，郭纲琳便毫不留情地讥讽道：“谁不知道你最有钱！你暗害人命，邀功请赏；你虚报名额，克扣囚粮；你贪污受贿，重利盘剥，亏你还装穷！”^①她还嘲笑法官说：“李华龙、李华龙！你不是一条活（华）龙，你是条死龙。”敌人被嘲弄得恼羞成怒，就用皮鞭抽打她。她怒视着敌人，愤恨地说：“你们打我干什么，何必这么凶？有本事，打日本鬼子去！”敌人用竹管套在她嘴上，不让她说话。可是郭纲琳仍然艰难地高唱：“同志们奋斗，革命的路，是一块块血肉拼筑起来……”；“曙光在前头，冲上前去，同志们奋斗！”后来，敌人恶狠狠地用铁杠子压，她昏过去了。敌人又用水浇，她醒过来仍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无计可施，竟用烂菜、大粪来堵她的嘴。郭纲琳一阵呕吐之后，仍然大骂敌人“混帐，混帐！”

这次受刑之后，郭纲琳用鲜血在囚室的墙上写下了闪闪发光的一行大字：“立场坚定，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流血！”^②敌人见严刑拷打无法使郭纲琳屈服，最后竟将她吊在男厕所里，对她进行侮辱^③。但郭纲琳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些卑鄙的伎俩吗？她继续编歌唱道：“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雨花台，雨花台，从此不到人间来。”她的这种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精神，深深为难友们所敬佩。帅孟奇后来回忆说：“她的英勇气概鼓舞了很多人，起了很大作用，使有些动摇的人坚定下来了。”

①②龙潜：《郭英烈士传略》（1945年2月）。

③薛迅的回忆材料。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争取“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积极营救我们的同志。蒋介石虽然表面答应，暗地里却对政治犯严密封锁有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等消息，并趁机处决一批政治犯。“七七事变”后，敌人还对郭纲琳进行诱骗，派了中央党部一个姓游的代表找郭纲琳谈话说：“共产党投降了，你还不投降！”郭纲琳立即驳斥说：“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国民党，没有向国民党投降的共产党。你们吃饱饭没有事做，又觉得自己灭亡不远，无妨天天多向自己说投降、投降，念惯了将来做起来更熟练。”敌人看诱骗仍然无效，便接着继续拷打，甚至用陪绑、假枪毙和灭绝人性的电刑，妄图叫郭纲琳在悔过书上签名、在自首表上打指纹。郭纲琳冷笑一声对敌人说：“什么悔过书、自首表，你们多印些好好保存起来，大约不久你们每个人都用得着的，到那时只要你们真心改悔，我们倒可以宽恕你们的愚昧！”^①敌人的无休止酷刑，虽使郭纲琳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她的意志却越来越坚强。只要身体稍能支撑，她就唱起了《囚徒之歌》：

磨砺呀，锻炼！
勇敢呀，奋斗！
总有一天那红旗，
会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总有一天那红旗，
会随着红日照遍全球！

^①1951年7月1日《新华日报》。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敌人将郭纲琳押到雨花台。临刑前敌人问郭纲琳还有什么话，郭纲琳听后大笑，并高唱《国际歌》来回答敌人。敌官员问：“快要死了，还高兴什么？”郭纲琳又大笑一阵，然后说：“你们整整关了我四年，花了你们不少心机，你们什么也没有得着，可见你们是失败了。而我不过瘦了些肉，我骨头还硬朗朗地存在，我的声音还响亮地存在。你们是用一个党，一个政府，用许多军队、许多警察、许多特务加上监狱、酷刑，我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胜利者是应当喜欢的，是应当高声大笑的……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胜利！”^①她接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共青团万岁！”……郭纲琳倒在血泊之中。烈士的遗骨散失在雨花台下。

郭纲琳烈士以她勇敢战斗的一生，证实了她不愧于“永是勇士”的光荣称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一生，可以燃烧，也可以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燃烧起来。”郭纲琳的一生是燃烧着的一生，以她熊熊的革命火焰照亮着共产主义的远大前程，引导青年一代奋勇前进！

作者附记 本文编写工作是在中共江苏省句容县委党史办公室、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和华东工程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初稿曾送烈士的战友和亲属审阅，根据他们的意见，又作了订正、补充和修改。

^①1950年7月1日《新华日报》。

董天知

刘洪岳 李成耀

董天知是山西抗敌救亡先进队总队长、抗日决死第三纵队政委，一九四〇年八月在“百团大战”中壮烈殉国，年仅二十九岁。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亲笔为他题写了“英气横贯比干岭，壮志常存鸭绿江”的挽联。在晋东南抗日军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同志们，要记清，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的炮火中，
在太行失去一盏照路灯，
董政治委员为求解放而牺牲。
莫悲观，莫伤情，
只要我们学得董政委的英勇精神，
哪怕它荆棘满地路难行，
一致向前冲，打破了黑暗争光明！

一九一一年四月一日（农历三月初三），董天知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县城关镇南街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董秉甫是一位教书先生，在地方上颇负人望。母亲欧淑林，勤劳贤惠。

董天知小名董亮，又叫董大文，上学后叫董旭生，一九三六年从北平出狱后到山西太原牺盟会工作时，才改名董天知。少时，他跟老秀才蔡石竹念过私塾，七岁时入荥阳南关国民小学读书。由于天性聪颖，又肯用功，《论语》中许多章节能背诵如流，各科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大楷小楷屡受先生表扬。他天真活泼，爱好体育文艺，踢球、跳绳、唱歌、演戏等活动，样样少不了他。他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最看不惯大同学欺负小同学。对外国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更是愤懑不平，他经常爱唱：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①！

董秉甫和欧淑林夫妇对子女教育很严，但却很少打骂孩子，往往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诱导启发。悬梁刺骨、牛角挂书、囊萤映雪等刻苦读书的传说，以及岳鹏举大破金兵、文天祥慷慨就义、郑成功驱逐倭寇等历史故事，都曾使董天知激动不已。初小毕业后，董天知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荥阳县立高小。这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日益衰落，父亲在郑州教欣育师范收入没有保证，他作为长子，不得不经常到农田里帮助母亲干活，有时推着独轮小车去卖菜，还与别人合伙卖过盐。后来，为了享受官费津贴，他到开封考入了河南省立第

^①据董天知的姐姐董少峰生前回忆。

一师范。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天知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创造》、《洪水》、《北斗》以及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思想上有很大进步。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占武汉，推动着河南工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董天知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和迎接北伐军的罢课游行等活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六月，董天知被学校开除，并受到警察局的通缉。他为了寻找光明道路，毅然离开河南去北平，不久又考入了弘达学院。在弘达学院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互济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担任了学院团支部委员、西城区团委委员、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干事，兼儿童局书记。只有十八九岁的董天知，按照上级指示，在青少年中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拣煤核的，拾破烂的，还有小叫卖、小乞丐等。他经常向孩子们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坐享其成的道理，讲共产党为穷人翻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在他的教育和组织下，这些穷孩子中有不少人成了在地下斗争中撒传单小组和粉笔标语队的好帮手，有的还作了不少交通、侦察工作。郝德青、张衡宇等人倡办的以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为主要目的的麀尔（OWL）读书会，董天知积极参加，每会必到。读书会规定的书目，都认真阅读，细心研究。为了推动北平地区的学生运动，他整天奔走，开会、接头、跑交通、送文件，样样都干，有时夜里还要起草和印刷《告工人书》、《告农民书》之类的小册子和宣传品，给周围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一年河北省委遭受大破坏，董天知于这一年的六月十三日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多次严刑拷问，也利用过女人诱

惑，但从他身上毫无所获。惨绝人寰的刑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以致使他卧病不起。七月底，他由敌宪兵司令部移到草岚子胡同监狱，先被判刑五年，后因他拒绝“反省”，又被延长刑期。由于董天知对党、对革命忠贞坚定，入狱不久，他便被狱中党支部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董天知转党后，负责狱中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作。狱中党支部书记是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党支部组织难友们学习革命理论，董天知听了杨献珍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听了殷鉴讲的工人运动史，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

一九三四年冬，狱中大部分坚定的政治犯为了要求下镣、公开看报与增添火炉，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组织上考虑到董天知长期卧病不起，身体虚弱，决定不要他参加。他坚决不肯，说：“个人生命事小，政治影响事大。”^①毅然宣布自己不再进食，与难友们一起绝食七日。当斗争取得胜利，难友们开始复食时，董天知已是气息奄奄了^②。

在狱中向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斗争委员会，是在狱中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由党员组成的；另一个叫生活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简称“司皮克”（Speak）。每一次斗争都是由斗争委员会事先作好安排，由“司皮克”直接向监方提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人权，改善生活，反剥削（克扣伙食），反打骂，反对人身攻击，延长放风

①邵怡的回忆。

②杨献珍：《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光荣殉国将士并悼念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载1940年9月2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时间等等。方法多利用吃饭时，大家停饭，提出要求，再让有斗争经验和能言善辩的难友同狱方争辩，把敌人驳得无话可说，迫使他们答应一些要求。大凡这样的场合，董天知是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①。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机智灵活，讲话幽默，常常使狱吏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为了鼓舞政治犯的斗争意志，狱中党支部提出了一个“红旗出狱”、“列宁墓前再见”的口号。董天知常用这个口号来激励难友，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他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被捕，到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狱，在铁窗中整整度过了五年零三个月，始终英勇不屈、坚定乐观，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董天知出狱之后，遵照党的指示，与薄一波、周仲英、韩钧、杨献珍一起，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先遣队，前往山西，走上了血雨腥风的抗日前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董天知到达太原，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工作。他奔波于晋南、晋东各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斗争纲领，热情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夜以继日地活动于我党和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各队之间。一个当时受了董天知影响参加救亡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初……董天知在晋南巡视工作，我在洪洞和他曾见过两面：一次是在牺盟协理员张天明办公室见到天知同志的少年英姿，吸引着一大批青年在他的周围。天知同志谈问题正确、简明、生动。我和他虽是由张天明介绍初次相识，却是一见如故，恰象多年来的熟朋友。第二次见面是在玉

^①朱则民的回忆。

峰山中学，这是一所基督教的教会中学，他是在那里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要从这些落后思想的陷坑中吸引出些进步的、纯洁的青年……。”

董天知是当时山西革命青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山西青年中威信甚高。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召开的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牺盟总会首届执行委员。为了把积极的先进的青年牺盟会员组织起来，又成立了抗敌救亡先锋队，董天知被选为“抗先”总队长。一九三八年牺盟会干部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成立后，董天知又被选为“民青”总团部首届执行委员。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几天，山西牺盟会、太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训练团及太原市各学校代表，组织慰劳团去芦沟桥、慰劳在那里抗击日寇的二十九军，董天知被选为慰劳团团团长。七月三十一日，宋哲元接到蒋介石撤离芦沟桥的命令。慰劳团在转移中后路被日军切断，不得不分散行动。董天知带着一部分人，从北平取道天津、济南、郑州，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才回到太原。

此时，山西救亡运动正广泛开展。薄一波等总结了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党要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立于不败之地，非实际掌握武装，改造旧军，创立新军不可。董天知返回太原后，即被派到第十团任政治主任。这个团旋改为决死三总队，一九三七年底发展到三个团，一九三八年元旦又改为决死三纵队，到一九三九年，兵力发展到六个团。董天知于一九三八年任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次年又任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当时，决死一纵队的负责人是薄一波，决死二纵队的负责人是韩钧。

自临汾失守后，决死三纵队转入翼城、沁北、浮山一带发展游击战争，战斗异常频繁。董天知在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曾说他和他的部队十八天与日寇打了二十仗。战斗间隙，他还给抗战报纸《黄河日报》撰写文章，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在激烈的东五岭战役、神头岭战役、秦岗阻击战中，他都身先士卒，率军重创日寇。一九三九年八月，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董天知坚守长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山西局势是新旧杂糅，决死三纵队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也很激烈。起初，由于各级军官大都是由阎锡山的旧军中调出委派的，这些人秉承阎锡山为首的旧势力的意志，不断与共产党派去的政治干部闹摩擦。三纵队的干部底子更差。一九三七年冬，总队长李武扬在曲沃图谋叛乱，经董天知果断处理，李武扬阴谋未逞，畏罪自杀，事态未致扩大。那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利用旧军官，另一方面要在实际战斗中培养新的军事干部。董天知在这方面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决死三纵队里许多中下级军事干部迅速成长起来，为我党完全掌握这支武装，奠定了基础。

日寇对董天知恨之入骨，曾悬赏两万光洋捉拿或杀害他。阎锡山对董天知则是又爱又怕，曾对其心腹、姨表弟梁化之说：“如果我们能把薄一波或董天知争取过来，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增加一倍。”^①他软硬兼施，并许以高官厚禄，但董天知不为所动。阎锡山常派人对董天知进行监视。一次，他以有要事相商为名，要召见董天知，妄图亲自威逼就范或扣留。董天知没有去，反而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进行了有理有节的

^①陈玉卿的回忆。

斗争。

一九三九年山西发生的“十二月政变”，是我党与阎锡山为争夺决死纵队控制权的一场殊死决斗。这场斗争总的看，我们是胜利了，但从决死三纵队本身来说，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事变前，决死三纵队在中、下层干部和战士中革命力量虽占绝对优势，但六个团中，有四个团长仍是旧军官。由于对他们防范不够，应付事变的准备不足，未能断然先发制人，以致在事变中，因敌方先行动手，结果数十名优秀共产党员被叛军枪杀。董天知十分痛心，但他临危不惧，指挥全部奋勇冲杀，终于闯出了叛军及阎顽军的包围，从岳南转移到太行。不久，被那几个反动团长欺骗裹胁的一部分中下级干部和战士，也陆续从叛军中逃出归队。决死三纵队经过短期整补，又迅速恢复扩充起来，并正式编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活跃于潞城、壶关、平顺之间，抗击日寇，屡建战功。

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董天知奉命率部破坏白晋线南段交通，并袭击潞城等敌人据点，以牵制和歼灭日寇兵力。八月二十日，部队冒雨行军一天，在潞城县王郭庄宿营。深夜，大股日军由汉奸带路，突然向我发动攻击。董天知立即集合总部干部和战士，同敌军进行浴血奋战，坚持到次日黎明，我方终将日寇击退。但是，党的好儿子董天知，在村外山坡上指挥战斗时，壮烈牺牲，以身报国。天亮以后，指战员们发现，他们敬爱的董政委连中七颗重机枪子弹，头部三颗，身上四颗。人们痛哭失声，宣誓要为董政委报仇！

何 功 伟

王毓英 杨存厚 黄蔼芙

何功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武汉“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回湖北，历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及鄂西特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一年一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勇就义。钱瑛曾对他的一生作了恳切的评价：

少小曾怀国难忧，
长成誓雪万民仇。
汉江怒吼天迟曙，
海上流亡老幸酬。
铁马金戈战敌伪，
高歌壮语励同囚。
忠贞那惜头颅掷，
含笑刑场典范留①。

①钱瑛：《纪念何彬烈士就义二十一周年》，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少小曾怀国难忧

何功伟，又名何彬、何斌、何明理，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乙卯年十月十五）诞生在湖北省咸宁县柏墩乡中田畈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何楚瑛当过中学校长，是咸宁县的一名绅士；生母阮宝枝，在何功伟七岁时病逝。

何功伟少年在家乡中田畈读私塾，一九二七年八月考入武昌阅马场湖北省立第四小学，三年后毕业，又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在中小学期间，他不仅刻苦读书，而且关心国家大事。

“九一八”事变后，何功伟曾慷慨出钱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向过路行人散发^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他还与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支援上海淞沪抗日战士和东北义勇军。

一九三三年七月，何功伟参加全省初中毕业会考，名列第一，随即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或“武高”）。在武高时，何功伟结识了生活书店武汉分店门市部经理顾一凡。在顾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钱亦石著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进步书籍，参加了生活书店组织的读书会，又结交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朋友。通过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和革命浪潮的初步锻炼，何功伟开始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走上了地

^①魏泽同：《催我奋起，催我前进》，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中共恩施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11月编印。

主阶级叛逆者的道路。

领导武汉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我国华北进攻，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奋。何功伟首先同生活书店读书会的万国瑞等串联，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们奔走武汉各学校，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华中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并电勉北平各级学校，应与平城共存亡，同时请武汉各学校当局，扶助学生，成立学生会，共图救亡。”^①在省高，何功伟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埋头读书，不能救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国土沦亡，学生要打先锋，为了民族解放，牺牲是光荣的。他的演说刚劲有力，唤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何功伟等的组织动员下，省高学生宣布罢课，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十二月十七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第二次联席会议召开，正式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选举武汉大学、省立高中、教育学院、高等商业学校、市二女中等十五所学校组成干事会；武大、省高、中华大学、华中大学、市一女中、教育学院等七校组成常务干事会，武大学生许升阶被推为主席，何功伟当选为常务干事。会议决定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①1935年12月17日《武汉日报》。

十二月十八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学联”第二次会议上，何功伟发表讲话，他说：武汉不能沉默了，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他在强调学生的责任时说：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我们要收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①。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举行游行示威问题，决定组成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武汉三镇的学生纷纷涌向街头。武昌有四十余所大中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在平阅路湖北省体育场集合后，计划结队前往汉口，汇合汉口学生，到日本租界示威。他们手执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来到汉阳门码头准备过江时，发现渡轮没有了，连一只小划子也看不见，长江已被封锁。反动当局的这种卑劣手段，激起学生们无比愤怒。游行委员会临时决定去找管理轮渡的建设厅交涉。建设厅长不但不答复学生代表的要求，反骂学生无理取闹。学生们一怒之下，冲进建设厅，砸了礼堂的玻璃窗，吓得那个厅长从后门逃跑了。此时，原来的游行总指挥怕事态扩大，丢下队伍离去。何功伟挺身而出，召集各校领队开会，决定：“我们今天不回去。他们不恢复轮渡交通，我们不恢复长街交通”^②。学生们拥护会议决定，把守了武昌最热闹的长街（今武昌解放路），从司门口公安局到平阅路省政府，到处都是激愤的人群。

夜幕降临，奔忙了一整天的学生们，情绪高昂，忍饥挨冻，

^①胡克实 1979 年 8 月的回忆。

^②《武昌学生大示威纪实》，载《大众生活》1936 年第 1 卷第 8 期。

在马路的石板上过夜。周围的居民深深被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所感动，他们夜不闭户，自动给学生送茶送水，曹祥泰商店还抬出大量饼干，慰劳学生。这一夜，何功伟没有合眼。他一面组织纠察队巡逻，保证学生安全；一面与各校领队研究对策；还在工人们的协助下，派少数学生乘木划“偷渡”过江，与汉口、汉阳的学生取得联系，商议共同坚持斗争，决不向反动派屈服。

二十一日拂晓，在何功伟的带领下，武昌学生们包围了省政府。他们高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过江”、“打倒汉奸亲日派”等口号，要求省政府接见学生。省政府闭门不纳，却在里面召集各校校长会议，策划对付学生的办法。经学生们再三交涉，何功伟等学生代表进入省政府，要求代省主席卢铸、教育厅长程其保转告国民政府，要公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内幕，维护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惩办行凶的军警祸首，释放被捕学生；要求湖北省政府维护学生运动，恢复轮渡交通。反动官员们对何功伟等的要求一味支吾，拖延不复。围在大门外的学生久等不见消息，一致喊着要“冲进去”。他们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拆散了门前的岗亭，用亭栏猛撞大门，催促当局赶快答复条件。卢铸、程其保见众怒难犯，才被迫向何功伟等学生代表表示：“一切要求都可以替诸位转送中央”；“轮渡明天恢复，诸位请先回去，明天请过江。”^①学生代表凯旋而归。何功伟向欢呼的同学们报告：我们胜利了！明天上午十点钟过江去示威游行，现在，全体解散，休息。他还兴奋地对大家说：“有你们在外面撞门，我们在里面气势更壮了。

① 《武昌学生大示威纪实》。

你们撞得越凶，他们就越害怕。”^①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续两天，武昌学生渡江到汉口，会合汉口、汉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何功伟在这次斗争中，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武汉学生运动的胜利，振奋了全省人民的革命精神。十二月二十五日，应城的学生和市民为声援北平、武汉学生，到县政府请愿，遭到军警开枪射击，四十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应城惨案”。事件发生后，武汉学联决议以罢课来支援应城学生。三十日上午，省高等四十一校举行总罢课，每校派出代表二人，在何功伟带领下，到省政府要求去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惩办凶手，慰问受伤同学。省政府秘书接见学生，拒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何功伟等毫不退让，在省政府内静坐示威。直到下午五时半，省政府答应了由省保安处、教育厅、民政厅各派一人与学生代表同往应城调查，他们才各自返回学校。

三十一日，由何功伟等四十一人组成的慰问团，同政府人员一起，赴应城调查和慰问受伤学生，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在省、县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应城县长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在应城县公园内悬挂爱国学生纪念匾，给受伤同学赔偿医药费，对肇事者责以军棍，将情节严重的值日官姚楚材押省惩办。这一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但在此时，武汉的运动却出现了波折。省教育厅为破坏四十一校罢课，在何功伟去应城之前，就下达了提前放寒假的命令。由于许多中间同学不愿意长期罢课，所以当他们的从应城返

^①何功楷 1979 年 7 月 1 日的回忆。

抵武汉时，大部分学生已离汉回家了。

新学期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统治更加严密。教育厅严令各校加紧管束学生，星期天也不准外出自由活动，违者予以惩办。各学校国民党右派分子亦乘机捣乱，时时与进步学生作对。几个月的斗争生活，使何功伟深深感到单靠学生孤军作战对付不了强大的反动派，也阻挡不了日寇的侵略。他同“学联”的其他成员研究，决定效法北平学生宣传团的样子，利用春假组织同学下乡作抗日宣传。四月一日，何功伟等带领几百人的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向葛店进发。一路上，他们演讲、唱歌、演戏，到葛店后又深入农民家里作调查研究和抗日宣传，深受沿途群众和葛店人民的欢迎。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在宣传中曾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左”的口号。国民党省政府抓住这一口实，于四月九日下令解散“学联”，并逮捕了一些进步学生。“学联”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何功伟没有停止战斗。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件发生，蒋介石与桂系冲突，内战重开。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发动全校学生罢课，还准备串联各校和各界酝酿新的行动^①。

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要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何功伟诚恳地向父亲解释：不是自己不愿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使得每一个有热血的青年不能够只埋头读书。国家

^①何功楷：《何功伟烈士在“一二九”运动中》，胡恪恭：《我的革命引路人》，均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兴亡，匹夫有责。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①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被列入黑名单，并准备逮捕。何功伟得知消息，在钱远铎的帮助下，乘坐日本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

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成立。何功伟到上海后，改名何明理，通过钱远铎的父亲钱亦石的关系，参加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他精明能干，稳重谦和，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为学联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书信，研究全国学生运动的动向，深得同志们的好评。一九三六年八月，经唐守愚、胡乔木的介绍，何功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先后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以学生身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继续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党派何功伟改名何彬，担任该团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何功伟既注意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又尽量发动基层群众，曾多次组织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前方战士、侦察汉奸等活

^①何功伟的“狱中给父亲的信”(1941年2月19日)，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②胡乔木1979年7月9日的回忆；唐守愚1979年7月23日的回忆。

动，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前，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内地工作团，由何功伟带队。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戏、募捐，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到武汉时，武汉正在发起成立群众性抗日团体——青年救国团。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将上海来的同志，全部转入武汉青年救国团。

何功伟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任务后，一九三七年年底，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在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乡促会”的宗旨是，“集中湖北一切爱国分子，在党政军各机关领导之下，以促进湖北乡村一切救亡工作，及一切战时建设”^①。由湖北国民党元老孔庚任会长，何功伟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并与长江局、湖北省工委联系。他曾主持“乡促”人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训练，参加训练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

一九三八年三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他首先抓因大革命失败而被破坏了的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工人、学生、教师中发展党员，以保证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区委在武昌纱厂集中区建立了工人特别支部，办起了工人夜校，还组织了歌咏队，读书会，带领工人进行合法的经济斗争，裕华纱厂女工要求发放迁散费的罢工斗争，就是何功伟组织发动的。在他的主持下，区委还从武昌选送了一批产业工人，

^①《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载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

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武昌区委处于地下，办公地方不固定，何功伟与青年救国团的同志住在一起。他虽不负责青救团的工作，但一有机会，便对他们进行理想、前途的教育，鼓舞大家坚定信心，团结民众，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中贡献力量。

五月十七日，徐州失守。党中央指示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于游击队与游击区”^①，并指示“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材大批的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湖北省委决定派何功伟回咸宁开辟鄂南地区的工作。

开展鄂南游击战争

鄂南，包括武昌、鄂城、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咸宁、蒲圻、嘉鱼十个县，是通往湘赣的走廊，战略地位重要。七月六日，何功伟回到了家乡——咸宁柏墩。一下汽车，就遇到了他的叔伯弟兄何功国和何功济，及好友雷同，他们都是柏墩青年团体“扶摇社”的成员。“扶摇社”原是一个青年学生吟诗聚餐、联络感情，类似读书会的组织。何功伟以

^{①②}《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

扶摇社为起点，开始了鄂南地区的斗争。在他的具体帮助教育下，何功国、何功济和雷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这是何功伟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何功伟还想方设法同当地大革命后隐蔽下来的老共产党员黄全德、潘继汉、林平等接上了关系，并同党派回咸宁工作的何功楷一起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县委机关设在中田畈小学，并在雷春发杂货店设立了县委的秘密联络站。八月，省委决定成立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工作，何功伟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也设在咸宁县中田畈。

鄂南特委首先抓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初，鄂南十县除嘉鱼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有党员五百余人”^①。特委还在咸宁柏墩等地举办了秘密的党员训练班，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为后来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八月中旬，鄂南特委在中田畈小学召集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武装问题，通过了何功伟提出的三点意见：一、共产党员要带头出钱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供养；二、要发动在大革命时期打冲锋的同志及其家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②。会后，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他的族叔何襄楨的工作。何襄楨是咸宁县名绅，出身行伍，曾当过民团团

①何彬：《鄂南工作情况报告》（1939年），原件存恩施地区博物馆。

②雷同：《开路先锋》，载《战斗在鄂豫边区》（2），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长，有钱、有势、有枪。何功伟多次登门向其晓以抗日救国大义，终于使何襄楨同意合作抗日。于是，在柏墩很快组织成一支拥有三百人枪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特委派雷同、钱远谿、钱远镜、何功国等参加游击队工作。何襄楨任大队长，雷同任大队指导员兼一中队指导员，钱远谿、钱远镜、何功国分任中队长或中队指导员。不久，这支游击队被国民党一二八师编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辖咸宁第二大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绅士，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向我党靠拢，在崇阳、阳新、武昌等地又相继建立起几支联合的抗日武装。

十月九日咸宁沦陷。咸宁第二大队拉上了西岭挂榜山，在密密的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还在西龙寺办了短期武装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何功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跃在游击队员之中。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鄂南成为日寇的后方，驻咸宁的日伪军沿着公路向西乡侵犯。何功伟指挥各地游击队在丛山密林、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相机袭击敌人。一天，驻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队，向挂榜山移动。游击队紧急集合，在山道上设伏，打得敌人仓惶逃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鄂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还未得到巩固发展，即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当时的鄂南，沿粤汉铁路、湘鄂公路、武（昌）阳（新）公路、阳（新）崇（阳）公路、金（牛）贺（胜桥）公路等交通要道，都有日寇驻守，沿途市镇还成立了“维持会”；国民党一九七、一二八两个师留在鄂南，没有撤退，到处制造摩擦；地方游击队，自卫队除极少数

由我党领导或有我们党参加外，有的掌握在内战时期办过民团的豪绅手中，有的在被我党清洗出去的叛徒手中。形势对我十分不利。十月间，阳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荒家山事件”，捕杀我党干部十四人。接着，十二月底，何襄楨被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此时，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联系。遵照省委预先的指示，鄂南工作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的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黄全德负责组织，王锡珍（陈约珥）负责宣传^①。为了与湘鄂赣特委保持联系，何功伟着手筹建从咸宁到平江的地下交通线，在阳新宝石河开设一家小广货店作掩护，建立了阳（新）通（山）工委机关兼联络站。

一九三九年二月，鄂南中心县委在咸宁马桥何家新屋召开扩大会议，何功伟主持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开了半个月，主要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联系鄂南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象一股春风吹到了鄂南，使在艰苦复杂环境中工作的同志们明确了方向，认识到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要独立自主地抓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党对咸宁县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咸宁县委，李一戎任书记。何功伟又与咸宁县委成员一起去筒头周召开县委会议，制定工作计划。他还深入我党领导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加紧抓扩大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并调王炳佛为武昌县委书记，以

^①何彬：《鄂南工作情况报告》（1939年），原件存恩施地区博物馆。

加紧对梁湖游击大队的领导。到一九三九年四月，这支队伍发展到五百人左右，活跃在鄂城、保安、金贺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曾多次袭击日寇，打击汉奸特务。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六月十二日，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包围我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鄂南形势急转直下，鄂南党与湘鄂赣特委的联络又告中断。七月，何功伟主持鄂南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埡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紧急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保存力量；二、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不久，曾一度与我谈判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蒋介石，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我梁湖游击大队，我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至此，鄂南党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受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斗争，一部分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鄂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何功伟和鄂南中心县委的同志在遭到一次次挫折面前，不气馁，不后退。他们在安排好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隐蔽、撤退工作后，派出干部北上、南下，寻找上级党委。何功伟亲自去重庆，经过长途跋涉，他于八月间在重庆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在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所，他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参加了办事处为平江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他深切怀念在鄂南牺牲的战友，也痛心地认识到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又愉快而坚定地接受党的指示，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撒播鄂西革命火种

何功伟在重庆没有久停，即遵照中共南方局的决定，到湘鄂西区党委工作。九月十一日，何功伟在湖北省松滋县茨河参加了中共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钱瑛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会议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区党委，选举钱瑛为区党委书记，蔡书彬为组织部长，何功伟为宣传部长。

一九四〇年二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由何功伟继任。他跋山涉水，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向干部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道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在宜昌，他通过各种关系和当地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接触，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宜昌县委在古老背成立时，他和陈克东一起去参加会议，要求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他还派干部加强对抗战演剧队的领导，组织演员们演出进步歌曲和话剧，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促进了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巴东，他和县委成员一起研究整顿组织和选配干部，预防不幸事件的发生。在建始，他深入到三里坝高级中学，为新入党的同志举行宣誓仪式，并协助县委同志在这个学校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教育党员团结进步师生，注意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在松滋，他到简易师范学校作政治形势报告，鼓动师生的革命斗志。

一九四〇年一月，何功伟在宜昌和区党委宣传干事、交通员许云结婚。许云回忆说：“我当时最感苦恼的是怎样才能正确地分析时局动向，在工作中怎样透过许多现象来抓本质的问题。这时，何功伟同志给我很多实际的帮助。我见到他经常从《世界知识》、国民党的报纸以及我们所能听到的正、反面材料中，提出问题，分析不同时期的时局动向和敌人的政策，从而提出怎样正确执行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和运用党的不同策略。他善于反复提出问题，多方面分析推敲，重视调查研究的材料，最后再作结论。他经常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揭露敌人各种反动宣传的本质。”^①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何功伟就是这样，带领着战友们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更加艰苦。何功伟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②他主持区党委制定了革命气节教育提纲，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向党员进行传达和讲解，使人人牢记其内容，领会其精神。这个提纲，是当时鄂西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向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它对于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和增强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起了重要作

^{①②}许云：《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载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用。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沿汉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我党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员，分途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夜以继日的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一直战斗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宜昌市内火光冲天的紧急时刻，才乘船赶往巴东。

八月，何功伟妥善安排了巴东党的工作后，又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许云，跟随西逃的难民，花了十天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四百余里到达恩施。这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在钱瑛主持下，鄂西特委召开会议，讨论了沙市、宜昌失守以后鄂西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研究了如何执行党在白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会议决定改组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栋任组织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

鄂西特委领导恩施地区的八个县和宜昌地区的宜都、宜昌、秭归、五峰、兴山五个县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恩施城郊五峰山腰的一个农民家里。特委委员进行了分工，马识途主管利川、来凤、咸丰、宣恩、五峰；王栋负责巴东、兴山、建始、恩施等县；刘惠馨负责机关工作；何功伟在城区一带活动，主持全面工作。

特委会议结束后，钱瑛又对何功伟说：许云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把钱大姐的话告诉了许云，许云为组织的关怀而感动。不久，她即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

自从宜昌失守之后，湖北的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到恩施

后，把驻湖北的各种特务组织的头目都纠集起来，建立了一个专门对付鄂西共产党组织的“恩施高干会”（一九四一年五月又改组为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陈诚亲自主持这个特务联合组织，指挥特务们查封进步书店，销毁进步书刊，解散抗日群众团体，检查邮政来往信件，大造反共舆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盯梢、追捕。因此，摆在鄂西共产党组织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何功伟多次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并在实际斗争中，既纠正了那些要在恩施搞城市暴动的“左”的倾向，又克服了一些同志中单纯依靠合法斗争，专搞学生运动的右的情绪，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准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薄弱的偏僻山乡，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经过一段努力，恩施的一些农村和城关的初中、高中、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农学院）、清江中学、生活书店（后改为胜利书店），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这些支部或小组，在何功伟等领导下，以教师、学生、农民、工人（手工业工人）的党员为骨干，吸收党外进步学生、教师、爱国青年参加，组织成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生活书店还大量推销《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县城党的组织创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印制了许多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罪恶活动的传单和党的秘密文件。通过这些活动，使恩施这个遍布国民党特务的古老山城，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吼声，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更是热气腾腾。

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一九四〇

年十日，陈诚等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很快被敌捕去。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露红”，他的处境十分险恶。上级党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他对钱瑛说：“‘大姐，都撤了，这儿工作怎办？’功伟自己知道有危险，为了工作他坚决地留下来。”^①党组织同意了何功伟的要求，但一再叮嘱，要他立即搬到乡下龙凤坝去。何功伟抓紧时间，一方面组织那些已暴露身分的党员立即转移和疏散；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保持革命气节。他在同同志们谈到如果万一不幸被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说：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你不要承认自己的真实身分，以保护组织，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已知道你的党员身分时，你就应该作公开的斗争^②。这是何功伟对战友的希望，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完全作到了这一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含笑刑场典范留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更加嚣张起来，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郑新民（又名郑建安）被捕叛变，供出了特委组织和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正在羊湾医院分娩等情况。特务们如获至宝，立即到医院

^①孙士祥：《鄂西斗争中的何功伟同志》，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②张清华：《难忘的一课》，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拘拿刘惠馨，但刘已于三天前出院，不知下落。诡计多端的军统特务刘裕绥，买通了医院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对刘裕绥说：刘惠馨住院时，有个男的经常来送鸡汤，此人最近被狗咬伤，常来医院换药。特务们根据这一线索，在医院附近暗中潜藏，等候那个被狗咬伤的人。

此人正是何功伟。原来，在刘惠馨临产时，因她的爱人马识途到鹤峰一带执行任务，何功伟就将她送进医院。小刘顺利生下一个女孩，何功伟每天到医院去看望。刘惠馨出院后，他被狗咬伤，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

一月二十日，何功伟到医院换药出来，返回那户农家。特务刘裕绥等紧紧跟踪，在途中将他逮捕。接着，敌人便按照郑新民提供的情况进行大搜捕，当天就将刘惠馨等捕去。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何功伟等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切，积极进行营救。二月二十五日，他亲自拟电，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电文说：“一月二十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①

何功伟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城内鼓楼街十六号、城西二十里方家坝和谭家坝等处。方家坝管理所直属“高干会”管辖，单间牢房里关押的多是重要的“政治犯”。何功伟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囚在一个谷仓里。小谷仓既不透气，又不透光，霉臭之气薰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功伟向管理所提出了严正抗议，强烈要求改善监狱待遇：“一、谷仓上开窗；二、尿桶加盖，清洗；三、读书。并严正指出，这是政治犯最起码的权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利，不答应就拒绝进食，”^①凶残的所长拒不答应其要求，何功伟便宣布绝食。三天过去了，何功伟粒米不进。“高干会”特务头子，少将参谋刘培初得知情况，慌忙吩咐所长：“快给他开窗，小不忍，则乱大谋”^②。于是，密闭的谷仓房开了一个五寸见方的小窗口，仓内的尿桶每天有人清扫一次，准许早上洗脸时，在谷仓门口单独活动一会，还给他送来了英语书和《资治通鉴》；其他牢房的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由于叛徒郑新民的当面指认，何功伟的特委书记身分已经暴露。他决心象被捕前说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法庭上，特务头子刘培初、阎夏阳、朱若愚等人玩弄各种花招，妄图压服这个鄂西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功伟镇定若常，从容对敌，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团结抗日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都归于失败。

敌人见审讯不成，便变换手法，派“要员”进行诱降。一九四一年春天，鄂西国民党的许多头面人物，有的骑马，有的坐轿，络绎不绝地来到方家坝。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等，都来“拜访”何功伟。这些人进入管理所，总是先“夸赞”一番何功伟的才华和风度，说什么“你只是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的栋梁之才，只要悔悟，前途无量，鹏程万里”；接着便用高官厚禄引诱：“只要你交出共党组织名单，省府委员、秘书、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任你挑选”。何功

^{①②}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丹心耿耿照千秋》，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不管什么“要员”来当“说客”，他都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后悔我选择的道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不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①

诱降失败，敌人又生一计：派出一些所谓的“名士”、“学者”，到方家坝同何功伟辩论，妄想动摇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这些人对何功伟说：你是书香门庭子弟，要紧的是讲忠孝仁爱之道，礼义廉耻之义。共产党游而不击，抗上作乱，共产共妻，阶级斗争，都违反中国之“四维八德”。何功伟蔑视这般受反动统治阶级雇佣的无耻文人，用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大量事实，驳斥他们散布的反动理论，使他们一个个败下阵去，扫兴而归。

敌人仍不肯罢休，陈诚亲自电谕驻藕池口的一二九师师长，令其派人从湖北石首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送往恩施，妄想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四月八日，何楚瑛来到方家坝管理所。老人希望儿子重新获得自由心切，便劝儿子答应当局的要求。何功伟对他的父亲说：“您老人家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做儿子的要对党尽忠，忠孝不能两全了。”^②何楚瑛在恩施住了四十多天，往管理所跑了十多次。最后，何功伟抱着父亲说：“爷呀！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我的志向已定，您不用强求了。”^③老人终于

①②曾传霖 1981年10月的回忆。

③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丹心耿耿照千秋》、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被儿子的耿耿丹心感动了。他不仅不再劝降，而且帮助儿子，把写给许云和组织的信秘密带出监牢，经钱远谿、钱远铎、何功楷等人，转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

何功伟被捕后给他的父亲写过两封信，管理所都不准发出。老人来探监时何功伟才当面交给了父亲。他在信中回忆了自己成长和奔走革命的历程，特别表示了“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惟愿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信中说：“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以苟全自己性命？”“胜利之路，纵横曲折，但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年。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可破涕为笑也。”^①人生谁无父母，谁无妻儿？然而何功伟为人民翻身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却甘愿牺牲骨肉之情，抛头颅，洒热血，以利社会国家。这种高尚情操和气节，真可以撼天地而泣鬼神！

何功伟不仅自己在狱中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而且教育狱中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保持革命气节。初被捕时，他关在楼上，其他同志关在楼下。他把《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中的内容，低声念给狱中同志听，鼓励他们坚定，再坚定！为了使更多的难友鼓起斗争的勇气，他经常引吭高歌。唱歌，本来是

^①何功伟给父亲的信，复制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他的爱好。但在地下工作时期，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好长时间已经不再唱歌了。被捕后，他常被单独囚禁，无法以别的形式同难友接触，就以歌曲为武器，来打击敌人，教育难友。起初，特务们不准他唱，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一定的唱歌自由。他在给父亲的遗书中说：“儿元月二十日入狱，于今洽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仰无愧，故能颂正气歌，咏满江红，毫不觉墙外韶光飞去。”^①据狱中不少同志后来回忆，何功伟在坐牢时最喜爱和经常唱的歌是《延安颂》。这是他心向延安，心向党中央的深厚感情的流露，同时也唤起狱中难友对延安的无限向往。

一九四一年九月，何功伟和方家坝关押的其他“犯人”一起，被转至潭家坝监狱。这里关押的还有抗战剧团的一批同志。何功伟继续用战斗的歌曲来激励自己，鼓舞难友。每到夜晚，总是何功伟先唱，女牢的同志们以《夜莺曲》来和：“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何歌声充满凄怆？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人世忧伤！”接着，男女囚室又齐声唱起高尔基的《囚徒歌》，唱起《茫茫的西伯利亚》：“难友们不要呻吟！我们得把牙根咬紧，又粗又长的铁链，把我们捆成一条心。我们冒着黑暗前进！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何功伟不但会唱很多的歌，而且还善于赋诗填词。下面就是他在狱中以《半夜歌声》的曲谱填写的赠给妻子的诗篇——《忆许云》：

^①复制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黑夜阻着黎明，只影吊着单形，
镣铐锁着手胫，怒火燃着赤心。
蚊成雷，鼠成群，灯光暗，暑气蒸，
在没有太阳的角落里，
谁给我同情慰问？
谁抚我痛苦的伤痕？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呵，姑娘，去秋握别后，再不见你的倩影，
别离为了战斗，再会待胜利来临。
谁知未胜先死，怎不使英雄泪满襟？！
你失去了勇敢的战友，是否感到战线吃紧？
我失去亲爱的伴侣，岂不感到途征凄清？
不！姑娘，你应该补上我的岗位，坚决地打击敌人！
愿你同千千万万的人们，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呵，姑娘，天昏昏，地冥冥，用什么来纪念我们的爱情？
惟有作不疲倦的斗争，
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愤怒？
惟有这狱中的歌声。”^①

这首革命诗歌，不仅何功伟经常唱，而且不少难友们也会唱。大家越唱越激昂，增添了巨大精神力量。何功伟还写过一首《奴隶恋歌》，其中有这样一段：“亲爱的，你累了一

^①转引自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天，我替你安排枕席；我给你唱歌，你在我身边先睡下来。愿你在梦中随着歌声，走到一个自由世界！我还要多坐一会，我还要看那东方的虹采。”这首诗告诉人们，“奴隶们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有着更热烈更纯洁的恋爱。”^①为了要看到“东方的虹采”，革命者应把生死置之度外。

何功伟的崇高品德，感化了看守他的一个老狱卒。他经常通过这个老狱卒与其他囚室取得联系，把自己创作的诗歌送给难友。何功伟的单人囚室楼上，还关押着几位同志。他从敌人尚未发现的一个小小的楼板缝里，把写好的纸条塞到上面囚室里，要大家保持革命气节，注意锻炼身体，抓紧时间学习。……难友们见监狱看守并不严密，曾想通过关系，贿赂看守人，先帮助何功伟越狱。他立即写条子通知大家：“不要为我的处境担忧，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敌人外弛内张，逃亡的可能性很小。要作有效的斗争，不作无谓的牺牲。”^②

何功伟的一言一行不仅使狱中的共产党员坚定了立场，而且教育了狱中的非党爱国青年。他们原先对共产党只有肤浅抽象的认识，入狱后从何功伟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加热爱共产党。有的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板缝里丢到何功伟的囚室，表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敌人见一切手段都无法使何功伟屈服，便决定对他下毒手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一天，阎夏阳提审何功伟，说：“给你一个最后考虑机会，现在悔悟还不算晚。”何功伟意识到将

^①转引自1942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副刊。

^②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丹心耿耿照千秋》，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要发生的事情，他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他在给许云的诀别书写道：“在临刑前，不能最后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的未竟事业！”^①

十一月十七日，在看守的押送下，何功伟含笑和难友们告别，大步跨出了牢房，走向荒山“五道洞”的坡地。在刑场，刽子手要何功伟跪下，他昂首挺胸，愤怒地吼道：共产党人不会跪下的！敌人的枪响了，年仅二十六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何功伟，倒在了血泊中。与他同时被敌人杀害的，还有坚强的女战士刘惠馨。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遗书和遗诗，并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鄂西何彬（特书）、刘惠馨……牺牲。”^②六月七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的楷模。”中共中央青委的这副挽联，表达了全党和全国青年对烈士一生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怀念。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许云、密加凡、

①许云：《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同志》。

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钱远铎、钱远镛、徐良咏、张进、余梅清、吴培根、何功倍、何功俊，并得到朱文尧、曾卓、郭其耀的大力协助，向我们提供了他们访问胡乔木、何功楷、李锐、顾一凡、孙士祥、程翰、唐守愚，范元甄等回忆资料，朱汉申、徐达参加过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

邓振询

陈志勇 李佩良

邓振询，又名邓仲铭、邓重民，江西省兴国县塘石乡大塘下村人，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十一）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江西省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劳动人民委员（即劳动部长），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皖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等职，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不幸牺牲于江苏省江宁县。

邓振询的家乡兴国，在江西省南部，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农民生活极其贫困。

邓振询的父亲邓允煥，是一位朴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自己没有一寸耕地，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一年收获的粮食，交租后所剩无几。为了生计，还常常要给人打短工、干零活。邓振询六岁那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母亲陈氏身上，四年以后，陈氏终因无法生活而被迫携儿改嫁。邓振询的继父（当地称契父）是个泥水匠，家里也很贫苦，但由于人口少，劳力多，生活也还过得去。邓振询除每天早晚放牛割草以外，也念了几年私塾。后来，由于家庭生活日趋艰难，继

父便不让他继续念书，带他去学泥瓦活，终日东跑西颠给有钱有势的人家修房建屋，受苦受累不说，还要受人的斥责。邓振询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不久，继父也离开了人间。悲惨的经历，不平的世道，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进驻江西。这时候，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胡灿、陈奇涵等先后从广东回到兴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县工会、农会和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工农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邓振询积极投身于当地的农民运动，和广大农民一起，开展减租减息，参加游行示威，建立农民协会，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有力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加紧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相勾结，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一手制造了赣州惨案，惨杀了赣山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四月，兴国的反动商业资本家不惜钱财，利用封建氏族矛盾，组织暴徒捣毁党的领导机关和县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会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兴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邓振询和其他革命者一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八一南昌起义后，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一些共产党员又先后回到兴国，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邓振询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坚定地投身革命活动。他经常利用泥水匠的身分进行秘密串连，宣传发动工人、农民，建立秘密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一九二七年底，他组织和参加了秘密镇压当地恶霸地主王化铭和谢才伟父子的“赤色恐怖”，打击了地主豪绅的

反动气焰。

一九二八年春，邓振询秘密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四月，兴国县党组织在冰心洞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立即举行暴动。邓振询积极参与了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①。暴动武装进占县城后，张贴、散发“实行土地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苟捐杂税”等标语口号，抓了一批土豪劣绅，迫令他们沿街挨户叫开商家的门，罚了地主商人一部分款，收缴了商家的武器二百余支，还捕杀了一些主要的反动分子。同时放出了全部所谓犯人，发放了太平仓（官仓）的稻谷^②。武装暴动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兴国和赣南各县人民的革命热情。

一九二九年二月，邓振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选为塘石乡工会主任和区工会委员长。

不久，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于同年三月来到兴国城。毛泽东亲自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勉励兴国县的共产党员说：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应加强争取群众的观念，要象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着“争取群众”^③。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邓振询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一九三〇年二月，由于邓振询出色地领导了全县工人革命斗争，而“成了兴国全县工人运

①江渭清：《在邓振询烈士追悼大会上代表苏皖区党委致的悼词》，抄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杨林（即欧阳惠林），《邓仲铭同志简历》，载《江苏革命史料选辑——革命烈士英雄事迹专辑》。

②③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选编本第2集。

动的指导者，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成了全县工人解放斗争的领袖。”^①

这年年初，兴国县委和赣南特委曾组织工农群众，配合主力红军进行了五次攻打赣州、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邓振询为了使工会工作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工人预备队，他布置各基层工会组织，对工人实行军事化训练，冬春季节每天早上训练一小时，夏秋季节晚饭后训练一小时。工人武装平时站岗放哨，维护地方治安，一有军事情况马上行动。

邓振询担任县工会委员长时，首先着力于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兴国县的工人，大多是从事船筏、码头、店员、泥木、竹作、腐作、纺织、缝纫、理发等行业的手工业者，工作分散，人员不集中，游动性大。为了把分散在各行业的工人广泛地组织到工会里来，他常常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码头、船筏、工场、作坊和理发店去开展工作。他十分关心工人们的疾苦，并把争取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人工资，作为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他也十分重视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常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广大工农群众说：经济斗争，改善待遇是需要的，但必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争取工人的个人利益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合起来，工人才能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邓振询作为江西省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候，他“已经不仅是兴国县的革命领袖，而成了赣南工农及一切劳动者的领袖了。”^②

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叶坪附近的

^{①②}曾山：《悼邓振询同志》，载1943年《先锋》第6期。

黄家山召开了闽赣两省苏区工人代表大会。邓振询率领江西省工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在预备会议上，邓振询被选为由二十人组成的大会主席之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江西省、福建省职工联合会，邓振询被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并任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组织部长，后升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①

邓振询在担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的一年多时间里，积极领导全省各行业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而斗争。他教育各级工会干部，应从解决工人疾苦、关心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着手去发动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活跃工会组织。他还经常巡视各地工会组织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情况。他克服文化低的困难，常常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办的机关报《苏区工人》上发表文章，介绍各地工会发动工人群众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取得胜利的情景。他在一篇题为《安源县工人热烈拥护工会发动了工人的结果》一文中说，该县的城市工人由于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改良了工人待遇，从而调动了工人群众拥护工会、参加工会的积极性。他在《于都工人斗争胜利》、《南广县城市工人斗争胜利》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工人向不法老板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情况。

当时，反“围剿”的斗争不仅是红军的中心任务，也是苏区工人斗争的主要任务。邓振询领导的省职工联合会，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购买苏维埃政府发行的

^① 《红色中华》报1932年2月10日、17日报道；江渭清：《在邓振询烈士追悼大会上代表苏皖区党委致的悼词》。

革命公债，节省每一枚铜板，用于革命战争，以粉碎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在他的领导下，省、县各级工会往往超过上级规定的“扩红”和“购买公债”预定数。他在《兴国县扩大红军新的伟大成绩》一文中写道，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这一个月中就有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参加红军，“兴国县工人拿三个月工资来买公债，超过预定数一倍”^①。

在工会内部，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不可避免地混入少数坏人和产生个别蜕化变质分子。邓振询在《宁都职工会委员长怠工腐化》^②一文中，严厉地鞭笞了工人内部这种腐化变质的现象，分析了产生怠工腐化的根源，号召广大工会干部加强思想改造，防止腐化变质现象的产生。为了纯洁各级工会组织，他坚决地清除了混入工会内部的不良分子。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全总苏区执行局为统一全国手工业工会的工作，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邓振询参加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被选为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从此，他就在刘少奇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工作，并经常得到刘少奇的指点帮助。他常常只带一位通讯员前往各县、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有时来回路上情况很复杂，形势很危险，但他从不在乎，总是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一次，他带通讯员小张去汀州巡视工作。小张听说那边有流氓武装大刀会，有点害怕。他就耐心地教育小张说：搞革命就是要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红军战士天天在前线流血牺牲，为的是解放全国人民，我们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有这种精神。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

^{①②} 《苏区工人》第10期。

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党中央为了粉碎敌人“围剿”，作出了开展扩（大）红（军）突击月活动的决定，号召苏区工农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在这次扩红突击月活动中，邓振询领导的全总执行局西岗（扩红）突击队，和阿金领导的党中央瑞金（扩红）突击队，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兴国（扩红）突击队，成为模范突击队，受到党中央的表扬；邓振询也被评为“扩红”模范。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举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党中央专门召开授奖大会，向三个模范突击队授奖旗。据当时报纸报道：“在授旗的时候，全场的空气是兴奋极了，党中央代表项英同志手擎着旗子（呀！是漂亮极了的旗子）微笑地喊着瑞金、兴国、西江（岗）突击队的名字，于是在四、五千只眼睛的钦羡的注视下，三县突击队队长阿金、罗荣桓、邓振询接受旗子，于是雷鸣般的掌声响了，于是三个突击队队长都脸红红的胜利地微笑着把他们的奖品带回自己的代表团来了。啊！这是如何热烈的状况啊。”^①就在这次大会上，邓振询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劳动人民委员（部长）^②。

邓振询担任劳动部长后，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日夜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努力工作。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党中央决定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的领导人到各军团随军行动，邓振询被分配在五军团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①1934年2月1日《红色中华》报。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1934年2月3日）。

长征开始后，由于“左”倾错误在军事行动中采取逃跑主义，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邓振询知道遵义会议批判了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时，感到欢欣鼓舞。

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担负着掩护中央红军突围的重任。邓振询每到一地，就带领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当地居民之中，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北上抗日方针，解释红军为穷苦大众谋解放的宗旨。当地群众在了解了红军是穷苦大众自己的军队以后，很快就把埋藏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长征中，邓振询总是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先人后己的优良品德。由于粮食供不上，几天吃不到东西是常事。但每当供给部门弄到一点可充饥的食物时，他总是先想到部队，想到自己身边的同志。有一次部队宿营，警卫员弄到一点面粉，做了几个馍馍送给他。他坚决不吃，叫分给连续几天粒米未进的同志吃^①。

一九三五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退却逃跑、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错误，通过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分兵后，中央决定调邓振询到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民运部工作。此后，他跟随党中央、毛泽东，一直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加强对西北土地革命运动的领

^①见李坚真的回忆材料，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导，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成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七部一局，邓振询为劳动部部长。

同年底，在罗迈、邓颖超、蔡畅等的关怀下，邓振询和李坚真结婚。李坚真（又名李贝珍），是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中的一位，也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县委书记。他们的婚礼进行得热烈而又简朴。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刘少奇在离开瓦窑堡去华北工作前夕，单独召见邓振询、李坚真，谈了当时的形势和工会工作的任务，指出工会工作要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实现党的统一战线而努力，以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此后，邓振询肩负起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央将许多工农干部送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一月，抗大第二期开学，邓振询入校学习。他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课和报告，受到了很大教育，进一步从理论上弄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文化虽低，但刻苦钻研，身上带一个小本子，每有心得或疑难就随时记下来，一遇机会就向人请教。周末回家，总要与李坚真交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共同对外，一致抗日，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将陕甘宁边区工农政府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邓振询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兼工农厅厅长。在这期间，他努力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发展边区的农业、工商业，为增加生产，改善工农生活，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代表又同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

为了完成南方游击队集中整编，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加强南方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南方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邓振询和曾山、李坚真、罗梓明、李一氓、李华楷、朱辉、陈世富等一道离开延安，经西安到达武汉。在武汉，周恩来亲自组织他们认真学习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十二月底，他们离开武汉经九江抵达南昌。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同时将长征时成立的中共中央分局改为东南分局，并新成立了江西省委，邓振询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一月底，受东南分局派遣，邓振询和温仰春、李坚真、李桂英等前往龙岩，完成组建新四军二支队的任务。那天，邓振询等一行五人在广昌过夜，接到情报说，谭震林在瑞金被自称为“国民党别动队”的王彩特部扣留。次日，邓振询等立即赶往瑞金，准备与王彩特交涉，但亦被王彩特无理扣留。面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邓振询、谭震林等严正指出：“集中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开赴江南前线抗日，是国共两党谈判共同确定的，大敌当前，你们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扣留我们，破坏民族团结，破坏抗战，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王彩特以没有接到上级命令、需要请示报告为由，不肯马上放人。后经新四军

军部及中共中央交涉，加上社会舆论的谴责，王彩特才被迫赔礼放行。温仰春、邓振询等先后抵达龙岩，协助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完成了二支队的组建工作。三月一日，二支队开赴江南前线抗日。

在整编新四军的同时，邓振询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赴江西各地，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并且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十一月初，邓振询由吉安返回南昌。此时，南昌形势已很紧张。根据上级指示，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东南局报请中央批准，调他担任皖南特委书记。

邓振询到皖南后，深入各地巡视，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泾县、南陵、繁昌、青阳等县县委和徽州、南（陵）芜（湖）宣（城）等中心县委，积极领导党员和各县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这期间，南昌、武汉、上海、杭州、芜湖等地的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邓振询积极配合新四军民运部热情地接待这些爱国青年，动员他们参军。在他的领导下，皖南地区的扩军运动也取得显著成果，“先后发展了三个主力团。”^①

为了加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九四〇年二月，经陈毅要求、东南局同意，邓振询被派到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

在这之前，陈毅、粟裕等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在西

^①李步新的回忆材料，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临南京、东至海边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一九三八年夏率新四军一、二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一、二支队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和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苏南军事。同年十二月，在金坊县建昌圩召开了苏皖区党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邓振询正是在这个时期调任苏皖区党委书记的。邓振询来到苏南后，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根据地建设，使苏南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桥梁，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一九四〇年春，邓振询主持苏皖区党委，颁布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提出了“坚持江南抗日战争，驱除日寇出江南，驱除日寇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与腐败的官僚统治，实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改善民生，破坏敌伪一切经济”等项主张，号召“全江南人民本此方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①。这个纲领对于发展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不久，苏南斗争进入艰苦时期。一方面，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伪国民政府，配合日军加强对敌后“扫荡”，竭力破坏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在苏南加紧军事进攻，企图胁迫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退出溧（阳）武（进）公路川南地区。七月初，陈毅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

^①载《新四军在茅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力北渡长江，留下邓振询、罗忠毅、廖海涛三人组成江南军政党委员会，邓振询任书记，统一领导苏南的全面工作。

国民党顽固派乘新四军主力北渡之机，策动刀会暴乱，制造“横山事件”，武装侵入我宣（城）当（涂）芜（湖）地区，缴去我地方武装枪械，杀害我农救会委员和烈军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环境日趋恶化之时，少数地区在发动群众斗争时又一度犯了“左”的错误，以致引起部分上层人士的疑惧动摇，甚至出现疏远我党的现象。邓振询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时纠正“左”的错误。他说：苏南统战工作是由陈毅同志打下坚实基础的，由于陈毅同志的教育和团结工作，才争取了大批地方开明人士参加了抗日行列，我们要加倍珍惜陈毅同志亲手培植起来的苏南统战成果，重视搞好各方面同我们合作的人的关系。他指示有关地区的领导干部出面做统战工作，消除了部分人士的疑虑，同时还结交了新的朋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横山事件”发生后，句（容）溧（水）地区的刀会头子限制我方人员进入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一部分同志主张用武力解决刀会。邓振询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刀会虽是封建落后组织，并且受日伪顽的利用和笼络，但它毕竟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伪顽组织，不能对其使用武力，而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其基层组织，中立上层头子，孤立和打击极个别的反动分子。邓振询还主持区党委规定了切实的措施，照顾刀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如不在其地区内收税等，因而逐步缓和了紧张关系，并争取了蒋永广等刀会首领的中立。这些工作，为我党在困难条件下集中力量，对付敌顽，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振询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他调到苏南不久，就和陈毅共同主持召开了江南地方党与军队党的联席会议，提出了“积极扩大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建立民主政权，大胆发展党，改善党的工作方式，大胆培养干部”^①等项任务。根据联席会议精神，邓振询主持的区党委，将原来的丹南、苏皖、苏北三个特委分成丹北、丹南、江（宁）、当（涂）溧（水）、高（淳）芜（湖）宣（城）、郎（溪）广（德）等中心县委以及太湖工委、长溧工委明确提出了各中心县委和工委组织发展和巩固计划^②。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每个党员与干部都能一切为党，牺牲个人，提高党性”^③，邓振询还提出了教育党员干部的具体措施，如“县级干部应以策略教育为主，区级干部应以工作教育为主，支部党员应以思想教育为主”^④采用办训练班方式，组织区县以上干部学习提高。仅一九四〇年，区党委办了三期党训班，培训学员二百余名，邓振询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党课。他的报告简明易懂，很有说服力，对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邓振询也十分重视。苏南的群众工作，原来就有相当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群众发动不够充分、组织不够广泛的弱点。区党委在邓振询主持下作出了具体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调动了各界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①②邓振询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③邓振询给汪大铭的信，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④邓振询在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对江南工作的基本总结》，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为坚持敌后斗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于邓振询和其他党政军诸同志的积极努力，苏南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领导的地方各级武装。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苏南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发展到四千六百人，党员发展到八千人，有组织的群众大约十万人，还有五万不脱产的自卫队。人民群众拥护党，热爱子弟兵，全年收公粮五千担^①。

一九四〇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皖南部队北移，并电告苏南党政军领导同志准备接应。邓振询带区党委及二支队转入溧阳地区，监视国民党军队动向，筹集过境部队的粮草，策应皖南部队的顺利转移。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由皖南军部先期撤出的三批干部及非战斗人员和后勤物资，安全送过封锁线，转移到江北地区。

一九四一年初，邓振询和苏南的党政军民做好了迎接新四军军部的一切准备。可是，预定的时间过了，还不见军部的到来，区党委的同志十分焦急。邓振询和大家商量后，决定派苏惹惠、老方等去皖南，并布置广（德）郎（溪）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了解皖南军部的情况。消息很快传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邓振询非常气愤，立即布置各地党委做好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的接待、收留和安置工作，反复强调一定要把这些同志安全护送到苏北。他还亲自检查了太滬特委设在闸口的交通总站，与特委同志详细研究了护送的路线和方法，并询问了交通员的情

^①邓振询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

况^①。后来经过这条交通线安全转移去苏北的就有二百余名干部。

皖南事变后，日寇集中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对我丹北、茅山、江（宁）句（容）等地区，进行了持续六个月的反复“扫荡”，使苏南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仅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就有二十多人牺牲，苏南敌后斗争进入更加艰苦阶段。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邓振询坚定地指出：“目前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②他及时召集了区党委会议，对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确定了“仍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危机，争取利用顽伪，打击敌人，坚持巩固原有地区工作，开辟新地区，打通南北联系，充实主力，充实地方武装，巩固党，深入民众斗争”的方针^③。会后，他深入各地，亲自找干部、党员谈话，激励大家坚持苏南敌后斗争的信心。他说：“只要我们全党全国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利用敌顽日伪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打击主要敌人，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争取形势好转。”^④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他身先士卒，坚定勇敢，为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

在区党委与上级电台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为了及时得到上级指示，邓振询与罗忠毅联名写信，派人直接向在苏北的陈毅报告情况。不久，陈毅复信，对敌我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对

①②李坚真：《回忆邓仲铭》，载《新华日报》，1981年8月3日。

③邓振询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

④钟国楚等：《坚持苏南敌后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生命》，1981年8月3日《新华日报》。

苏南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区党委认真讨论了陈毅来信，对工作作了新的部署。接着，谭震林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统称东路）来到太滬。邓振询等听取了中央有关“皖南事变”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干部任命的传达，对今后的斗争任务更加明确了。

邓振询为首的苏皖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带领苏南党政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击，度过了难关，形势开始了好转。各地相继召开了参议会，成立了专员专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委派了专员、县长。苏南党的组织和武装也有了新的发展。从此，苏南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华中局根据江南情况，决定将苏皖区党委改为江南区党委，下辖南路、东路、路西南、路西北、路西、浙西北、苏皖等七个特委。谭震林为书记、邓振询为副书记，把江南各地党政军统一了起来^①。五月三十一日，邓振询随谭震林去东路六师师部，准备七月一日召开江南全区党的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江南区党委和江南行政委员会。后来，因日伪军开始向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原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日军小村师团的一个旅团、伪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三师和伪“清乡”警察总队第一大队共一万五千人，开始向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和第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驻地发起进攻。日伪首先采取闪电战术，从四面八方向该地区反复进行梳篦式的“清乡”。

为了粉碎日伪“清乡”，坚持江南阵地，谭震林、邓振询

^①邓振询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

立即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各级党必须密切配合，准备迎击敌伪之清乡”^①；于此同时，他们与新四军十八旅一起奋力作战，给日伪“清乡”军以迎头痛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原地已很难坚持，八月下旬，十八旅主力奉命北渡长江，邓振询随军进入苏中地区。

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间，刘少奇主持在阜宁单家巷举行了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讨论今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邓振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他介绍了苏南地区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的各阶段环境特点、工作任务与方针，回顾了各个时期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对政权、劳动，帮会问题及除奸、经济、伪军、文化、地方武装政策等逐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查，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找出差距，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苏南今后斗争的估计，受到了与会同志的欢迎。

四月，邓振询、江渭清在参加华中局扩大会议后，回到溧水十六旅旅部。接着，召开了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由于日伪“清乡”，江南区党委未能按期成立，苏常太等地又先后丢失，根据华中局指示，苏皖区党委继续领导江南各地党组织）。会议传达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 and 刘少奇等在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加强团结，坚持长期斗争”的口号，要求苏南全党进一步建设好苏南抗日根据地，巩固中心区，扩大游击区，开辟同情区，缩小敌占区。

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迎接新的斗争，区党委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召开了苏南民运工作扩大会议，邓振询在会上作了

^① 《谭、邓关于敌伪清乡工作的指示》，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组织群众与秋收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过去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经过，总结了苏南斗争发展规律，提出了今后苏南群众工作的任务及其具体措施。他反复强调了民运工作的意义，指出：“要认识我们长期处在敌后的严重斗争环境下，只有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才能支持敌后长期战争，才能保障一切任务的完成，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他还说：“要发动一个热烈的群众运动，是不容易的事，是一个艰苦的深入的工作，一切命令、包办代替，都是不对的，并且还要认识到群众运动一定要有革命政党正确的领导，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①这次会议和他的报告对于促进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会后不久，邓振询调华中局党校学习。年底，他离开苏南前往苏北。此时，华中局已随新四军军部搬迁，他只得又返回苏南，转任苏皖区党委副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邓振询在溧水县小蒋家的一所小学里，主持召开了苏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总结两年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工作，讨论与确定今后政府工作的任务。会议通过了由苏皖区党委提出的《苏南施政纲领》，选出江渭清、邓振询、王必成、吴仲超、魏天禄、李坚真、欧阳惠林、朱春宛、樊玉林、李建模、张之宜、诸葛慎、蒋铁茹等十八人为行政委员，成立了苏南行政公署，由江渭清任主任，邓振询任副主任。苏南行署管辖下的九个县、四十七个区、三百五十个乡，都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至此，苏南敌后抗日民主根

^①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根据地建设已趋巩固，两溧地区成为领导苏南敌后抗战的坚强的后方基地。

邓振询一贯强调各级领导要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他对苏南的同志们说：“我们是长期处在敌伪顽夹击的斗争形势下，如果政策不能正确掌握，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江南斗争就不能坚持。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必须加强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学习，精通党的政策，正确应用党的策略，把党的政策、中央及上级决定、指示江南化，群众化、具体化。”^①邓振询自己首先带头学习和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他身边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凡党中央的指示，他都仔细地记在上面，他还经常请秘书把中央文件及党报上的社论、文章抄录在笔记本上，一有空隙就拿出来学习。

为了使各级党政军干部能及时听到党中央声音，了解党的政策，邓振询十分重视报刊工作。尽管困难重重，苏南敌后各地仍然有《民众报》、《太湖日报》、《长溧报》、《前进报》、《火线报》、《江南党刊》、《江南通讯》、《青年团结》等十几种报刊坚持出版。

邓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把培养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培养青年干部，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前提来抓。当时的区党委及各地委、中心县委中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二十多岁。他从不因为这些人年轻而轻视他们，而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挑重担，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满腔热情地帮助

^①邓振询：《创刊的使命》，1942年10月12日《江南党刊》发刊词。

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

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四月中旬，国民党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陶广为总指挥，调动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我驻苏南溧水、溧阳的部队发起进攻。邓振询协同江渭清，领导苏南军民进行了自卫反击，在曹山、苇蓬山一线将敌击退。六月中旬，国民党顽军又向我发动第二次进攻。为保存有生力量，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全部撤出溧水地区。邓振询随四十六团转移到横山地区活动。八月三日，部队宿营于江宁县冯潭村，因遇敌情，当晚部队转移，邓振询在渡秦淮河时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邓振询牺牲的噩耗传开，苏南人民无不悲痛。几天后，江宁县军民在周岗圩绿杨头村举行追悼会，各界群众不顾严重敌情，纷纷前往吊唁直到深夜，有两幅挽联是这样写的：“六年余兹，痛异族奴役暴行，矢志抗战，统率江汉万民，坚持敌后，胜利在望丧国魂；廿载以来，为人类解放事业，决心奋斗，跋涉关山千重，献身军前，功绩已著称千城。”“昔奔革命，今奔革命，中国共产党，功绩伟大；生为大众，死为大众，苏南邓主任，精神不死。”^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苏皖区党委暨苏南行署在宜兴又一次隆重举行追悼邓振询烈士大会，江渭清代表苏皖区党委致悼词说：“邓副主任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之一，尽瘁中国革命，十有余年，领导苏南斗争时逾三载，而其对党与革命无限忠诚，生活刻苦、严肃，学习紧张、积极，沉着果断，海人不倦，实为中国人民及全体共产党员之模范。因此，邓副主任牺

^①原件存欧阳惠林处。

牲，不独为苏南党及苏南斗争之重大损失，而且为全党及中华民族之重大损失。”^①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选编第2集。
2. 曾山：《悼邓振询同志》，载《先锋》1943年第6期。
3. 江渭清：《在邓振询烈士追悼大会上代表苏皖区党委致的悼词》，抄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4. 欧阳惠林：《邓仲铭同志简历》，载《江苏革命史料选编》1981年6月印。
5. 《红色中华报》1932年2月10日，1932年2月17日，1934年2月1日，1936年3月13日。
6. 《苏区工人》第10期（1932年10月16日）、第14期（1932年12月20日）。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1934年2月3日）。
8. 李坚真：《回忆邓仲铭》，载1981年8月3日《新华日报》。
9. 钟国楚、朱辉、陈立平、欧阳惠林：《坚持苏南敌后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生命》，载1981年8月3日《新华日报》。
10. 汪大铭：《茅山六年》，载《群众》1982年第11—16期。
11. 汪大铭：《新四军茅山地区抗日斗争日记选载》，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2. 陈立平：《开辟江南太湖抗日根据地的回忆》，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3. 邓振询：在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对江南工作的基本总结》，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①江渭清：《在邓振询烈士追悼大会上代表苏皖区党委致的悼词》。

14. 邓振询：《在苏南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15. 邓振询：《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16. 《邓振询给汪大铭的信》，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17. 谭（震林）邓（振询）：《关于敌伪清乡工作的指示》，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18. 邓振询给陆纲、王一凡的信，原件存王一凡处。
19. 邓振询：《创刊的使命》，载《江南党刊》，1942年9月10日。
20. 陈毅复忠毅、振询并致海涛、林俊（谭震林）的信，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21. 邓振询烈士墓碑文。
22.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江西省工会、兴国县工会有关资料。
23. 李坚真、江渭清、李步新、陈光、欧阳惠林、朱辉、李广、陈立平、李钊、王一凡、徐行、诸葛慎、朱春宛、李代胜、朱之升、贝纹、蒋克、吴成、李中、巢玉祥、邓振谟、庞家义等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罗世文

郭久麟

(一)

碧绿清澈的威远河，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为釜溪河。釜溪河畔的观音滩，两岸平畴沃野，竹林荫翳，垂柳拂舒。在观音滩靠威远县一边的罗家大院里，罗世文于一九〇四年八月二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了。

罗世文家族是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的。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盐业资本家。父亲罗万隆长期经营盐运，在重庆娶了二房，生下罗世文。罗世文三岁时，祖父在经营盐业的竞争中失败，不得不将全部企业家财破产偿债，父亲也因此被抓入巴县狱中作人质，瘐死在狱中。罗世文的母亲遭此横祸，几乎痛不欲生，但看到三岁的幼儿可怜又可爱，才不得不咬紧牙关，决心顽强地生存下来，把罗世文抚养成人。

由于父亲早亡，母亲又是妾，因此，罗世文在这百口同居的封建家庭里，受到一些族人的歧视和冷遇，这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屈辱和不平。每当他们母子受到别人欺辱之后，母亲总是把儿子抱在怀里，辛酸地说：“自元^①啊，你要记住我们孤

^①自元，罗世文的乳名。

儿寡母受到的欺辱！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要为妈妈出口气，不要使后世的子女象妈妈这样受苦！”年幼的罗世文牢牢记着孤儿寡母的凄苦和不幸，牢牢记着妈妈饱含血泪的嘱咐，从小就刻苦学习，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喜爱。

一九二〇年秋，罗世文在老师的推举和亲友们的资助下，到重庆读书。他在重庆青年会的教会学校补习一年英语之后，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了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罗世文考入商业学校之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进步书刊，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书刊使他逐渐明白了：要改变象母亲那样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必须投入革命的洪流，同全国人民一起，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翻地主军阀的反动统治，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才行！因此，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罗世文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者吴玉章、杨闇公以及恽代英、肖楚女等。在这些同志指导帮助下，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斗争中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一九二三年，罗世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团重庆地委的宣传部长、学委书记等职务。一九二四年任团重庆地委书记^①。

(二)

罗世文任团重庆地委书记以后，积极协同肖楚女、杨闇公

^①程子健：《回忆罗世文同志》及访问罗世良记录。

等同志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平民学社、学行厉进会以及社科研究会等组织，吸收了上百名男女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数成为党在四川地区的骨干。罗世文还协同肖楚女、杨闇公建立了重庆巴师、联中、巴中、商中等校团的基层组织，为重庆共产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罗世文协助肖楚女、杨闇公领导了重庆地区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渗透和思想麻醉。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侵蚀，罗世文在肖楚女、杨闇公指导下，发起组织了重庆“非基督教同盟会”，大量印发标语、传单，发表演说，把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二五年复活节，罗世文等还专门出了“反基特刊”，以大量事实揭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他还带领进步学生到教会学校华英中学及广益和求精中学进行宣传，教育和团结广大师生不信教，不受骗，不上当，使重庆青年学生，特别是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觉悟得到了提高。华英中学有三班人退学，教会学校招生时，应者寥寥无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发生了日本商船私运伪币、而拒绝检查，并将牒查之士兵掀下大江，造成严重伤亡的“德阳丸案”。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重庆反动政府妥协投降的态度，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愤怒。团重庆地委决定以这个案子为例，激发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肖楚女率先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杨闇公积极进行上层工作，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主席身分到重庆各学校进行演说和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市学生行动起来，同

全市人民一道，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十一月二十七日，召开了各团体代表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群众代表一起，前往日本领事馆，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严正指出，这次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按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十二月十三日，重庆各界人士七千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阻拦，集会于打枪坝广场，召开了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德阳丸案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强烈呼声。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罗世文率领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许多市民和学生受到感染，自动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到达省署及两署督办时，杨闇公、罗世文等作为群众代表前往请愿。但省长邓锡侯慑于群众威力，不敢接见，只派人接谈。一位官员为群众的爱国热情和代表们的堂堂正气感动，感慨地说：“德阳丸案有今日举动，足见中国民心未死。”并表示立即转达全市人民要求，促使邓省长等尽快拿出解决办法^①。

这次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受到打击，使官府的卖国行径及腐败无能暴露在群众面前。

一九二五年初，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响应孙中山和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领导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

^①1924年11—12月《国民公报》。

运动。肖楚女负责著文进行宣传，杨闇公负责作国民党元老的工作；罗世文发动团员到各校进行宣传，组织青年学生去联络各群众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经过几天的工作，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一月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杨闇公、肖楚女、罗世文等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把广大群众争取到革命一边，使国民党右派操纵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企图落空。在此基础上，杨闇公、罗世文等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内部进一步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间派，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终于选出了以我党力量为主体的赴京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一月二十七日，在打枪坝召开了有一百二十个团体、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赴京代表欢送大会，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和群众团结的威力。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正当全国国民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友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不幸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十分悲痛。肖楚女、杨闇公、罗世文等人领导全体党团员及群众团体，在重庆商业场总商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肖楚女、杨闇公等领导，罗世文负责具体工作。在筹备期间，罗世文深入各校热情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思想。他还组织了几个讲演队在各群众场合进行讲演，印发七十余种传单，遍贴城乡。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四月七日，在打枪坝召开了八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①见《杨闇公日记》及程子健：《回忆罗世文同志》、《杨闇公同志战斗的一生》。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团重庆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罗世文等以“重庆劳工互帮社”名义向全市发出‘通告’，并于六日上午出面召集各群众团体代表开会，讨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问题。六月七日上午，重庆各界八十四个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四百多人，在巴县图书馆召开了反对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罗世文被推选为文书部副主任。当天下午，在首次主任会议上，罗世文代表后援会草拟出向政府提出的重要条件及最低要求，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会议一致通过。

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上街演说，商人抵制英日货物。驻渝英日领事十分恐慌，威逼重庆地方官员压制群众爱国运动，宣布“厉禁”。罗世文作为代理主席，当即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取消戒严令，并商量团结社会各界，共同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他还起草了给北京执政府外交部及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以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条件作为斗争的目标。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各界群众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六月二十八日，在重庆的日本和英国工厂的华工一律罢工，并断绝了外国资本家的粮食供应，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势力。七月二日，英国士兵在南岸刺死、刺伤工人多名，罗世文积极组织山城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加强革命舆论和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一九二五年五月

由平民学社出面办了《燻光》周刊，肖楚女担任主编，罗世文负责发行。五卅惨案发生后，肖楚女和罗世文以这个刊物为阵地，谴责帝国主义暴行，反映各地人民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精神，指导重庆外交后援会的工作。这一刊物受到了革命人民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恨。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在镇压重庆人民爱国运动的同时，勒令查封了《燻光》杂志，并要肖楚女与罗世文限期离境^①。罗世文愤然写下了三首诗：

勒令淫威下，
燻光得永生。
燎原燃野火，
草木自春荣。

苛政猛于虎，
先行誓必争。
急风知劲草，
抱璞守忠贞。

落帽秋风易，
牺牲革命常。
前茅如海塔，
后启允鹰扬。

这三首诗，表达了他对反动军阀无理迫害的轻蔑与仇视，抒

^①1925年6—7月《国民公报》及重庆博物馆藏现代史资料。

发了他置生死于度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情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革命人才，党决定派罗世文到苏联留学深造，并在他出国前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一九二五年九月，罗世文由重庆乘船先抵上海，在团中央机关向恽代英等同志汇报工作后，就同中国共产党派到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和国民党派到孙逸仙大学学习的六百多名留学生一起，乘海轮赴苏。在船上，他远眺无边无际的大海，仰望搏击长空的海燕，想起离开重庆时杨闇公的亲切嘱咐和离开上海时恽代英的殷切祝愿，心里充满了展翅奋飞的豪情！

船过日本时，日本警察上船，要他们脱去衣服，进行“防疫检查”，说是怕这些“东亚病夫”给日本带去病菌！面对这种人身侮辱，罗世文和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他气愤地对同志们说：“一个小日本，竟敢如此欺辱我们，都是因为那些掌权者腐败无能，甘当狗奴才！我们要记住这笔帐！不推翻卖国政府，不赶走帝国主义，不铲除封建军阀，国家就永远不能富强，人民的幸福就没有保障，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受侮辱，受压迫的命运！”

船抵达海参崴，罗世文等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热情接待。从海参崴起，又坐了十多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罗世文同蔡畅等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在东方大学里，罗世文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经验，各科成绩都很好。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热心帮助同学，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

的工人同志，主动给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东方大学给学员配备有翻译，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罗世文刻苦地学习俄语，很快掌握了俄语。由于他英语和俄语都学得不错，所以领导上让他一面读书，一面在学校当翻译。他的学习和工作，受到教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扬。

罗世文身在赤都，心怀故国，念念不忘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人民。他经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了解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一九二七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三一”惨案，罗世文的老师和挚友杨闇公在惨案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罗世文从亲友来信中得悉噩耗，不禁悲愤填膺。在沉痛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涂山诀别几经秋，
故国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无双羽翼，
归来聚首斩顽酋。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学生一起，组织了示威游行。

一九二八年五月，罗世文与留学生一起，参加了东方大学组织的在贝克瓦地区的军事野营训练。他们穿着军装，背着步枪，进行军事操练和实弹射击，并学习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从当好一个士兵训练到能指挥一个团。

一九二八年七月，罗世文以优异成绩在东方大学毕业后，学校又送他到苏联黑海边、风景优美的克里米亚休养了一个短

时期。八月，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知罗世文回国^①。途中，他在德法等国作考察，于同年十月返回上海。回国时，他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带了一箱马列主义的书籍。他明明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厉害，预料一进入中国境内便要受到严格搜查，而且只要查到了赤色书籍，就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把那一箱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带回来了。回国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并表示想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但因当时四川革命运动很需要人，党中央决定派他回川参加革命斗争。他服从党的命令，毅然放弃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返回四川。

(四)

一九二八年底，罗世文回到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不久，省委派他到四川地方军队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进行兵运工作。这个旅经过我地下党长期工作，基础很好，第一团团长、代理旅长旷继勋不但早已入了党，而且工作积极主动；其它两个团也逐步为我党掌握。罗世文来到第七混成旅所在之广安县，化名罗泽模，以旷继勋私人朋友身分，住在旅部，辅导旷继勋学习革命理论，并对部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秘密发展组织。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活动，罗世文回重庆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旷继勋旅的赤化逐渐被反动军阀察觉，几个反动军阀都企图伺机吞并。因此旷继勋连续三次电告省委，要求立即举行暴动。头两次，省委认为条件不成熟，没

^①访问张普畴、李元杰、朗明钦等的记录。

有同意。接第三次电报后，省委又作了研究。罗世文认为，七旅赤化既已被敌人觉察，如不暴动，很可能被敌人瓦解，与其在准备暴动期间被敌人吃掉，不如干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省委同意旷继勋旅暴动，并派邹进贤、罗世文前往领导。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罗世文赶到第七混成旅所在地——射洪县射洪嘴。这时该旅党团组织暴露，上面扣发了军饷军粮，而且附近军阀正要对他们下手，一些军官对起义发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罗世文召集了旅委扩大会，宣布了省委关于发动旷旅暴动的计划，以及暴动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坚定了党员干部的信心。罗世文与邹进贤还举办了临时训练班，向中下级军官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暴动的指示，宣讲了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党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与此同时，罗世文同旷继勋研究了有关起义的军事计划及组织领导等问题。

随即，第七混成旅移住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告暴动，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旷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三个团改为三个师，分别由我党同志负责各级政治工作。

当天晚上，罗世文、旷继勋连夜率领部队到达蓬溪。次日拂晓，红一路军干脆利落地缴了军阀李家钰一个团的枪，天亮时分占领了县城。罗世文带领指战员在县城张贴红军布告和传单，搜出县征收局全部粮册、债卷及租税册子，在大街上当众烧毁，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宣告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的革命举动使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在经过南部县流马场时，根据当地党组织及农民协会的要求，召开公判大会，公审了鱼肉百姓、包揽词讼的伪团防局长、恶霸地主范朝忠及其师爷帅仕光。在南部县新政坝，部队召集了群众大会，把闻讯逃跑的该镇首富、伪团总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居民，受到群众欢迎。

罗世文、旷继勋率领部队转战营山、渠县，渡过渠河，由达县南岳场进入梁山虎城镇，向猫儿寨前进。猫儿寨是大地主石文交的要寨，地形险要，储粮丰富，由于部队经过十余天连续行军作战，粮食弹药匮乏，罗世文、旷继勋便与梁山县地下党组织商量，决定攻打猫儿寨，以便进行休整和补充。谁知，给红军带路的同志引错了路，部队天明才赶到寨前，原来约好打开寨门的地下党同志又未能搞到钥匙。巧取不成，红军只好发动强攻。但敌人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红军两次仰攻，均未奏效。这时，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頌尧等派出的部队已前后逼近红军；长江一线也为刘湘派兵布防，部队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东进，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在川东的游击队靠拢，但部队在经过开江马鞍山夹巢时，被刘存厚的部队包围击溃，起义失败。蓬溪暴动期间，罗世文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严格要求干部、战士牢记红军为人民求解放的宗旨，坚决打击敌人，时刻保护人民利益。由于他的努力，起义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到处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在四川现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①。

^①参进程子健、邓止戈、梅子乾、王一苇等的回忆材料和永向前、温贤美：《旷继勋同志传略》。

部队分散突围后，罗世文孤身一人，白天藏匿在乡村、山林中，饿了向农民要点南瓜汤充饥，渴了捧一口山泉水解渴，夜晚赶路。不久，他就被饥饿和劳累折磨得身体消瘦，面色憔悴，还得了痢疾和疥疮。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经过数十日的艰苦跋涉，罗世文终于回到重庆，找到了省委机关，向党组织汇报了蓬溪暴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他伤病痊愈后，继续留在省委工作。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陈攸生、秘书邹进贤以及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屠杀面前，罗世文不动摇，不悲观，不气馁，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信心。不久，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组成，由程子建任省委书记，罗世文任宣传部长，领导全省人民继续战斗！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派专人到四川，要求四川临时省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全国总暴动。罗世文作为临时省委领导人之一，虽然对四川暴动没有把握，对这种盲目暴动的搞法有所怀疑，但还是执行了中央指示，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威（荣县、威远），广汉及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尽管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奋勇战斗，但由于对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因而均遭失败。惨痛的事实教育了临时省委领导和罗世文。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经过整顿，检查了执行立三盲动主义错误的教训。

一九三一年初，省委鉴于重庆白色恐怖特别严重，接受罗世文等同志建议，决定迁往成都。六月，中央决定罗世文任省

委书记，程子建改任军委书记。这个时期，由于各地暴动陆续失败，各地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上与中央的联系不时中断，工作极为困难。罗世文虽得了严重吐血病，但仍以顽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他在很久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还千方百计找到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从中摘录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文章给省委和各地领导同志传看，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经常鼓励省委和各地到省委联系工作的同志说：“我们暂时与中央失掉了关系，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象失了舵的孤舟，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工作，继续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罗世文和省委同志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局势，决定领导成都和全省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事变发生后不久，罗世文就要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草拟了宣传提纲，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东北，国家民族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必须走武装抗日的道路！”他把宣传提纲印发全省各地，制造抗日的舆论。紧接着，省委又在少城公园召开了有各学校、工厂和街道代表参加的大会。登台演说的代表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政策，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①。

这期间，罗世文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上。一九三二年，在他的主持下，省委领导了川东游击军的战斗，领导了南部升钟寺地区和梁山南

^①程子健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苏雁秋的谈话记录。

岳场的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的兵变。一九三三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罗世文和省委指示游击军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年底，川东游击军在宣汉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改建为三十三军，由游击军纵队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升钟寺起义的一部分农民武装，后来去到通江，加入红四方面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与此同时，罗世文和省委还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不少党团干部及军事、医务和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前往苏区，支援了苏区的建设。

（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罗世文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廖承志一起前往川陕苏维埃。他们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穿过四川军阀的封锁线，到达通江，受到苏区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罗世文应邀发表演说，介绍四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分析四川军阀的实力，指出田頌尧虽然被打垮了，但比田頌尧实力更强大的其他四川军阀，正策划纠集其所有力量进攻苏区，鼓励苏区军民提高警惕，加强训练，准备应战。在这期间，罗世文担任了川陕苏区省委委员、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省委高级训练班里，罗世文给省委高级干部讲授了“列宁主义初步”。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修养，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全面地、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罗世文明确指出：“农民在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是一支生力军。”“列宁主张工农联合，主张无产阶级利用国内农民暴动来达到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罗世文还联系中国革命实践，高瞻远瞩地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领导、说服农民，经

过合作化、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在论述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时候，罗世文在扼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种族、民族、国家的基本观点后，着重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光辉思想。他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毫不犹豫地拥护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运动中应努力夺取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权，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努力将这场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经过民族革命的锻炼，才能成为领导群众的前卫党，才不至于成为空谈社会主义的小团体！”^①罗世文深刻而生动的讲演，开拓了川陕苏区高级干部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许多同志都称赞他是学识渊博、理论精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罗世文和廖承志抱着极大热情来到川陕苏区，希望能为川陕苏区的革命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张国焘轻视党的集体领导，尽力在党组织、红军及政府中培植个人系统，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把川陕苏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而以太上皇自居，谁不听他的话就视为异己，给以排斥打击，甚至监禁杀害。为了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罗世文与廖承志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但是，张国焘不仅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怀恨在心，对罗世文与廖承志予以歧视、排斥和打击。罗世文认为自己是光明磊落的，真理在自己这边，尽管

^①见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

一时受到冤屈和打击，但是历史终究会证明自己的耿耿忠心！他写下了《过通江城》的诗篇，表达了自己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①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验忠贞。

一九三四年底，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罗世文、廖承志非法逮捕。张国焘在亲自“审讯”他俩之后，又派人把他俩监视起来，要他们起草文件，刻蜡版，做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耳闻目睹了张国焘非法严刑拷打和残杀抵制其错误领导的干部以及四川省委派到川陕苏区工作的党团员的罪行，受尽了难言的痛苦和折磨！他心中刻下了张国焘所犯罪行，他坚信党和人民一定会为这些含冤死去的同志昭雪！

一九三五年四月开始，罗世文与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监视着，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无穷的苦难，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共产国际的关怀、干预下，罗世文与廖承志才没有被张国焘杀害。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罗世文、廖承志获得了完全的自由。罗世文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教授，给

^①肺石，古代设在朝廷门外的赤色石头，老百姓可站在上面控告地方官吏。此处借用。全句谓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必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赤心。

红军高级指战员讲授革命理论。一九三七年三、四月份，党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罗世文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和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并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判。

(六)

西安事变后，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出于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借用我党和抗日力量，与蒋介石的排挤和并吞地方势力的政策相对抗，曾派出代表与我党联系。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亲切地接见了罗世文。毛泽东在分析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后，告诉罗世文，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回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实力派人物联系、谈判，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作好刘湘的工作，因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卡住了夔门，对全国的抗日运动将是很大的贡献^①！

一九三七年八月，罗世文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由延安经西安到成都，会见了刘湘、邓锡侯等。罗世文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

^①王众音谈话记录。

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并抵制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刘湘等对罗世文的谈话很感兴趣,邀请罗世文作他们的参谋,经常给他们分析情况,出谋划策。

罗世文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下,还通过联系和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进一步在刘湘的中上层骨干及幕僚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联系和领导郭秉彝在刘湘的中下级军官中作发展进步势力的工作。

由于罗世文善于分析形势,利用矛盾,宣传真理,促使刘湘在抗战初期倾向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了一些抵制;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有利于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还指导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成都各抗日救亡组织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团结和协调起来。他还指导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两个革命抗日群众组织的合并,并以这个力量为基础,更广泛地开展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秋,罗世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后,又乘船返回重庆。在轮船上,罗世文遥望故乡巴山蜀水,面对滚滚大江,吟颂起气壮山河的《别汉入蜀》的诗篇: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难蚕丛寓意浓。
劫后余生仇禹贡①。

①禹贡,此处指国民党的苛捐杂税。

瞻前乐死反尧封^①。
闾公^②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一九三七年冬，党中央派周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四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共同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由周凤平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八月后由罗世文任书记。省工委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领导了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四川已建立成都、重庆市委及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也发展到四千人左右。就在这次省工委会议上，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以罗世文为书记，周凤平为副书记，川东特委以廖志高为书记。在川康特委工作时间，罗世文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联系和领导苏动农、王大飞、陈伯林、甘道生（林蒙）、康乃尔等，分别对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湘进行统战工作。他还直接领导周国干、刘文哲、刘连波进行联系和指导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罗世文还经常给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三位知名教授作工作，参加成都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推动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①尧封，指地方军阀你争我夺在政治上对人民的压迫。

②闾公，指杨闾公烈士。

罗世文对青年工作也十分重视。他经常出席川康特委的学委会议，给学委的干部讲马列主义理论，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还指导了四川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工作^①。

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领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成都、重庆和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

(七)

一九三九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将暴露了的同志进行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还交流和对调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烈火，打

^①韩天石、郑伯克、张文澄、康乃尔等的谈话记录。

击四川地方实力派，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抢米事件”。那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我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平时对罗世文十分敬佩，他悄悄告诉罗世文，要他赶紧躲一下。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罗世文爱人王一苇也劝他快回延安。但他仍以党的工作为重，不愿离开战斗岗位^①。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特委领导同志应予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两天以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

^①王一苇的回忆。

移。”

蒋介石亲自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周围。三月十八日，罗世文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处理有关事务。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此时，特务们已经冲到罗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们告别，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了《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八）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使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我四川党的机密，以便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案”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战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我党，为他

们消灭我党和抗日加量，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盘。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一九二七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特务们采用轮流审讯，威胁利诱等办法，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均遭到罗世文、车耀先的严辞拒绝。罗世文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不禁想起一九三八年夏在重庆写的《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
念年冰蘖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他实现这个誓言的时候了！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地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荣，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爱斋”，以后又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

‘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

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了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变节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了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搞一些行政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秘密进行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分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作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分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作工作！”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

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

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

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作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对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当一位青年难友在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劳役中感到消沉和绝望的时候，罗世文亲切地鼓励他说：“你是时代的牺牲品，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罗世文还让那个青年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使那个青年逐渐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另一位青年难友政治上还不大成熟，罗世文就亲切地指导

他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书，并鼓励他坚强地生活和斗争。好几位侥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时，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俩敬酒。罗世文凛然说道：“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息烽监狱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五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途经桐梓时，因桥梁坏了，汽车就停在一座没有使用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宣布释放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把这封信悄悄交给已宣布释放的外籍修养人小马。小马把信

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周恩来。罗世文把信交给小马后，曾对韩子栋讲：“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①。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捭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生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
高扬我们的旗帜！

^①韩子栋、李任夫、施文祺等的谈话记录。

老宋^①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②。

这封短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它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表达了人民的忠实儿子对战友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第二天，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各牢房的难友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难友们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

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面对苍翠的松林，罗世文眼前闪电般地掠过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心飞向延安，飞向党中央，飞向毛泽东、周恩来的身边，唇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是的，祖国的山河是如此壮丽，亿万人民在严冬的苦寒中盼望着温暖的阳春，尽管独夫民贼蒋介石气势汹汹的高喊着“统一”的滥调，却做着统治全国的迷梦。但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的努力奋斗，最后胜利一定是人民的！笑得最后，笑得最美丽的，决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于是，他放声朗诵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

①老宋，即宋绮云。

②原件存“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

群情尽望春。

“英雄”^①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这一字千钧的诗篇，震慑了杀人魔窟。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又在他们的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毁尸灭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人民群众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遗骨，进行了隆重安葬。

周恩来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了墓碑！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军事博物馆，四川省档案馆、博物馆，重庆博物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和川陕根据地展览馆等单位的有关档案材料，访问了杨尚昆、廖承志、赵毅敏、刘鼎、童小鹏、韩天石、郑伯克、任白戈、张秀熟、魏传统、王众音、罗青、张文澄、苏幼农、郝谦、王叙伍、陈翰屏、杨绍轩、梅子乾、朗明钦、李任夫、施文淇、苏雁秋、罗世良等同志，并参阅了《杨闇公日记》、廖承志同志回忆录、程子健同志遗著及《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史大事记》等。

^① “英雄”，此处系反语，指蒋介石。

王 观 澜

朱 杰 高 军

(一)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王秀卿，以刻字为生，有时兼营中医。母亲徐阿英，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妇女，除操劳家务外，还要替人缝纫、洗涤，或作“箬鞋”^①出卖，和丈夫共同维持一家的清贫生活。一九一三年前后，王秀卿一次出外遇劫，因负债坐牢。七岁的小观澜被送到外祖母家放牛，并学着在田间做些简单的农活。一年之后，他被母亲召回，在附近一家茶馆前摆了个卖花生、炒豆的小摊，挣钱以补家用。就在这家境日艰之时，来了一个“牛大王”，见观澜聪明、乖巧，要买去做“儿子”，并说这样王家可以得一笔钱，以赎回观澜的父亲。年幼的观澜抱着母亲哭诉：“不要卖我，我会赚钱把爸爸赎回来……”。徐阿英不忍心卖掉自己的儿子，但为了赎回丈夫，只好把唯一的一间房子卖掉了。王秀卿出狱后，家庭又有了点微薄收入，在观澜九岁时，将他送进附近一家私塾启蒙。在私塾，王观澜埋头苦读，很得先生的喜爱。十四岁

^①箬鞋是一种用毛竹外皮（竹箬）编制的简易雨鞋。

时，转入免费的北山小学。十六岁那年，又以“品学兼优”保送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简称“六师”）预科学习。六师的徐卧樵先生对他很器重，经常给他以资助，并为他改名王观澜。一九二三年，王观澜从六师预科（相当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不收学费并有少量助学金的第六师范。他知道家境贫寒，从来不轻易向父母要一元钱，经常利用夜间和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挣钱，以交纳学校的饭费^①。王观澜学习勤奋刻苦，为人正直，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信任和爱戴。六师校友会选举时，大家推选他掌管经费。

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浙江临海引起震动。王观澜被“惊醒了”，立即投入到斗争中去。他和进步同学涌向临江码头，向熙熙攘攘的旅客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把搜查出来的日货堆到城里的“道司广场”焚烧。冲天的浓烟烈火，鼓舞着这个小县城的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这年暑假，王观澜在“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下，在东城小学创办了平民夜校，为城郊的贫苦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补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官僚军阀的统治。稍后，他还在城里的紫阳宫、关帝庙等处，办过几期这样的夜校，为当地后来建立工会、农协，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王观澜在六师团结进步同学，为组织学生会积极活动。不久，六师学生会成立，他被选为主席。这期间，临海在上海读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乙丑读书社成员，回乡宣传革命思想，其

^①王观澜：《关于临海建党和如何写好地方党史的谈话》（1981年6月29日）。

中有一位叫陈学西的上海交大学生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王观澜的邻居。王观澜从他那里读到《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年冬天，经陈学西介绍，王观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六年，六师改为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师范部（简称六中师范部），一些受鲁迅思想影响的进步教师来到学校任教。王观澜和这些进步教师一起创办了校刊《绿丝》，还出壁报，搞讲演，公开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社会上各种黑暗势力。此时，王观澜不仅担任了共青团六中师范部的支部书记，还是临海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这年冬天，王观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了师范部学生党支部书记。这期间，他除了组织和领导台州地区的学生运动外，还参加组织和领导了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斗争，并注意对一支民众武装——“独立营”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驻宁波的一个团便调往临海，强行改编了“独立营”。临海的形势急转直下。王观澜根据党组织决定，立即和同志们转入地下斗争。五月初的一天深夜，军警突然包围学校，闯入学生宿舍抓人。两名陌生的军警盘问王观澜，要查验身份证明。王观澜机警地蒙过军警，脱离了险境。但此后不久，他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党，王观澜跑到上海。接上关系后，党组织分配他到中共沪东区委搞工人运动。

（二）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中央选派王观澜等二十多名同志去苏

联学习，由肖劲光带队。他们秘密分头搭乘俄罗斯远洋货轮离开上海，在海参崴稍作停留，又改乘火车抵达莫斯科。王观澜被分配到东方大学军事第七班学习。按规定，每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王观澜取的名字叫 *HukacuH*（涅卡生）。

军事班是一年制速成班，主要课程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战术战策、简易工程兵学等，冬天主要在课堂学理论，夏天（五月至八月）进行野营实习。王观澜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在这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由于没有现成的中文教科书，也没有翻译好的学习资料，学员们都靠一边听课（有人翻译）一边记笔记。王观澜不仅力争每堂课当堂听懂，而且课后总要认真地和同学核对笔记，一天下来还要小结一下学了些什么内容。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机械，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没有充分利用。王观澜对同班同学鲁也参说：“我们每天晚饭后将近四小时都白白浪费了，应该建议学校让我们回教室自习两个小时再回宿舍。”这个意见马上得到鲁也参和不少同学的支持。经过再三交涉，学校单独批准第七班教室的灯光可延长到晚八点半钟。同学们感谢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军事班学习期限短，没有规定学习俄文的任务。王观澜说：“我们来苏联学习，不学点俄语，心安理得当大半个聋子，不合情理。我看完全可以利用自习的时间学俄语。向领导反映后，学校替他们找来一个自学俄语的指导员。同学们自学热情高，进步快，都说王观澜又作了一件好事。

为了把星期天的时间也利用起来，王观澜和同学们商议组织一个自愿参加的自学学习小组，学习怎样用化学药水通信等

从事秘密工作的知识。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专门派了一位化学老师作指导。从此，王观澜和第七班的三十多个同学，每星期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又自动开设了新的课程。

一九二九年初，王观澜根据组织决定，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学习，担任特别二班班长，和列宁主义教员（苏联人）、学习班长一起，组成领导班级的“三人团”。

王观澜进入中大学习时间不长，便发现这里的教学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他和许多学员一样，迫切希望学校加强对于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它重要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但这些合理要求，却不为王明等人把持的中大学生党支部所重视。他和许多学员对王明的意见越来越大。他们认为，王明、博古等人大都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到苏联，没有经过白色恐怖下残酷斗争的考验，虽然会说外国话，对本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却不了解，因此，不能反映广大学员的正确要求和呼声。可是，王明等人由于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中大校长米夫的直接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专横拔扈。在这种情况下，王观澜和学员们强烈要求任期早已超过的支部局立即改选。

一九二九年夏，中大领导人想用开大会总结工作的方法，肯定学校和学生支部局工作，结果引起了全校规模的大辩论。会议一直开了十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二十九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王观澜站在反对王明为首的中大学生支部局一边。大会一开始他就对支部局垄断会议的行为不满。投票时他们特别二班除了翻译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学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选

中大学生支部局^①。

不久，苏联进行“肃托”清党。这是联共（布）历史上同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一次重大斗争。可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却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大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许多曾经反对过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同志，被戴上“托派”、“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横遭打击。有的被开除了党籍、团籍，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蹲集中营，“从轻处分”的也受到警告、劝告。王观澜身为班长，他的班除一人外，又一致反支部局，当然罪在不赦。但是，因为他家庭出身好，在当时盛行唯成分论的情况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尽管如此，“参加小组织活动，反对支部局”的结论，还是写进了他的档案材料之中。

王观澜虽然受到处分，但也长了见识。他后来回忆说：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与教条主义者王明、博古等的斗争”^②。他还说，在中大的“肃托”扩大化中，自己亲眼看见那种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从反面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清党后中大停办，学员星散，互相间很少知道去向。王观澜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学习。

不久，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出选派一部分学员学医。周恩来亲自决定了学医人员的名单，王观澜是其中之一。因此，王观澜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马上又到莫斯科的红军医院学习。四个月后，他又被派去学习印

^①王观澜：《关于莫斯科中大王明教条宗派问题》（1981年8月17日）。

^②王观澜：《我的经历回忆记要》（1956年）。

刷技术。

国内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王观澜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经组织批准，他结束了在莫斯科三年多的学习和斗争生活，秘密回国。和他一道回国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他们先到达靠近我国东北边境的一个小车站，又坐马车到达边界，然后在冰天雪地里步行。通过国境线时，三个人的手足和脸都冻肿了，一名同志被冻得昏死过去，幸被苏联边防军抢救，才得以继续前进。越过国境后，在地下交通护送下，他们从佳木斯到哈尔滨，经大连，乘海船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三）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观澜带领另外两名同志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先来到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中共中央根据闽粤赣特委的要求，将派往江西苏区的同志，暂留闽西工作，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郭滴人已离职到龙岩工作），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长。他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乡到虎岗搞调查研究。

虎岗，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的中心。它四周山峦环绕，在方圆数十里的平坝里，散落着几个自然村。闽西政府和特委机关所在的西虎岗，约有三百户农家，算是其中的一个大村落。王观澜几乎每天都到附近这些村庄里去了解情况。他发

现，这里的土地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往日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土地虽然被分掉了，但财产大部未动，威风并没打下去；有些村子的政权还被地富分子把持着。因此，一部分农民有顾虑，不敢起来斗争。他把这些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村的土地斗争。从此，他一边负责编辑《红旗报》和开展其他宣传工作，一边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财物，按人口平分土地，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经对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闽西苏区的军事斗争一直是十分紧张的。当蒋介石亲率三十万人马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时，为了加快培养军事干部，闽粤赣军区决定除“彭杨军事学校”外，再开办一个“参谋训练班”。王观澜兼任这个训练班的教育长，亲自给学员讲课，从如何识图、测定方位等游击战争的基础知识和战术讲起，由浅入深，还带领学员参加反“围剿”的实战锻炼，很受学员的欢迎。他工作起来十分严肃认真，讲每一堂课，批改每一本作业，都一丝不苟。谁作业马虎，往往就要被他叫去谈话，并补做作业。他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在操场上打球，到小溪里洗澡，他同大家不分高低，到处可以听到他爽朗的说笑声，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吃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①。

不久，发现敌人从三面进攻虎岗，接着又收到后方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紧急情报，形势很危急。特委决定由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火速赶往发动暴乱的上杭大洋坝、彩霞等地解

^①1982年11月10日陈茂辉谈话记录。

决问题，同时还让他押解三十余名“社会民主党犯人”到后方处理。他星夜带队出发，在当地群众援助下，很快控制了局势。为首的坏人闻风逃跑，被胁迫上山的群众和游击队员纷纷下了山。他进一步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深入发动群众，根据“主犯从重，附从者从轻；阶级敌人从重，劳动者从轻；顽抗者从严，坦白者从宽的政策”，揭露和打击了坏人，解放了被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改组了县游击大队，使根据地后方转危为安^①。事变处理完毕，部队驻扎在一座破庙里休整，这时他已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了。

当时，闽西的“肃反”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成批的好同志被打成“社会民主党”而遭到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一人在工作外，其余都被抓了起来。后来，他从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手中的一份“社党”名单上，看到他也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了。他感到，“肃反”中逼供信和扩大化邪风已经刮到了荒唐的地步。在这场错误运动面前，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对奉命押解到后方“处理”的三十余名“社党分子”个别谈话，了解真实情况，细致地作甄别工作。他认为，这中间绝大多数是党内的好同志，有些还是党的骨干。不久，其中一些“犯人”“逃跑”了，他命令部队不要追赶。大部分“犯人”在后来随部队北移时，又经过组织甄别，也被陆续释放了。

虎岗被敌人占领，闽西政府和特委迁住上杭的白沙。特委任命王观澜兼任（上）杭武（平）县委书记。他迅速将杭、武一带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和扩充，亲自担任县游击大队政委。这

^①王观澜：《我的经历回忆纪要》（1956年）。

时正值敌张贞部进犯白沙，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介绍敌人进攻的情况后，王观澜具体布置了反“围剿”计划。王观澜说，从敌情判断，敌人是非拿下白沙不可。那好，我们给他，我们暂时撤离白沙。等他分散兵力占领我旧县、才溪等地时，我们集中兵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路。接着，他提出了两个退却和集结的方案：一是由白沙退往旧县；二是由白沙经早坑、蛟洋的中村，退到连城的新泉。后来，部队按第二个方案退至新泉，第二天又退至南阳。在南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王观澜又分析了敌情，指出敌张贞部已进占白沙，钟绍葵部占领了旧县，一部到了才溪，我们不能再退了，要乘敌立足未稳、兵力分散之机，组织反攻，争取歼灭其中一股敌人，收复失地，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接着，整个杭武县的武装力量很快集中，党政工作人员也都武装起来。按照王观澜提出的战斗部署，首先集中三个连进攻才溪，敌钟绍葵部闻风而逃。王观澜分析，才溪敌人既逃，一山之隔的旧县之敌也必然逃跑。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直奔白沙，命令一连直冲杨逢年的指挥部，二连接近白沙的岭背村，三连直插梧田。战斗一打响，敌人很快遍山溃逃。根据军区统一部署，王观澜将追歼逃敌的任务交给了八团，他率队进入白沙，立即开展杭武一带的地方工作。

为配合红十二军解放长汀（汀州），向北扩展闽西苏区，王观澜奉命带队北移。特委任命他兼任（长）汀连（城）县委书记。在濯田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率领队伍消灭了一支气焰嚣张的“团匪”。随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特委机关迁到濯田。九月中旬，红十二军打下汀州。王观澜随部队进入汀州后，特委又任命他兼任汀州市委书记。

长汀解放，闽西苏区和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由周以粟写信，调王观澜去中央局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王观澜负责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它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还编辑其他宣传材料。王观澜和《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的三、四名工作人员，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常常到编辑部去了解情况，而且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和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万余人举行“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红色中华》创刊时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增加到一万多份。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窗户，常常彻夜映着小油灯的亮光。

王观澜在主编《红色中华》期间，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

^①因为《红色中华》编辑部兼有通讯社的职能，因此，也简称“红中社”。

情况。云集区九个乡，他都去过，他在区委里，也从来不作挂名委员。不但开会必到，而且总是积极发表意见。大家认为他的发言“政策理论水平高，又从实际出发，容易懂，听不厌^①”。区里许多工作，如选举、春耕生产、支援前线、组织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等，遇到困难找他，他都有求必应。他这种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和广大基层干部以至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赢得了大家的敬爱。有一天，他和一位乡苏主席通过一条田间小道到另一个村庄去，迎面走来一位挑担子的老俵。田埂太窄，无法相让。他一边和老俵打招呼，一边毫不犹豫走下田埂边的水田里，脚上的鞋没有脱，裤腿也没有挽。年轻的乡苏主席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鞋也不脱就下了水？他认真地回答：“你看他的担子多沉重，不能叫他等着，更不能叫他让。旧社会当官的出来要鸣锣开道，老百姓得规规矩矩让他们。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群众中间工作，不让他，不就变成官僚主义了嘛！”说完爽朗地笑了^②。这位年轻的乡苏主席深受教育，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四）

一九三二年夏，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所谓“肃托”斗争开始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人，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

①1982年10月16日朱开铨谈话记录。

②1982年10月9日瑞金部分老同志座谈会记录。

华》发表的一则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王观澜不服。云集区九个乡党支部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写信给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卫局，要求释放王观澜。几天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对他说：“你没有什么问题，走吧。”他恢复了自由，但是，却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销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送到云集区委审批。区委先后开了十多次会，拖了三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始终没有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后来又一直顶住了给他“重新入党”的种种安排。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据理力争和催促下，他的党籍才得到恢复。

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修改补充。出乎意外的是，连去四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了乡苏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谁也没来。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叶坪当时是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所在地。但是，这里农民群众为什么生产情绪低落？他找乡苏主席谈话，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糊糊糊。他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农

会，摇身一变都成“贫苦工农”了。真正的贫苦农民分的田少又坏，给逃亡的地主却还留着田，等等。情况越来越清楚，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这是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的主要原因。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越来越严重的排斥和打击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是，毛泽东很赞成王观澜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告诉王观澜，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

王观澜把铺盖从机关搬到村子里，一有空，他就到老百姓家去串门拉家常，群众有什么难处也愿意找他商量。经过王观澜的耐心启发，乡苏主席已不再顾虑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打击报复，带头串连勇敢正直的贫苦农民，组织起三十多人参加的贫农团。王观澜反复向大家讲解毛泽东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道理，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农村的阶级应当如何划分，怎样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问题越摆越明，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王观澜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一天夜晚，贫农团开会，他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某某户究竟应当划为地主，还是划为富农？毛泽东听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①王观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叶坪查田的试点工作推向深入，其基

^①王观澜：《叶坪乡的查田运动》，《星火燎原》选编之二。

本步骤是：贫农团组织起来后，成立“查田委员会”，经过发动群众查阶级、评议阶级，将群众提供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确定地主、富农的成分，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

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们兴修水利、大闹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年天旱，水田里的土地都干的裂口，乡里决定在距叶坪不远的陂坞村北挖河架“筒车”，车水抗旱。王观澜和群众一起挖土挑担，忙得汗流浹背。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他帮助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为克服农忙时耕牛缺乏的困难，又用没收来的耕牛作底子，成立了犁牛合作社。党的关怀激发了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扩红、借粮、退还公债票、做军鞋等工作都十分活跃；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展起来了。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曾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中央教育部帮他们解决桌子、凳子、灯油、书本等困难，还是没人来念书，现在不声不响地就有这么多人来念革命书了。可见，肃清封建势力是个根本问题。”^①

叶坪乡查田的胜利，对四周影响很大，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到他们那里帮助、指导。于是，叶坪的查田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决定派出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区、壬田区帮助开展查田工作。王观澜继续指导叶坪乡的工作，同时还是这些工作团的主要成员。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②，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由

^①转引自王观澜：《叶坪乡的查田运动》。

^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又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并予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政策标准^①。

五月底，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六月二日，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六月中、下旬，在叶坪，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雩都、宁都、胜利等八个县的查田运动大会，王观澜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查田运动便在中央苏区的闽赣、江西、福建三个省的三十八个县，约三百万人口的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东为查田运动领导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此后，王观澜曾参加江西省查田运动大会，去博生、胜利、雩都、会昌等县巡视工作，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了划分阶级成分中出现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土地斗争的胜利成果。

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参加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常为报刊写社论、评论和经验报道。其中，《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就是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和谢觉哉共同起草的^②。他们调查搜集了各种典型材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每项原则决定后都附有典型事例，形成了一个既有原则政策、又有具体事例的通俗易懂的指导土地斗争的重要文件。中央工农政府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一起颁布执行。由于这两个文件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

①王观澜：《叶坪乡的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王立诚、刘廷晓、俞家宝：《查田运动与王观澜同志》。

践相结合的原则，所以它们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而且直到四十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们党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王观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指出，虽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查田运动中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和抵制，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是以党的路线面目出现的，它的影响和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尽管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由于王明错误执行者的坚持，又得到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还是将它写上了党的正式文件，“左”的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强行贯彻。

一九三三年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沙洲坝开办了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财政系由邓子恢主讲，政法系由邓发主讲，群众工作系则由王观澜主讲。王观澜讲的主要内容有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党的群众工作等，当时的查田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易懂，听后知道怎么样工作，学员们都很感兴趣。”^①

（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一九三四年一月，王观澜党籍恢复不久，正式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

^①1982年8月7日汤振连谈话记录。

同年春夏，王观澜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在中央政府统一的生产计划指导下，他强调各地因地制宜，坚决反对那种不负责任地简单地对上级原则决定的重复，反对“大做不兑现的空洞计划”，“或者平均主义不切实的空喊”^①。当时，福建省土地部简单地提出“今年普遍增加二成生产”的口号，他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很明显，这一口号对于去年禾苗长得很好，因灾害而歉收，比前年反减少了收成的地方，如上杭的通贤等地，是不适当的。”公略县土地部提出“要全县消灭荒田”，长胜县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每家要种棉花三担田面”，他说道：“试想，公略全县共有二十八万多担荒田，我们今年具备了那些特殊条件，能把他完全消灭呢？中央所定他们今年要开荒九万担荒田，已经着实够他们认真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各方面设法来完成了。至于长胜县要每家种三担田面的棉花，更是荒谬不过的决定。我们就拿长胜县二万五千家来算吧，每家要种三担田面的棉花，那末，长胜县今年应该种七万五千担田面的棉花，试问，长胜县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准备了一些什么，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呢？况且长胜县过去又不是产棉的特区？这种不顾实际情况，只闭起眼睛开大口，除了浪费纸笔油墨，对于实际工作有什么帮助呢？”他严肃地指出，需要“根据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总的决定，按照当地实际情形，定出具体计划。特别是区乡村更是重要。一切不切实的只写在白纸上好看的废话，应该放在字纸篓里去！”^②

王观澜善于使用典型示范的方法去指导工作，瑞金的云

^{①②}王观澜：《具体实现春耕运动的战斗任务》，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10日。

集、武阳等区就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区的。在这年春耕运动中，他亲自为《红色中华》“武阳区筹备春耕”和“瑞金云集区春耕情报”栏写文章，连续介绍武阳区、云集区布置春耕、组织犁牛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大力推广他们的经验。尽管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苏区各县还都建立了由政府办的农业试验场，研究如何培育和推广良种，如何夺取丰收，还与各种不定时的短期训练班相结合，进行农业知识方面的培训和推广。

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展了水利，增加了肥料，开垦了荒田，植棉、种树，扩种杂粮，等等，在一九三三年丰收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夏季又夺得了丰收。王观澜总结经验时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在于许多干部的努力与坚强而活泼的领导，广大群众在革命竞赛中劳动热忱和阶级友爱精神空前的发扬。而劳动互助社的组织与发展，是解决劳动力的最好办法”。妇女们学会劳动技能和她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农业生产发展中也起了很大作用。^①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敌人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区征粮的范围越来越小，粮食供应日趋困难。

一九三四年五月下旬一天的下午，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陈谭秋急急忙忙来到了沙洲坝王观澜的住处。他俩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相识，后来就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这次他来是同王观澜商量征粮问题

^①王观澜：《春耕运动的总结与夏耕运动的任务》，《红色中华》第194、195期，1934年5月27日、28日。

的。两人先交换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讲到正题时，陈谭秋的话头却停住了。王观澜见他为难的神色，便问道：“谭秋同志，有什么事要我办，你就讲吧！”陈谭秋看王观澜诚恳的表情，这才爽快地说道：“观澜同志，现在敌军压境，红军没有粮食不行，我们的工作任务很大，困难很多。你是久做地方工作的人，有经验，我想请你帮助尽快完成征粮任务，你看行不行”？这一突然的邀请，使王观澜实在为难了：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他亲眼看到那些积极努力的地方领导同志，在扩红、征粮等突击工作中，仅仅因为完不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指标，便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还一直是“左”倾错误的打击对象。而且，自己同样还有繁重的工作任务，干部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立即答应。陈谭秋也不好勉强，只是说“那怎么办，回头再商量吧，能去最好啊。”送走陈谭秋，王观澜又反复琢磨陈谭秋“回头再商量”的话。根据陈谭秋对工作严肃认真、一抓到底的作风，肯定还会向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请求。战友的登门邀请，也说明了任务的紧迫。红军急等着粮食吃，粮食就是军队。他下了决心：服从组织决定，立即出发。

两天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找王观澜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东北部前线的广昌、赤水一带征粮七千五百担，就地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困难。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带上朱总司令给沿途兵站派兵保护的亲笔指示信，当即率领征粮队出发了。

广昌、赤水一带是北线敌人进攻的一个重点地区，也是一个产粮区。由于敌人采用堡垒政策，节节推进，“移民并村”，“车水捉鱼”，加上豪绅地主武装不断骚扰苏区，杀害革命干

部和群众，致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权陷于瘫痪。王观澜赶到赤水县委所在地驷前之后，立即抓住战机，指挥武装保卫连击溃了企图偷袭征粮工作队的敌人，毙伤敌人几十名，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一次狠狠打击。接着，他便整顿区乡领导机构，对个别贪污公谷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重新开辟了产粮最多的码头等几个区的工作，打开了征粮工作的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老百姓不顾地主武装的威胁，勇敢地把粮食送给红军，连村里的“义仓”粮也送了来。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完成了征粮任务，还扩大了几十名红军战士。

一九八〇年初夏，王观澜南下视察到瑞金，忆起他同陈谭秋这段战斗友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重访红都忆谭秋》，其中有一首诗，抒发了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

昔日豪情今未休，
风云变幻济同舟。
缺粮缺钱艰难日，
重访“红都”忆谭秋^①。

(六)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的一天，张闻天通知王观澜随军“转移”。十月，他告别了生活和战斗过三年多的“红都”瑞金，在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的战斗

^① 《回忆陈谭秋同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历程。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三道封锁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行进在红军先头部队里。每到宿营点，他就率领工作队出发，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扩红而日夜奔忙。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接替邵式平，担任中央工作团（后改为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红军入云南，他到三军团帮助和检查地方工作，随三军团渡金沙江，出会理，绕西昌，越小凉山，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嶲^①地区。

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赤化云贵川”的口号。中央驻三军团的代表刘少奇到达越嶲后，根据当地情况，决定留领导干部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刘少奇同王观澜谈及此事，王观澜立即表示服从工作需要。就这样，红军大队浩浩荡荡向前开进，王观澜带领一部分同志，在这万山丛岭中留下来了。

越嶲一带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建立过红军游击队，虽然这支游击队被军阀刘文辉镇压下去，但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火种。红军长征在此经过，更扩大了革命影响。王观澜趁此大好时机发动群众，几天工夫便组织起一百多人的越嶲县游击大队，其中还有一个彝民班，他担任县游击大队政委。不久，在城北中所坝和城南的王家屯，又各建立了一个游击中队，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越嶲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剿”部队很快逼近了越嶲，城外的地主武装又活动起来，王观澜带领队伍主动撤出县城。这里的村寨大都用高高的竹篱围住，每到傍晚寨门紧闭。居民半数以上

^①越嶲即今四川省越西县。

为彝民，语言不通，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困难。但是，王观澜下定决心，要坚持斗争。

一天下午，他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打“靖卫团”。侦察员带领一名彝族青年来见他，交给他一封急信。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他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两眼湿润了，马上交代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芦定桥边，得到何长工所率后卫部队的接应，深夜通过铁索桥，到天全，赶上了中央部队，又见到了毛泽东。

六月，他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部队要穿过千里茫茫的大草地北上抗日，筹备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负责筹粮，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为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做了极大努力。在一次他带队外出筹粮途中，粮食断绝，只得把一匹病马煮食充饥。不料染上痢疾，一昼夜拉痢五十七次。但他仍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目的地，稍经休息，没有吃药，拉痢却自行停止。可是，从此给他种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八月，红军奇迹般通过了人迹罕至、飞鸟绝踪的大草地，在包座一带与敌激战，消灭了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的敌四十九师，俘虏了七、八百人。王观澜和周士第等奉命作俘虏工作。他们把俘虏集合到包座南端的空麦田里，给他们讲解革命形势，解释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愿意当红军的留下，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他们又把俘虏带到附近的一座喇嘛寺里，分别谈心，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关于红军的种种谎言。他们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敌人内部许多真实而具体的情况，争取了三分之

一以上的俘虏参加红军。

不久，王观澜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旗镇。

(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瓦窑堡（现子长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立了驻西北办事处，并分设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劳动、内务及裁判部。王观澜被任命为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

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上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中区的两个乡，调查了解经过土地革命的贫雇农的生活状况和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情况，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准备和存在的问题。在红石砭沟的齐家河、窑台上、庄窝坪和川道地区的高家沟、十里铺等村庄，他都分别召集乡村干部和贫雇农群众座谈会，并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了解到陕北苏区的农村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土豪劣绅的威风已经扫地，贫雇农确实翻了身。调查中有人向他反映了地主“扫地出门”和富农只分给坏地的情况，他马上找乡村干部谈话，指出：毫无疑问，我们要坚决铲除农村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消灭地主阶级，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解放。但是，把地主“扫地出门”，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不给地主、富农自食其力的条件，怎么能改造他们呢？他说：这种过左的错误作法应当加以纠正。后来，这些地方经过群众讨论，区乡政府决定，给地主分了一些土地，实行在劳动中改造地主和富农的政策。

不久，王观澜参与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

的决定》公布了^①，这个《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富农经营的其他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税，等等。这个文件的贯彻，进一步纠正了陕北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问题的“左”的作法。

此后，王观澜又带人到赤源县李家岔区中山川一带调查。在春树砭，他发现了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的问题，便组织群众讨论，宣传和贯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正确政策和作法，很快使错划的成分得到改正，并且直接听取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各种意见。针对农村在阶级成分划分中的混乱现象以及其他问题，随后就以西北办事处名义重新颁发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使土地斗争中一些倾向性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

为了迅速贯彻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关于土地问题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定，他在陕西省召开的贫农团主任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接着，他又负责发出关于颁发土地证的训令，保护农民对于分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农民群众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他认为“颁发土地证必须与查田运动联系起来，凡土地斗争没有深入，查田运动没有开展或查出成分与土地没有最后解决的地区暂时停发土地证”^②。这次在陕北苏区开展的查

①此文件在1935年12月6日以《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下发。

②王观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土地部训令第三号——为颁发土地证》，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田运动，记取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克服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并为制定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作了准备。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观澜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土地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十五期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开展土地斗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重要性，分析了极左错误在土地斗争中的严重危害，提出了贯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作法，强调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左’的错误总比右的好，右的要不得，‘左’的总是革命的。”这种错误见解，看不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看不到把某些中农、贫农当作豪绅地主流氓是削弱了自己的革命力量，更看不到由这种极“左”的倾向所发生的许多坏的影响。他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反对与纠正极“左”倾向，是目前土地斗争中的主要工作。只有开展这个斗争，坚决纠正极左错误，才能使土地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才能动员更广大的农民武装走上抗日的道路。他的这种鲜明的观点和态度，对于纠正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在广大农村地区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正确的土地政策的实施，过去在极“左”错误影响下跑到白区的群众，甚至有些地主和富农，都一批批地回来了，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但是，就在党和政府坚决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一些地方却又出现把真正的豪绅地主改为富农，把富农改为中农的错误。而一些地富分子则乘机放出谣言，说“过去一切都错了”，曲解党和政府的政

策，企图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在为《红色中华》写的一篇社论中强调：“正确地决定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与正确地处理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把贫苦工农当作豪绅地主富农处置，这是削弱革命力量，应该严格纠正，不许迟延，迟延就是等于帮助敌人。”同时，“严格防止豪绅地主的故意曲解党与苏维埃文件，而乘机活动与反攻，攫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如果模糊了这一点，把某些豪绅地主改为贫苦工农，那就是大错特错。这个问题，同样严重地提到各级地方党与苏维埃面前。”接着他还论述了纠正“左”倾错误和实行对富农新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应有的正确态度和作法，从而正确区分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引导斗争向正确方向发展^①。

同年五月，东征红军回师河西。王观澜完成在安定一带筹粮供给任务后，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奉命担任中央工作团团团长，协助整顿保安县的工作。

王观澜虽然兼顾土地部和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但还是经常抽时间在农村作调查。那时，保安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区乡政府也没有空余的窑洞和公被，他常常和同志们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吃饭没有菜，只能在饭上洒一点盐面。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满不在乎，对于群众的生活却十分关心。有一次，他来到李家坭村，发现贫农李成奎的老婆病重没钱治，庄稼也顾不上种，便立即找乡村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助。结果，突击三天把李成奎的地种上了，又经民主讨论，解决了李成奎老婆的治病救济问题。李成奎老婆病好以后，逢人便说：“共产

^①1936年3月16日《红色中华》第263期。

党、毛主席是救命恩人，我们世代忘不了！”

这期间，王观澜对新形势下农村的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回机关后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①。《指示》明确指出，党的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民族革命力量。因此，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则均不在没收之列。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粮食、财产没收后，仍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富农的土地在拿出平分吋，应该照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文件对其他各类人员的政策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很明显，改变后的土地政策，具有了更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个文件下达时，王观澜给红军大学学员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了报告。在九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他又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中若干问题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②。

王观澜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同时，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巨大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籽、肥料，以及劳动力的解决等，都化费了不少心血。他总是在农时季节到来之前，就根据实际情况，以中央土地部的名义发出

^①1982年2月26日史鸿举谈话记录。此文件于1936年7月22日下发。

^②《党的工作》1936年第10期，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指示，指导和推动各地农业生产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夏，他先后主持发出《为春耕运动的训令》^①、《为夏耕夏收问题的训令》^②和《中央土地部关于组织革命竞赛给各级土地部的一封信》^③。他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春耕检查与夏耕的任务》^④等文章。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在《给各级土地部农工部的指示》^⑤中，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和各种有利条件，指出了克服困难、大力推动春耕运动的主要方法。当群众性的生产竞赛热潮掀起时，他及时提醒注意竞赛条件要具有群众性，强调经常性的检查和总结，反对那种“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帮助的”、“有名无实的比赛”。由于加强了具体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大批青壮年男子参战的情况下，吸引了成千成万的妇女和儿童，连一部分过去不参加生产的“二流子”，也被动员走上了生产战线，促使苏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西安事变”后，王观澜参与了中共中央对当时错综复杂政治形势的分析研究。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他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往接收延安。延安在东北军撤离、江华指挥红军部队消灭了企图顽抗的反动民团武装之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王观澜率中央工作团进入了这座雄伟的城市，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在工作团的组织下，延安各界人民举行了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泽东和红军的人城仪式。从此，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①②③⑤原件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④1936年5月6日《红色中华》第274期。

王观澜根据西安事变后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的文章^①。文章提出，党在新从东北军、十七路军手中接防的地区（该文称之为统一战线区域）的工作，应“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与内容，使其完全适合于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的需要”，认为“这是巩固与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他指出，党在这些统一战线的区域，“总的方针，应该是向着创造模范的抗日区域迈进。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活动，一切行政上的设施与宣传教育工作，都应该显示出我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的忠实的执行者，显示出我们是最坚决地抗日并真正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民众利益而奋斗。”他以延安工作为例，指出在这个方针下要注意的“三件大事”：一、广泛地组织和各种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增加民众的抗日力量；二、广泛地建立抗日民众武装，三、努力改善群众生活。他强调指出：不要忘记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许多大的政治问题的说明应从群众日常生活着手”。“我们不但要使群众了解我们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可敬可佩，而且使他们懂得我们是他们民主权利与生活改善的拥护者，是他们的代表，使他们觉得我们可亲可爱而接近我们。凡是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须郑重加以考虑与注意。”在这些工作中，他突出强调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这时，王观澜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体会到，对于地主阶级的策略应加以改变。他在文章中指出：“打土豪分田地，本来是发动劳苦群众斗争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我们部分同志最熟练的

^① 《党的工作》第24期，1937年2月1日出版。

一套，但是这一办法，在目前统一战线区域内，一般地是不适用的”。他主张“适当地推动阶级斗争，使之与民族(革命)斗争合拍前进，是目前争取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重要关键。”不久，党中央正式决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日，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王观澜率领的接收延安工作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正确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从而使接收延安的工作取得圆满的胜利，党和红军很快在延安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

(八)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批又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情共产党抗日的人士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捕释放的同志，不断涌向陕北根据地。党在延安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扩大了中共中央党校，以迎接和培养大批的抗日骨干。王观澜在把延安的工作移交给陕西省委后，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齐华等具体负责审查和分配涌到延安的人们，担负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时还组织了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还经常到中央党校、抗大等单位讲课。中共白区党的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时，他作了关于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华北地区党代会召开时，他又奉命参加会议，调查华北干部情况。不久，王观澜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组织科科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这时的中组部是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任

正、副部长，部以下直接设科。组织科既要负责干部管理工作，还要管理地方工作，人员精干，任务繁重。王观澜和刘锡五、王鹤寿、刘春等紧密团结，日以继夜地工作，为党和抗日干部队伍的纯洁与壮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年底，为解决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绥德，同国民党专员何绍南谈判。绥德、葭县（今佳县）、米脂、吴堡、清涧五县，都在黄河西岸。抗战开始后，为保卫河防，八路军一个旅常驻这里，设有警备区。但是这里的“政府”却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控制，直接选派了CC分子何绍南充任“绥德专员公署专员”。何到绥德后，利用南京政府每月给他的三万元大洋，搜罗豢养了一批共产党的叛徒和地痞流氓，控制了二千多人的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公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叫嚷“决不能让后方变成共产党的党部”，经常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观澜一到绥德，就响亮地提出了“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接着，他迫使何绍南接受提议，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他积极开展抗战动员，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同时着手整顿共产党的组织，洗刷腐化变质分子，加强党内的思想和政策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这样，在中共党组织秘密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很快开展起来，老百姓纷纷送军鞋、送手套慰劳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但是，国民党地方官员故意造事端，支持地主、富农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王观澜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保护贫苦农民土地斗争成果的中共吴堡县委领导。他指出，已经在土地革

命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地主不得领回。如果地主强行要回土地，农民当然就要起来对他不客气。后来，在我党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情况下，国民党地方“政府”不得不接受了这些原则。在此期间，王观澜请示党中央，恰当地解决了当地的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王观澜在绥德工作短短五个月，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使党及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在绥德各地的合法地位得到了保护，组织进一步发展。

一九三八年五月，王观澜从绥德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陕甘宁边区，这时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相接的二十三个县（市）。它的中心——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边区军民协力救亡，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誉。但是，它也成了日寇、汉奸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顽固分子，企图在边区“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①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王观澜到任后立即狠抓了打击汉奸、顽固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六月，边区党委统战部给各分区党委、县委发出紧急通知，搜集顽固分子在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方面向我进攻的具体材料，指出了给以汉奸、顽固分子以有力打击的必要。

七月，王观澜在关于边区工作的报告中^②，针对国民党政府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938年5月15日）。

②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不承认边区，叛徒张国焘在武汉关于取消边区的澜言，充分揭露了汉奸顽固派的破坏活动，进一步论述了边区在抗战中存在的重大意义，分析了边区工作中的弱点，指出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推动全国抗战的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伟大任务。

王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具体而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陕甘宁边区的统战工作不仅已经克服了抗战初期的某些“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而且已经逐步肃清了王明、张国焘等人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洛川、关中、陇东、绥德等地区，发展党员总数已近万名，党组织已经转变到能够适应更加艰苦的工作条件，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当地的党的工作干部。这些干部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利用合法权利，打击顽固势力，推动抗战动员，开展党的工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他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后，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降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工

作要求，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①。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后，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三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观澜在报告中论述了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分析了资产阶级对付共产党的政策。他说：国民党的“容共”就是“熔共”，即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讲“统一”，实质是要把陕甘宁边区和一切革命根据地取消而归其独裁。共产党不愿放弃人民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就必然要制造摩擦。说到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国共合作有着阶级的背景。他说，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原是打出来的朋友，因此我们不能怕摩擦，要争取在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进步。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指出，共产党员时刻也不能忘记，在统一战线中，“要高举我们的旗帜，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一天，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

^①1981年10月7日王观澜谈话记录。

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谙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档、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结合在一起，找王观澜的岔子。他们调阅中央档案，并没有能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问题。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又去找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接了当地说：“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①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但是，王明、康生当时终究还是两个庞然大物，对于他们，有些人还是敬佩得很。因此，风波过后，已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宣布过的由王观澜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在这场真理和邪恶的斗争中，王观澜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支持。他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②，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王明之流的诬陷与迫害，激

^①徐明清：《永别了，观澜同志》，载198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②王观澜给陈云并转中央的信（1939年1月30日），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昂慷慨地陈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肖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给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王观澜多次明确指出，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在“坚强自己的前提下。站稳立场，抓住时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①，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分子的进攻，这就使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庆阳地区制造了反共摩擦事件。他们从进行反共宣传，策划有计划的挑衅行动，发展到突然调集数县“保安队”和国民党正规军，公开进攻八路军驻防的镇原、宁县县城，使八路军后方形势危急。王观澜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代表、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的身分，赶赴庆阳西峰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他和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等，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内战万人和平签名运动，同时在军事上加强城防，严阵以待，并抓住时机给予顽固派以有力的教训，终于把反动派的进攻打退，迫使国民党代表在谈判桌上签订协议，同意撤退围攻我防区的部队，释放抓捕的我方人员，从而稳定了八路军的抗日后方。

^①有关报告存中央档案馆。

九月，王观澜在组织陇东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后，代表边区党委参加了陇东地区党代会。十月赶回边区党委驻地安塞，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准备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后，又帮助准备了边区党委的组织工作报告。会议召开不久，他终于力不能支，完全病倒了。这次会上他被选进陕甘宁边区党委，并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九）

王观澜在长征路上埋下的肠胃病根，到陕北后由于过度劳累，身体虚弱，又经常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专门把他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他如实汇报：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了说：“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话，使王观澜十分感动。此后，他更加拚命地工作，却没有认真领会毛泽东的忠告。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终于使这个久经沙场的硬汉子躺倒了。

王观澜躺在中央延安医院窑洞里，心里还是焦急地想着革命工作，这种情况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一天早晨，毛泽东在傅连璋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痛难忍。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在一张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就在那次看望之后不久，毛泽东给

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①：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这封信，不仅鼓舞了王观澜同疾病和死亡斗争的勇气，而且也成了人们同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

在这同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先后来看望他。他后来回忆说：“那时虽然我几十天饮食不进，全靠输液保持身体必需的营养，但我始终愉快乐观，因为我感到我是生活在充满了同志的高度关怀和细致照顾的环境中，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是能够战胜疾病的。”

一九四五年初，由于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王观澜自己顽强的毅力，乐观的情绪，他的病渐趋好转。在二月里的一天，毛泽东又去看望他，见他病情确已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这使他非常兴奋，更加紧了锻炼。他把活动的地域由室内移到了室外，由平地活动到锻炼爬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山。尽管每次爬上山坡，总累的腰酸腿痛，满身大汗，但他还是坚持下去，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果然身体逐步恢复起来。

身体稍有恢复，他就拚命地看书、学文件，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由于精力、体力的消耗超出了限度，就在盼望已久的“七大”开幕前夕，他的旧病又发作了。这次是十二指肠溃疡，血管破裂。血，象喷泉似地从嘴里涌出，人坐不起来了。二十多天后，肠子堵塞，颗粒不进，眼睛渐渐失明了。后来，他曾经沉痛地总结这次发病的教训，说：“对待疾病和对待工作一样，不仅要有革命的精神，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如果要求过高，超过了客观可能，那就会招致不良的后果①。”

王观澜的生命曾几度处于危急之中。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是组织上和医务人员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在西药治疗的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和另一位老中医，用中药和针灸，终于使他能够进食少量流汁，而且抑制了他的神经痉挛。他在同病魔较量中，也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知道自己的心、肺、脑并没有坏，相信只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把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难关是可以度过的。因此，当他从严重的休克中苏醒过来，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把在托儿所的孩子接回看一看时，他拒绝了。他平静地想，在危急的情况面前，党交给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战胜疾病，战胜死亡，而不是妻子儿女。他相信，孩子将来一定能看到的。就在他生命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

① 《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11月版。

他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气来，采取有效办法，同死亡作斗争。毛泽东的话，对他发生了特殊的效果，他深深地懂得党和战友们的殷切希望。虽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但他没有任何慌张和焦躁情绪，而是镇定和乐观。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渐渐复明。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铁鏊子送给了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毛泽东、李富春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给他送去，使他极弱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

一九四六年秋，他又开始练习走路，从室内走到室外。当他汗流浹背地登上那黄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陕北山野的清新空气时，他禁不住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①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的时候，王观澜经过锻炼，已经恢复到能随中央机关转战在陕北了。后来，组织决定让他先过黄河到晋绥继续疗养。在这之后他的病虽然又犯过几次，但都不如一九四五年那次严重，而且每次也都被战胜了。即使沉疴缠身时，他仍然时时关心着党的事业。一九四七年四至七月间，康生带领土改工作组到晋绥的临县郝家坡搞土改“试点”，大搞极左，影响很坏。当时王观澜住兴县张家湾村养病，听到群众的强烈反映后，还吐着血就把驻村工作团主任姜宝箴叫到床前了解情况。他气愤地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

^① 《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11月版。

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也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要学习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文章。”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泽东已过黄河，就让爱人徐明清赶到蔡家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听后激动地说：“把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为锻炼，实为害人。”不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前段晋绥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在讲话中肯定了王观澜关于土地政策的正确意见^①。一九四九年四月，经中央批准，王观澜由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出发，经山东惠民，取道东北，前往苏联治病。

临出国前，王观澜为防止当时居住在莫斯科的王明再找麻烦，要求中央对他的历史作一鉴定。四月六日，中央电复东北中央局^②指出：“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中曾有人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可靠的，在党政工作中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中表现了他的能力与坚定，应为党所信任。”电报还要求他出国后安心养病，病愈后回国工作。中央的这一正确结论，给王观澜以莫大支持和欣慰。

王观澜在苏联治疗不到半年，就匆匆回国，积极要求工作。

（十）

建国初期，王观澜主要负责农业工作，一九五〇年任中央

^①1983年徐明清的回忆。

^②存中央组织部。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二年春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一九五四年秋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积极引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的方针，工作是有成效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党内为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认为，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应该按中央原来的设想稳步前进。王观澜支持邓子恢的主张，结果与邓子恢等一起被指责为“右倾”、“小脚女人”。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以临海、嘉兴两县为重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①，以临海县的农民为例算了一笔细帐，指出临海农民每人实得原粮比上一年减少了，而浙江二千万农民“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低”；浙江农村副业和土特产产值“都有下降趋势”；而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百分之三十至八十以上，就猪一项来看，“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他认为，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不富裕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这个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毛泽东将其批转全国，认为应当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特别指出：“为农民算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指出：“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②可惜的是，这份从实际出

①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发的报告，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引起重视。

一九五七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可是，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王观澜，分工负责抓反右派斗争。他凭着革命的经验和对部内干部队伍的了解，不相信每个单位都无例外地有百分之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始终把握住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结果，中央农村工作部只勉强定了一个“右派”（经复查，这个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纠正）。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并起的“大跃进”年代，王观澜随邓子恢到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当即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合当前科学水平的①。”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②。”王观澜几十年搞农村工作，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当他知道由于“三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恶果时，便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③几天后，他得知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的信表示感谢。他从中看到了党的希望，兴奋得几夜睡不好觉。后来中央对这一时期工作上的失误又作了自我批评，调查研究之风在全

①②③胡思升：《不唯心，只唯实——访问入党五十六年的王观澜同志》，载《新观察》1981年第15期。

党兴起。

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王观澜接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分工抓人事和科研教育工作。他反复强调，我国农业要大上，一个是生产关系要适合，政策要对头，再一个是要讲科学种田。一九六四年，组织决定加强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力量，由他兼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他非常注意把北京农大办成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出合格人才、出科研成果”的重点大学，使北京农大迅速发生变化。刘少奇多次直接听取北京农大办学经验的汇报，这些经验曾印成文件，批发到全国。王观澜为发展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十一）

在十年浩劫中，王观澜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受到严重的迫害。多少个学校和单位对他进行轮流批斗，几十次被“打翻在地”，脊椎受伤，耳朵也失聪了。但他并没有消沉，始终保持着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边站”了，他就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伙食不允许照顾了，他和大家一样啃窝窝头，给他提供的交通工具取消了，他便步行去学校。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曾三次指名解放王观澜，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王震一起抓生产，但都被以种种借口不予执行。周恩来对定王观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材料，一条条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能打倒^①。”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周恩来在陈正人追悼会上碰见了王观澜，十分激

^①徐明清：《永别了，观澜同志》。

动，热情地握着他的双手说：“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①随即指示解决他的住房。接着就安排他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王观澜很快投入了协助总理抓生产建设的繁忙工作之中。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王观澜气愤地写了一首打油诗：“青山绿水迎春游，万水千山一叶舟，惊涛骇浪心弦战，白天作梦骂孔周。”他听到周恩来与世长辞的消息后，一个人长时间闷坐房内，关着灯默默不语，暗自流泪。

“四人帮”的覆灭，使王观澜兴奋万分。自从病后，他就很少饮酒，但这一次，他在家中置酒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又及时讨论了他的夫人徐明清被康生一伙诬陷的冤案，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②。不久，他又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为革命奋斗半个多世纪的王观澜，此时已进入“古稀”之年，退出了第一线，除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外，还被国务院任命为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他说：“工作退居第二线，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放在第二线呀！”^③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王观澜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陕北老根据地，调查了十二个县。他发现，离开陕北三十多年，城市变化确实很大，但在农村，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人均口粮很低；二是畜牧业衰退了；三是经济单打一；四是水土流失严重。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感慨的说：“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起家

①徐明清：《永别了，观澜同志》。

②1982年徐明清同志谈话记录。

③1982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的，决不能辜负农民”^①。中央有关部门很重视他的意见，决定从物力、财力上支援陕北老区发展工农业生产。

一九八〇年四月，王观澜又南下沪、浙、闽、赣、苏五省市调查，行程四千五百多公里。他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群众生活有了好转，心里十分高兴。在浙江省仙居县，他调查了水利水电发展情况，为这里正修建的水电站题诗一首：“穿山不怕山高，架桥不怕水深，工作不怕艰险，美景春宵在前”^②。但是“美景春宵”并没有挡住他警觉的眼睛，他在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他沿途发现“森林覆盖率低。由于乱砍滥伐，破坏了生态平衡，江河溪流的河床一般加宽了，水浅了，水土流失严重”；“从九江乘船到南京，看到长江，和黄河的黄水也差不多了”。因而，他大声疾呼“发展林木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③。

一九八一年春末，七十五岁高龄的王观澜乘吉普车，又风尘仆仆地到河北省保定、安国、博野等县农村，调查生产责任制情况。一位采访的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总结了四句话：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把我们害苦了”^④。

一九八一年十一、十二月间，王观澜连续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代大会。他多次热烈发言，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并对今后的建国大计积极发表了意见。大会的最后几天，他虽感到身体不适，还

①②③④胡思升：《不唯心，只唯实——访问入党五十六年的王观澜同志》。

是坚持了下来，并且仔细安排了南下闽、粤、赣等省调查的计划。大会结束后，他根据医生的意见住院“检查治疗”。这时才发现，他患的胰腺癌已扩散到内脏其他器官。住院一星期后，病情急剧恶化。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宋任穷和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在症状稍缓时，还强忍病痛，同大家谈论有关的工作问题，并且鼓励一些同志，要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支持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工作，放手大胆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弥留之际，嘱咐守候在身旁的夫人徐明清说：“我一辈子是革命的，经过多少曲折的斗争，现在没有多的话了。你要管教好孩子。我是共产党员，向中央打报告，把我烧了吧。”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凌晨，王观澜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

王观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将永远为人们纪念。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在脚注中注明者外，还访问了何长工、肖劲光、吴亮平、毛齐华、朱开铨、王昆、史鸿举等同志。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 · 123

定 价： 1.50 元